

CHINA  
SPRING

No. 32 FEB. 1986

# 中國之春

二月號  
總32期



# 中國 理性專制 走向

警惕

警惕

警惕

● 李鵬：向蘇開放，向美收緊！

● 本期專題：中國大陸烏籠人權



## 中國民聯世界二大在華盛頓召開

獨家專訪 / 黎安友、司馬晉教授談  
中國的民主與人權

連 載 / 徐文立獄中申辯

● 中國民聯世界二大在美國華盛頓召開 ●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籌備處

# 公 告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將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市華盛頓酒店召開。

來自北美、歐洲、澳洲、香港、日本和中南美洲約五十名代表將聚集一堂，共同研討中國的局勢發展，擬訂民主運動的策略，學習民主運作的程序，選舉中國民聯新的協調機構和監察機構。代表中，有已在國外獲得各種學位的中國大陸公自費留學生，也有剛從國內出來的研究生；有「北京之春」及民辦刊物時期國內民運的積極份子，也有在海外學術界已經嶄露頭角的年青學者；有關心祖國民主大業的台港研究生，也有事業有成、日夜盼望祖國強大的海外華僑。全體代表中具有博士學位及博士候選人資格的，佔相當高的比例，當然，學位不足以代表一切，但代表的素質已較第一屆代表大會有明顯提高。共同的理想，把來自幾大洲的代表團結在一起。

前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副主席陳香梅女士將在開幕式上到會祝賀並發表演說。此外，還有在經濟上支持中國民聯的華僑代表與會祝辭。

大會期間，全體代表除加緊地討論、交流外，還將參觀美國國會和白宮。最後，大會代表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請願，並遞交要求釋放獄中民運人士等有關函件。

大會將有規定時間向新聞界開放，接受記者的採訪。

中國民聯世界二大籌備處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為反對派的合法化和反饋系統的合理化而努力

## ——寫給中國民聯世界一大

(中國民聯) 王炳章

一個有前途的民主運動既要有遠大的理想，又要有中期的目標，還要有近期的工作方針和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幹精神。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遠大理想是在中國建立民主政體、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和均富」。近期的工作方針是辦好刊物（如中國之春）、擴大和健全民運團體（如中國民聯）。那麼，民運的中期目標是什麼呢？換句話說，我們要達成什麼樣的關鍵性突破，中國大陸才有建政民主政體的希望呢？

我的看法是，中國民聯的中期目標是促成國內合法反對派的建立和合理信息反饋系統的形成。

### 人無聖賢——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假設

凡二人以上組成的人類社會，都必須在一定的秩序下生活，而秩序的維持需要管理。最簡單的管理法，莫過於產生一個不會犯錯的聖人，安排衆人的活動。人類創造出皇帝和國王，就是希望他們以聖賢之能，帶領衆人。如果真有什麼完人、聖人，那人類的生活就簡單了。聖人說向東，衆人就向東；聖人說向西，衆人就向西。社會不但井然有序，而且還可在聖人的指導下，不斷創造更高的文明。

問題在於，人無聖賢。沒有聖賢，而社會又需要管理者，於是人類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怎樣防止管理者犯錯誤？怎樣使管理者少犯錯誤？怎樣及時糾正管理者可能犯的錯誤？

### 健全反饋系統的重要性

管理者常犯的一項錯誤是判斷失誤，其原因之一是不知民情。因此，社會須有一套健全的信息反饋系統，使管理者（執政者）知道被管理者（民衆）在想些什麼，有什麼要求，以便調整自己的指令（施政方針）。

簡單而言，反饋指的是指令的效果對指令本身的影響。正反饋效應是效果加強指令，負反饋效應是效果減弱指令。兩種效應對社會的調節可能都會產生有益的結果。

舉一個正反饋效應收益的例子：包產到戶先是由局部地區農民自發做起來的，農業增產的信息傳達到高層決策者，高層在某省推廣了這一作法，該省增產的信息再次上達，以致高層決定全國推廣。結果，農業有了生氣。

再看一個負反饋效應收益的例子：一九八三年底和一九八四年初，北京高層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消息傳開，海內外輿論嘩然。「大參考」及滙報材料傳達了這個信息，

鄧小平、胡耀邦及時停止了「清污」運動。

### 官辦信息反饋的缺陷

然而，在我們國家，信息反饋造成政策失誤、使社會受損的例子，可能更多。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制定了大躍進、共產風的政策，廣大群眾叫苦不迭。但各級黨政幹部爲了討好上級，竟往上傳遞「群眾一致擁護黨的英明決策」的假信息。周恩來到了河北徐水聽取假滙報後，便宣佈徐水縣已經進入共產主義。於是，共產風愈颯愈大，終於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本來應造成負反饋的效應，却變成了正反饋，原因是信息被選擇性過濾和扭曲了，而這又是信息傳遞系統不健全所致。

同樣，不健全的信息反饋系統，也會使鄧小平等人判斷失誤。拿其統戰政策來說吧，中共當前一廂情願的統戰政策在僑界引起了不少反感，「響應」者寥寥無幾。可是，北京各統戰機構爲了邀功而上傳的信息，却是到處「一片大好統戰形勢」（這從各統戰刊物的片面誇張報導上很容易判斷出來）。這種片面的、選擇性的信息反饋，使高層誤入歧途，以致統戰有時發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

信息傳遞系統出現毛病，不單純表現在「報喜不報憂」上，還表現在有時「報憂不報喜」上。比如，前些日子，中國大陸地方小報十分活躍，不僅豐富了老百姓的生活，而且舒緩了大家對官方枯燥宣傳的不滿情緒。雖然地方小報還有很多尚待改進之處，但總的說來群眾是歡迎的。然而，帶着有色眼鏡的官方「小報告」信息渠道，却誇大滙報了地方小報的某些所謂不健康因素，於是，上層下了掃蕩的決心。

共產黨染有此症，國民黨也未倖免。突出的例子是「中國時報美洲版」的關閉事件。海

外學者多認為，「中國時報美洲版」在糾正台灣政府的形象方面，實在功不可沒，國民黨應該大力支持才是。然而，國民黨的「小報告」信息管道，專門打「中國時報美洲版」的壞報告，使決策者一葉之障，不見泰山，不斷給該報施加壓力。雖然該報的關閉還有其它複雜的原因，但一般相信，上層保守派的壓力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所以，不管什麼社會，都有其信息反饋系統，關鍵是其反饋系統是否健全。如信息反饋系統具有選擇性，甚至具有歪曲性，傳遞的信息就可能是片面的、錯誤的。「報喜不報憂」時，使本來應該是負反饋的效應，變成了正反饋效應；「報憂不報喜」時，則使原本應該正反饋的效益，變成了負反饋的效應。

綜上所述，官辦的信息反饋系統，由於主管人員的自身利益所致，時有失誤，不僅危害百姓，也危害執政者自身。

## 信息反饋管道多元化的重要

中國民聯的中期目標之一，就是推動中國社會建立健全的信息反饋系統，即：信息反饋渠道不能由官方獨辦，要創建獨立的民辦信息反饋系統，而且，民辦者也要有多家，不搞「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總之，信息反饋管道要多元化，用法律語言表達，便是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這是社會走向民主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在多元民主社會，新聞輿論界被稱為「無冕皇帝」和「第二政府」，對執政者不僅起着信息反饋作用，甚至起着重要的制衡作用。美國總統里根的幕僚長瑞根（Regan）前些日子說了句瞧不起婦女的話，遭到輿論界的譴責，瑞根不得不表示道歉。鄧小平當着大批新聞記

者大罵歌德、黃華「胡說八道」，造成惡劣影響，可官辦的信息反饋渠道能向他如實反映其惡劣影響嗎？

## 反對派的客觀存在

健全的信息反饋系統是防止管理者（執政者）犯判斷錯誤的必要保障。但是，如果執政者已經犯錯或已經犯法怎麼辦？特別是，如果執政者堅持已錯怎麼辦？看來，社會僅有信息和輿論反饋還不夠，還必須有更強有力的制衡系統，這就涉及到了反對派合法存在的價值等一系統問題。

既然人無聖賢，那麼，任何一個人就都有他的反對者，任何一派就都有它的反對派，任何一黨就都有它的反對黨，任何執政者也都有它的反對份子。毛澤東對這一點坦然承認，他曾有「黨外無黨，帝皇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之語。現今的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比較忌諱談論黨內反對派的問題，有時甚至否認黨內分派，這是不夠正視現實的表現。

中國的問題並非是有沒有政治反對派的問題，而是反對派是否能夠合法存在的問題。

## 反對派不是敵對派

反對派並不是敵對派，這是中國人需要建立的一個重要概念。

敵對派者，以打倒、消滅對方為己任。如當前國共兩黨的關係、國民黨與台獨的關係即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是中國人形容政治敵對派的字眼。在中國，一出現政治上的異己者和離心份子，對方（尤其是掌權者）就指稱為政治野心和陰謀家。以階級鬥爭學說為理論基礎的中國共產黨，更是把黨內外的政

治歧見者，統統打成階級敵人。中國傳統的政文化中，似乎只有敵對派而無反對派的觀念。反對派與敵對派的根本差別是：它不以打倒對方為奮鬥目標，而是尊重對方的客觀存在；它不把自己當成對方的政治敵人和階級敵人，而是以諍友、監督者、競爭者的角色自許。像目前台灣的「黨外」和大陸的民主運動，都宣稱自己的任務並非去消滅執政者，他們想起的，實際就是政治反對派的作用。

## 不給反對派合法存在的結果

中共建國以來，一直將政治反對派打成敵對派，不讓其合法存在。黨外的反對派，從五七年的「右派」份子到西單民主牆的民運人士，都遭到了無情的鎮壓。結果，人才摧殘，科技落後，經濟瀕臨崩潰，人民的離心傾向越來越大，連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感覺到了「亡黨亡國」的危險。共產黨為什麼走到這般田地，原因之一，是他消滅了一批又一批做為諍友、批評者和監督者的反對派，到頭來，沒有人再願意給它指出身上病患，只有逐漸發展到病入膏肓的程度。

中共不允許黨外反對派的合法存在，是與建黨以來不允許黨內反對派的合法存在一脈相承的，從清除陳獨秀托派份子到批判彭德懷，從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到審判四人幫，都貫穿了這條主線。

執政者鎮壓反對派的主觀願望是徹底消滅反對派。如果反對派真能被「徹底消滅」，天下也就太平無事了。事實往往與主觀願望相反，你越鎮壓、消滅反對派，反對派就越多，而且還會製造出新的反對派。

## 保護反對派等於保護自身

中國有史以來的政治家還沒有真正明白「保護反對派等於保護自身」的哲理。這方面的教訓，應以共產黨高層領導最為深刻。一九五三年，劉少奇闖倒了自己的政治反對派高崗，一九五九年，他又幫助毛澤東闖倒了反對派彭德懷。七年之後，劉少奇做爲毛澤東的政治反對派也被闖倒，而且下場更慘。四人幫兩次闖倒政治反對派鄧小平，最後却被迫小平推上歷史的審判台。毛澤東生前沒被闖倒過，但死後逃脫不了被黨內反對派批判的命運。

政治反對派一開始往往是少數，保護少數反對派的道理，不僅在於使其充當批評者，以利於自己錯誤的修正，其更深的哲理還在於，自己隨時也可能變爲少數而需要政治上的保護。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如果預知七年後自己也需要保護的話，可能就不會與毛澤東一起整肅彭德懷了。共產黨前輩的這些教訓，不知當今的共產黨領袖能不能汲取。

此外，沒有兩個人的觀點會始終一致，或始終對抗，事情是變化的。昨天，甲和乙站在你一邊，丙和丁是你的反對派。可是，今天在另外一個問題上，丙和丁却可能成爲你的同盟軍而甲和乙成爲你的反對者。如果昨天你聯合甲乙消滅了丙丁，今天你自己就有被甲乙消滅的危險。從長程看，保護反對派，等於保護了自身。

這裏，我想指出，黨內反對派的合法化與黨外反對派的合法化是相輔相成的，不存在誰先誰後的問題。黨內反對派合法化了，各派就會爭取黨外的群眾，於是必然帶動黨外反對派的合法化，反之亦然。

## 從反對派吸取政治營養

加拿大有一個小黨，叫新民主黨（NDP）

其黨魁在議會批評執政黨一貫不遺餘力，他的批評和建議常常博得聽衆的熱烈掌聲，說明其主張有時很得人心。說來奇怪，新民主黨多年來一直壯大不起來。有人認爲，該黨不能發展的原因之一，是長期執政的自由黨領袖特魯多高超的政治技巧所致：他不斷把受到民衆擁護的新民主黨的政策主張悄悄地「偷」過來，融於自己的施政綱領之中。特魯多把「樹根」纏到了新民主黨的身上，把其營養吸爲己有，反對派還有壯大之理？

我常想，中南海的執政者們對付中國民聯及民主運動的最高明策略，應該是像特魯多一樣，不作聲地把政治反對派的合理主張拿過來予以實施，這樣，中國民聯就永遠不會有什麼大發展了。可是，共產黨能改變自己的性質而學到這麼高的政治技巧嗎？

一個實際的問題是：中共高層領導所獲得的有關中國民聯和民運的信息可能都經過了選擇和歪曲。由此可見，健全的信息反饋系統與反對派的合法存在乃爲相輔相成之事。如果反對派能在共產黨內和「人代會」中合法存在，能夠當面對執政者質詢和建議（台灣黨外議員已做到這一點），執政者就能獲得較爲完整的信息，也能從反對派那裏領會到很多合理的政策主張。

中國民聯成立已有兩年，我有一點深切的體會：我們所取得的進步，應該部分地歸功於運動內部的反對派，沒有他們的批評，我們就不會反省。

我們要推動國內反對派的合法存在，就必須首先允許自己團體內反對派的合法存在，同時在自己團體內建立一套健全的信息反饋系統，這正是中國民聯二大要討論的重要議題。

## 借鑑台灣的經驗

台灣雖未建立起健全的民主政體，但已突破官方壟斷信息反饋的局面，黨外持不同政見的刊物敢鳴敢放，禁不勝禁。在立法院（國會）會議上，反對派人士可合法地、面對面地批評、質詢政府官員。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歸功於黨外人士的爭取，也與國民黨開明人士的努力有關。

台灣今天的局面，就是我們爭取明天在大陸實現的目標。在這方面，台灣黨外、黨內的有識之士都應開擴心胸，積極幫助大陸民主運動，把台灣的「有限民主」輸往大陸。

怎樣才能在大陸實現反對派的合法化？怎樣才能建立合理的信息反饋系統？這是最容易回答、但又是最難辦到的問題。

第一，要對共產黨的執政者們進行再教育，把多元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觀念傳授給他們。他們在打游擊方面是內行，在管理國家和社會方面却是外行。前幾年，在各種影響下，中共高層的某些領導在接受市場經濟理論方面表現不錯，說明他們並非一成不變。今後，我們希望，凡能與中共決策人直接或間接接觸者，都要給他們上上民主政治的基本課，時間長了，大家都講，總會有些效果。

第二，反對派自身要凝聚成力量，要在質量和數量上不斷提高。反對派強壯到執政者消滅不掉時，才會爭取到合法存在的地位。

第三，台灣的政治力量要敢於涉足大陸，取得合法反對派的地位。

反對派是一面鏡子，可以照見自己臉上的污垢。健全的信息反饋系統是眼睛和耳朵，幫助判明正確的方向。中國的政治有了這二件法寶，中國的社會才算是一個健全之軀，中國的政治才算上了軌道。讓我們朝着這個目標，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二大召開在即，謹寫此文與大家共勉。

中國之春刊頭系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 中國之春

##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雜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總三十二期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 一九八六年二月號總三十二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ending at Flushing, NY.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 ● 專 論 ●

3 ■ 為反對派的合法化和反饋系統的合理化而努力  
——寫給中國民聯世界二大  
(中國民聯)王炳章

#### ● 讀者 ● 作者 ● 編者 ●

8 ■ 大陸有民主，港台才有安全·不搞地域主義·徐文立不是共產黨嗎·極權之下無左右·你們把我害苦了·令共產黨寒心·「我的申辯」英譯·給徐文立的女兒小瑾·拿人的手短·分權制並非最理想的制度·抓準時機·反對設計盟徽·刪改太多·望能贈閱·百家齊放在異國· 謝源等

#### ● 特別報導 ●

12 ■ 警惕中共正把中國引向理性專制  
(國內)董旭生·楚青原

#### ● 本期專題 ● 中國大陸的鳥籠人權

19 ■ 鳥籠人權——中國大陸人權狀況  
本刊評論員

20 ■ 美國國會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開幕詞

21 ■ 希望中國政治改革永不停息  
(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亞洲及太平洋小組主席索拉茲)  
——在美國國會中國人權聽證會上的作證

23 ■ 中國最近的法律發展與人權情勢 (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 邱宏達  
(美國布魯津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哈定

28 ■ 國際特赦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切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黎安友

31 ■ 廢除良心囚犯——訪司馬晉教授談中國大陸人權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 吳軍

34 ■ 國內出現了「萬人坑」和「販賣人口」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澳洲) 王法堯

40 ■ 勞改生活十五年  
(中國大陸新移民) 龍塘

#### ● 民運報導 ●

43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46 ■ 從美國納粹示威看國內大學生遊行  
(中國民聯) 王炳章

48 ■ 薄雲與他「灰暗的畫」  
(本刊駐歐記者) 耿晨

50 ■ 給你……勇敢的探索者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高今航

## 編者的話

維護人權，是中國民聯倡導的一大目標。本期的專題是中國大陸人權問題，除專家的分析外，還有大陸人民的親自見證，可使人對中國大陸人權問題有一個概括性了解。

本期的「警惕中共把中國引向理性專制」的特別來稿是一篇重要文章，對中國當今的社會本質及可能的未來走向都有深刻分析，本刊編輯部特此推荐。

李鵬已成為備受注目的中國政壇人物，他的思想模式有什麼特點？他對中國未來走向有什麼設計？本期將追蹤報導。本刊希望與李鵬有過接觸、對他較為了解的人士向我們提供稿件和資料。

中國大陸學生運動方興未艾，我們急切徵求這方面的報導和評論稿件。

## 下期預告

中國民聯世界二大十二月底在華盛頓召開，會議未開，已引起各方矚目。大會上將討論什麼？發生哪些爭吵？能達成什麼協議？中國大陸學生們對中國未來局勢演變有何分析？哪些人能夠被選上？這些，都對中國民聯未來走向有重要影響，也是舉世矚目的問題，下期將是民聯二大專輯，使您對這一民運團體有全面了解，切不可錯過該期。

下期繼續刊登徐文立獄中申辯。

## 國內快訊·時評

53 ■ 我的申辯（連載）（原「四·五論壇」負責人）徐文立

64 ■ 建黨以來思想最混亂的黨代會

——九月黨代會捨零（北京）董旭生

66 ■ 支持當前的留學政策，反對李鵬向蘇靠攏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潘宗純

67 ■ 向東開放，向西收緊

——李鵬扭轉留學政策和教改方向（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程瑞雲

68 ■ 評中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放寬管制（中國大陸訪問學者）趙大吉

69 ■ 炎黃子孫的嘆息（中國大陸作家·美洲）季康

## 人物專訪

72 ■ 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訪「中國的民主」作者黎安友教授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吳軍

## 統一論壇

75 ■ 中國統一問題裏的困結、涓水、死水和新機

（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教授）邱垂亮

82 ■ 為國共和談問題致蔣經國先生書（中國大陸研究生·歐洲）王策

## 思想論壇

85 ■ 檢驗新封建專制——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大陸學者·美洲）秦修明

91 ■ 左右辨（華裔工程師·美國）憶凡

## 文藝園地

33 ■ 詩人之命·距離規——人的透視（詩）（中國大陸青年詩人）嵐之凝

52 ■ 小路之憶（詩）（中國大陸青年詩人）嵐之凝

65 ■ 霧·風夜（詩）（中國大陸青年詩人）嵐之凝

81 ■ 無聲集——為那些我永遠愛着的人們（詩，四至八）艾菲

47 ■ 無聲集——為那些我永遠愛着的人們（詩，九至十一）艾菲

94 ■ 老處女（小說）（中國大陸青年作家·美洲）雷雨電

## 封面

中國大陸的烏籠人權（漫畫·羅際相製作攝影）

## 封底

勝利的曙光在前頭

——獻給民聯二大（歌曲）（中國民聯北京第九聯絡站）



## 大陸有民主，港台才安全

我是今年夏天甫自台灣抵美的留學生。最近參加了王炳章先生的一個公開演講會。我對王先生的觀點雖然不盡贊同，但却像大多數其他在場人士一樣對王先生的勇氣及對中國民運所做的努力給予正面的肯定。

我參加王先生這次演講會所獲得的信念是——的確唯有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中華民族才有真正的前途；同時，台灣和香港的安全也才能獲得真正的保障。

然而，由王先生的演講和由我目前所看到的「中國之春」雜誌，我得到一個初步印象（可能是不正確的）——中國民運大力呼籲大陸留學生參與民運的同時，顯然不太重視台灣留學生的這股「旁支」力量？

而最令我氣餒的是，由王先生的演講座談中，我發現一個現象——大陸、香港和台灣留學生之間的相互了解實在付諸闕如。

基於以上的因素和我個人對中國前途的熱烈關切，我隨函附上美金支票及「中國之春」雜誌訂閱單一份，敬請將「中國之春」雜誌按期寄下為感。

同時，我也熱切期望能有機會成為中國民運的盟員，因為唯有實際加入民運行列，才能

滿足我由參與中學習和奉獻的心願。

台灣留學生 張麟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 不搞地域主義

張麟先生大鑒：

中國民聯從來沒有把台灣、香港或海外的留學生視為「旁支」力量，相反的，台灣及海外的留學生因受的民主薰陶較大陸留學生為深，因此，在推動大陸民主化方面，往往需要借助他們的經驗。

今天，如果我們搞民主的還要分什麼「主流」「旁支」的話，那就什麼都別搞了！

大陸和台、港留學生之間相互的了解是有些困難，因此，我們更希望他們加入，只有通過接觸，才能打破隔閡。如果不願意加入，可在我們雜誌上投稿，也能促進了解。

熱烈歡迎您的加入。

中國民聯常委 林樵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 徐文立不是共產黨嗎？

我從台灣來美讀商。在台久聞中國之春大名，此次卅期所載徐文立的申辯書，使我明白了不少大陸的實況。我讀完徐文立的文章後，我的感覺是：徐文立是共產黨呀！他沒有反共思想，他一心擁護共產黨，為什麼中共要判他十五年？徐文立要在台灣，他一定被國府劃為左傾分子，說不定也要抓他。共產黨怎麼連這種人都容不下？它容不了這種人，還能容我們這些「反共份子」？還能容得「一國二制」？

台灣研究生林麥宜于紐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 極權之下無左右

徐文立是一個左派，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是我讀完他「我的申辯」後的結論。我不由得想起貴刊廿八期刊登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得拉的談話。他說：在極權主義下，沒有左右之分。在布拉格，極權主義者既絞死社會主義者（左派），也絞死教士（右派）。

米蘭·昆得拉的見解多麼精闢！極權主義者就是不容異己，不容獨立思考，不容你的看法超過他，哪管什麼左中右！希特勒屠殺共產黨，毛澤東鎮壓地主和富農，鄧小平關起魏京生、徐文立，這些作法有何本質區別？

大陸留歐研究生許覽于歐洲

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 你們把我害苦了

中春編輯：

因為準備考試，半夜十二點才回宿舍。從信箱中看到中春第卅期，我被精彩的内容吸引了。徐文立的申辯書使我不能釋手，一直讀到半夜兩點多鐘。讀完心情不能平靜，怎麼也睡不着了，乾脆又讀其它文章，一直到四點來鐘才入睡。第二天期中考，昏沉沉的沒有答好，你們真把我害苦了。

出國念研究生，有二次失眠，一次是愛人伴讀抵美的前一天，一次就是這回讀中春卅期。我告訴你們這個消息，目的是想讓你們知道



，你們的勞動沒有白費。致民主的敬禮！

大陸研究生于槐青

八五年十一月十日於密執根州

## 令共產黨寒心

讀到貴刊卅期刊載的徐文立獄中申辯，我真是久枕難眠。我是一名共產黨員、訪美學者。我感到，共產黨連徐文立這麼溫和、理性的有為青年都不能容忍，前途實在很可悲。

王炳章先生在其文中稱，徐文立的「我的申辯」令共產黨員讀後都感到心碎。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證明！

感謝編輯們使我們在留學期間飽享精神食糧，你們的辛勤工作會開花結果的。

一位黨員訪問學者十二月一日於美中

## 「我的申辯」英譯

剛讀完第卅期中的「我的申辯」。一方面對徐文立寄以無限的同情與支持，中共竟容不下這樣有頭腦的青年。另一方面對中共的政治黑暗感到痛心疾首。大好山河，掌握在這班野蠻人手裏，誠社稷之不幸。「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

本人提議將「我的申辯」譯成英文，讓天真爛漫的美國人看看，在中共統治之下，人權蕩然無存。美國人講的人權適不適用於共黨統治範圍。有些美國人對中共患了單思病，自作多情。所以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他們採取了雙重標準。這是對神聖的人權的諷刺，中國之春有責任向他們擺事實，說道理。

茲奉上小赤，聊作致敬！

忠誠讀者美國 黃瀛敬上

八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 給徐文立的女兒小瑾

小瑾：

你好！我是一位你不認識的叔叔，但和你一樣，愛你的爸爸，也愛你。在國外，有許多和你爸爸一樣的叔叔、姨姨。他們都愛你。因此，你不要自鄙，應該驕傲地做一個女孩子。

叔叔和你爸爸一樣坐過監牢，但叔叔和你爸爸一樣不是壞人。叔叔在國外讀書，希望有一日可以回國去，教給你和你的小伙伴一些故事，一些能使我們的祖國更美麗的道理，你一定要好好學習，等着叔叔拿到博士的學位，再去教你也變成一個博士。

你今年十二歲了吧，算來快要考中學了！你喜歡那一門學課呢？藝術？文學？科技？聽你爸爸說你喜歡尼爾斯的故事，叔叔也喜歡。尼爾斯勇敢、正義、樂於幫助別人，和你爸爸一樣。（所以你爸爸是一個老尼爾斯），你將來不要做一個中國的尼爾斯？或中國的白雪公主？叔叔給你帶一些錢，你不要喜歡它們，錢！是不重要的。只是因為你爸爸不能掙錢供養你上學。他在給中國人民掙錢，在給中國的未來掙錢，這些錢——也是你爸爸掙來的，記住！是你爸爸在監獄中省下來要你上學謀生用的，不要把它們亂花掉，那都是你爸爸的眼淚變的！——愛你的眼淚！

小瑾！你一定要愛你的爸爸，感謝你的媽媽，告訴你媽媽，在五洋四海之外，有許多中國人都敬愛你的媽媽和小瑾。

生活下去！

尋找快樂！

不要自鄙！

親吻你的黑頭髮！

叔叔耿晨八五年十一月法國巴黎

## 拿人的手短

讀到林樵清先生在貴刊廿八期上所發表的「台灣！台灣！」一文內中有一段說到國民黨對民社黨和青年黨放心不下，派了不少人員進駐。原因是台灣不准組黨，國民黨怕黨外人士大量進入民青兩黨，量變引起質變，而形成一個可以和執政黨抗衡的反對黨。於是先下手為強，先派人進去控制這兩黨；……於是民、青兩黨成了名符其實的花瓶黨。

我自己是青年黨員。其實何止現在國民黨才派人進駐青年黨？早在一九四六、四七兩年，我們青年黨中就不知有多少國民黨員，有些幾乎是擺明了的。更有些佔了關鍵地位，結果言論和行事的口徑幾乎全部是國民黨的那套！國民黨退到台灣後，我們也跟了去。那時我黨幾乎潰不成軍。國民黨要維持民主的門面，結果竟然撥出經費給我們。在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之下，如何能行使在野黨的職責？就是爲了這一點經費，青年黨中的幾個要員還爭得頭破血流呢？

就在去年，我們青年黨黨魁李璜先生竟然接受國民黨的邀請，成了總統府的國策顧問，情勢發展到這個地步，真是令人不忍卒睹。我們在台的青年黨真可以和大陸上的國民黨相互輝映了！多黨政治被中國人玩弄成這樣，真不由得不令人搖頭嘆息！

華僑 謝

源於加州

八五年十月廿五日

## 分權制並非最理想的制度

讀貴刊二十六期（八五年八月號）「分權富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談中國的統一與分治一文，我對許教授的論點大致是同意的。不過我得補充一點，地方分權制雖有些地方較中央集權制為優，但在今日這並不是最進步的制度。最進步的制度應該是均權制度。即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而以事權的性質來劃分，事權宜歸於中央者，屬於中央，宜歸於地方者屬於地方。這套劃分方式是孫中山先生鑒於世界各國，採用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的利弊得失而發明的，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就是根據這一理論而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的。此外，加拿大的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亦是根據此一理論而訂的。

至於目前美國採用的地方分權制，乃是因為他們的歷史緣故和政治習慣，在美國沒有獨立之前，是十三個獨立的邦，因為事實的需要組成一個聯邦制的國家；我們中國原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歷史背景與美國不同，人民習慣與政治情況也與美國不同，要把美國這套政治制度原封不動的搬到中國去用，是否合宜，得請讀者諸君多加思考。對中山先生的理論也可拿來做參考，才不會開倒車。

像美國的聯邦制，它最大的缺點就是機構龐大，疊床架屋，形成機關、人事、經費的浩大浪費。

由於他們的政治組織如此，所以形成的浪費也是驚人的，據我所知道較舊的資料，在二十年前，他們聯邦政府所屬的公務員就有兩百五十多萬人，其他各州政府所屬的公務員還不知有多少。諸位想想看，以中國人民的生產力，要去學美國政府這種浪費法，我們能富得起

來嗎？

所以，我覺得，不要以為人家的國家富強就事事皆好，樣樣都值得我們去學。如果真是如此，我們會畫虎不成反類犬。我們雖到外國讀洋書，但不可放棄我們老祖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與篤行的工夫啊！否則，我們都成了背書機、複印機，讀的書再多，於國計民生何益？

華僑 陳弘文 八五年九月二十日

## 抓準時機

讀了廿八期所透露的中共統戰密件及有關文章後，深感震驚，震驚之餘，復有體會如下：

我認為中共企圖利用台灣黨外力量來進行統戰，并非絕對壞事，不論其主觀願望如何，但其客觀效果，將有利于兩岸民主運動的發展。首先這表明中共終於重視了台灣的黨外力量，標誌着台灣民運已成一定氣候；這無疑對大陸的「黨外」是一大鼓勵，也證明中國的事不是國共兩黨可以說了算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民運發展出現一個新的契機：想當初西單民主牆時期，鄧小平利用民運來打擊凡是派，民運也利用了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將中國民主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如今中共想利用台灣的黨外力量，這又給海外民運反利用中共提供了一個時機。我認為具體運用此時機有以下幾點：

1. 呼籲台灣黨外勢力利用中共「一宣傳，二交友」的方針，主動進軍大陸；要求中共給予合法組黨組團及出版有關刊物的權力。此舉如能部份實現，則不但增強了台灣民運的勢頭，對大陸也有深刻的影響。如果台灣黨外力量

能率先在大陸組成對中共相當獨立的民間政治團體，出版與中共見解不同的刊物，就能大大刺激大陸人民的民主意識，促進不同意見的百家爭鳴，衝擊中共的絕對權威及其四個堅持，并為中國民聯合法登陸作準備。

2. 呼籲大陸的民主黨派大力與台灣黨外力量接觸、交流，向台灣的黨外力量學習，向中共要求民權；恢復當年創建時期的民主傳統，改變如今尾巴黨、花瓶黨的地位；創造時機來幾個類似於作協四大的「民主政變」。

3. 呼籲國民黨提高民主修養，增大民主氣量，以更民主的精神與黨外共商大事，不要作鎮壓黨外、緊縮輿論的蠢事。國民黨一再指責黨外在重蹈當年「民主人士」的覆轍，我看重蹈覆轍的正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當年之敗，原因之一在於專制獨裁，將一些本來中立而富于民主精神的團體（如民盟之類）推給了中共，因而自我孤立，終於眾叛親離。如今要吸取教訓，重視民意，勿再為淵驅魚。

大陸留學生 桑 羊於美國八五年九月廿三日

## 反對設計盟徽

敬愛的編輯先生：

我見最近兩期中國之春雜誌，徵求盟徽設計。我對所有已公開的草案都不滿意，但並非要另行設計一個，因為我根本反對甚麼盟徽。民主主義本質上反對那些徒具象徵，只引人感動，有自豪感，華麗的黨旗、制服、勳章這類東西只是法西斯份子才特別迷戀，法西斯主義特勢的德、意、日三國都是藝術文化高，但缺乏現代政治條件的國家，所以有最佳的旗幟、國歌黨歌到徽號。至於共產黨的旗或黨徽

章也不比法西斯份子差，而且有高度的象徵性意義——鐮刀和鐵錘，代表農民和無產階級，紅色更是進步、生命和吉祥的顏色，但也許史上最可惡的政治集團正是共產黨。共產黨的對頭國民黨的黨旗更有朝氣和時代感——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民黨所作所為大家都很清楚。當然共產黨「紅星」也十分出名。

反過來說，民主的政治集團，不會有太美麗的象征性事物，我至今也不知美國民主和共和黨的黨旗黨徽是怎樣的。英國工黨和保守黨，以至各國社民黨、自由黨、各激進少數黨派（如「綠黨」），都無出名的黨旗黨徽，在南歐各脫離蘇聯自立門戶，追隨及維護民主制度的共產黨，保留黨徽只是傳統，並已遭黨內外人士批評。至於非政黨政治集團，如工會和學生團體，都無突出的旗幟和徽章。

民運不應是靠漂亮的勳章、黨徽、制服去激勵戰士上戰場出生入死的戰爭，而是要靠理性、冷靜、容忍、氣慨的真英雄本色去打的艱苦但和平的戰鬥，如印度聖雄甘地和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那樣的。就是要用武力，也只應要設計新國旗如美國的星條旗和法國三色旗，這並非個別政治團體的徽號，而是代表全國的，多元的。

所以，我勸大家不必設計什麼盟徽，不如設計新國旗更有意義。

琳姆於香港十一月

## 刪改太多

近來數稿皆被貴刊刪改甚多，有者甚至失去原意。卅一期「劉添財台獨模式」一文「台

灣人」皆被改爲「台灣」，最糟的是「切腹」被改爲「剖腹」，而許多語氣都已非「劉添財式」了。

我不反對把太過囉嗦冗長的文句刪改，但應不失原意爲原則。

此信可否刊於下期「讀者、作者、編者」欄？

弟添財敬上

十二月十六日

對不起，並向您的來信致謝。——中春編者

## 更正啓事

本刊於上期（三十一期·八六年元月號）第九十三頁「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文中，誤將「（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黎音」植爲「（中國台灣留學生）日本·黎音」。在此本刊特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中國之春編輯部

## 望能贈閱

我是今年暑假剛從大陸（北京）來的研究生。

一年前我在大陸時，輾轉從友人處借閱到一期貴刊，在國內可以讀到。幾分國憂、幾分好奇，故一氣讀完。到美後，從朋友處又借得一本貴刊（九月，八五）。然僧多粥少，只允看一天，歸還後若有所失，但是靠在 DINING HALL 打工積累學費的我，實無力訂閱貴刊，故冒昧地寫信給您們，希望能免費得到「贈閱」。

就在我給您們寫信的時候，我同宿舍的兩位中國公費留學生，以及鄰室的幾位中國學生，叫我寫時代筆向您們問候，并且也非常希望我能如願得到您們的幫助，以便大家能有傳閱貴刊之機會。出于您們能理解的原因，他們不願意將他們的姓名通訊地址等函告貴刊，我當然應尊重他們的意願，故仍以我個人的名義與您們聯繫，希望能得到您們的諒解。

讀者陳月敬上

八五年十月十九日

## 百花齊放在異國

我在國內曾很榮幸地借同僚的福份讀過貴刊第十一期，往後便無處覓尋已實無法找到了。去年移民來美，已由十八期到現在必在書店裏購買讀之，而每讀之餘又聯想着國內的一系列情況之發生，都有着一種令人深省的體會，特別像我們年輕一代的華夏子孫，對目前國內的民主是值得探索的，貴刊能從「公道」的角度來闡述這一題材，我認爲是極必要和真實的。我是在大陸從事文化藝術工作十數年的青年，作品與文章也多發表在國內的刊物上，但多是以爲那些極左的一幫人服務的，哪有一「百花齊放」之文藝春天矣！但來美後，才深深地體會到，文藝的「百花齊放」春天只能離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異國土地上，故此我也爲着「平生喜歡寫作」的宿願，每月給報社送些作品文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將來也會給你們寄些作品去。只是不知像美國這樣「百花齊放」的情形什麼時候才會在中國出現。

大陸旅美作家趙愛華上

八五年十月二日



## 中共正把中國引向

# 理性專制

(國內)

董旭生  
楚青原

現在中國大陸的年青人，可以穿牛仔褲、跳狄士高、可以打扮、參加選美、發些小財……。中國，正在從毛澤東「非理性」專制的桎梏中掙脫出來。「願鄧青天多活幾年！」

但是，你注意到了嗎？鄧小平等正在有意將中國引向有一定彈性的「理性」專制模式，使中國在這一模式下穩定下來，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

### 理性專制與非理性專制

我們都知道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迥然不同，但專制本身在不同時期或不同國家間也有不同的形式。如斯大林和毛澤東式的專制就與赫魯曉夫和今日鄧小平、陳雲式的專制不同。前者是裏外皆硬的非理性專制，後者則是裏硬外柔的理性專制，但無論如何，其根本性質都是專制的。事實上，近幾年來鄧小平、陳雲等人正在有意識地企圖在人民的不知不覺中把中國一步步導向理性專制。

### 理性專制的表面特點

#### 黨內鬥爭殘酷性降低

與毛澤東、四人幫時代的非理性專制比，理性專制具有許多表面特點：

第一，黨內高層權力鬥爭的殘酷性降低。在這方面，可謂蘇聯的赫魯曉夫立了一大功。斯大林於一九五三年死後，赫魯曉夫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後，雖曾殺了當時的秘書警察頭子貝利亞，但却保留了部長會議主席馬林可夫的命，並仍給他一個發電站站長的職務，這比斯大林對反對派斬盡殺絕的行爲算是「理性」多了。赫魯曉夫這種較「理性」的鬥爭方式，無

疑成了前幾年上台的中共強人鄧小平效法的先例，而且鄧小平比赫魯曉夫做得還文明些。如鄧小平上台時對華國鋒，以及後來的一些反對派，都未採取打倒搞臭的方式，而是採取勸退安撫的方式，這無疑與當年毛澤東瘋狂整殺反對派的方式大為不同，開了中共權力鬥爭的「理性」方式的先河。據說中共八五年九月召開黨代會時，鄧小平曾與陳雲在幕後發生爭吵，後來鄧顯超出面才予以平息，但爭吵後，誰也未整肅誰。當然，這也因今日誰都沒有當初毛澤東那樣的絕對權力去整肅對方，因此，雙方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和妥協。這令我們想像到，在鄧小平逝世之後，胡耀邦、趙紫陽、李

鵬、田紀雲等高層領導人在權力鬥爭上可能不會採取太殘酷的方式，而可能會採取具有妥協性的「理性」方式。八五年蘇聯戈爾巴喬夫上台，其競爭對手羅曼諾夫因「病」去職，但并未遭到殺害。這種鬥爭方式，對李鵬等人或許有所啟示。但無論如何，權力鬥爭都是會存在的。當然，在中國，還不能排除軍方以非理性方式政變的可能性。

## 大權獨攬 小權分散

第二，對基層組織的放鬆。斯大林死後，蘇共對基層組織開始放鬆，讓基層黨員或幹部有一定的自由或自主權，如在校院、廠礦以及一些政、商、企業單位中開放適度的黨內民主選舉，這無疑會增加基層成員的參與感。最近幾年，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陳雲等人也在有意識地往這個方向上引導。事實上，他們已在這方面搞出了一些「樣板」，如他們已在一些學校、廠礦等基層黨組織、研究室、系以及少數縣、市政府機關中開放黨內民主選舉，並且讓基層組織的黨員幹部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定的活動自由。

毛澤東在文革前會形容他的統治模式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可惜，他是大小權都攬。真正搞「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是鄧小平。

## 知識份子的地位提高

第三，尊重知識份子，優待高級知識份子和有成就的專業人才。在今日之蘇聯，大多有成就的高級科學家、專業人員、藝術家、運動員等都享有很高的物質待遇和名譽。這與五十

年代初的中國很相似，如當時中國的一級教授就可領到三百五十元的高薪，像錢學森、華羅庚等一些高級科學家也能得到中共政府及中央領導人的極大重視，而一般的知識份子亦在社會上享有一定的地位。不過中國知識份子的這種好景并不長。一九五七年，中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自此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一落千丈，不僅有知識的人受歧視，而且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被關被殺，受到了慘無人道的迫害。他們這種悲慘的厄運一直延續到二十年後的一九七七年方才開始好轉一點，而這一好轉則是隨着鄧小平的復出而來的。

鄧小平復出後，一面為知識份子平反，一面恢復知識份子的地位，提高知識份子的待遇。而中共高層領導人對一些有貢獻的科學家和其它領域裏的一些專業人員，都能給予相當高的嘉獎和榮譽，如去年在奧運會上獲獎的李寧、童非、許海峰、樊菊杰等運動員以及不久前在中日圍棋賽上戰勝日本棋王的聶衛平，都會得到中共政府相當高的嘉獎。其次，中共為了提高黨員的文化素養，則以各種利益為誘餌，把大量對政治不感興趣的知識份子規勸入黨。例如，有些學校黨組織會對一些大學生示意，他們如果入了黨，則有可能會得到較好的分配，也可能會留校，等等；而一些廠礦等單位黨組織，則會以提職、被安排入第三梯隊、加薪等優待作為誘餌，說服單位的知識份子入黨。當然，中共為提高黨員的文化素質而吸收知識份子入黨，倒沒有什麼不好，不過操一黨之特權，以私利作誘餌，勸人入黨，這無疑歪曲了知識份子關心政治的目的。

再次，中共對出國政策及學術管制的放鬆，也應是中共開始尊重知識的具體表現。例如，近幾年，大批的公、自費留學生和訪問學者

來到資本主義國家，而國內的知識份子在學術交流方面也有了較大的自由，并能組織許多非完全官方的學術團體。

共產黨專制社會中，其社會結構的特點為：共產黨官僚（大權階級）——知識份子（中權階級）（注意：不是中產階級）——工農（無權階級）。社會的中層——知識份子的中權階級靠擁護和支持共產黨官僚（大權階級）時，社會的穩定性增高。蘇聯今天的情況就是如此，因為蘇聯知識份子享有較高的利益和權力。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毛澤東的反智主義使知識份子受盡屈辱和迫害，知識份子階級開始遠離共產黨官僚，故社會結構呈現不穩。鄧小平看到了這一點，他看到了蘇聯理性專制社會的相對穩定性，開始拉攏知識份子。這是值得整個社會、整個知識份子階層警惕的。

## 政治冷淡症

第四，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正在有意識地讓青年感染「政治冷淡症」。鄧淡化人民的政治意識，把人民的注意力從政治方面轉移開來。在文革中，自毛澤東講了句「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結果在大陸形成一個「人人關心政治，政治關心人人」的極端局面，當權者祇搞鬥爭不搞業務，老百姓也祇搞政治不搞生產，這種非理性的專政和極端的關心政治不僅拖垮了國民經濟，而且也使中共政治的黑暗和醜惡完全暴露出來，以致中共威信掃地，其政權也受到威脅，這對後來復職的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無疑是一個嚴肅的教訓。當然，像毛澤東這樣的專制統治者之所以讓人民關心政治，乃出於他利用人民群眾達到其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的政治野心。當初鄧小平不也是利用人民群眾運動來達到其復出掌權的目的嗎？一旦目的

達到了，人民用不着了，於是另一方面採取措施壓制民運，一方面不着痕迹地轉移人民的注意力，淡化人民的政治意識。例如：

①一九七九年後，鄧小平把魏京生、王希哲、劉青、徐文立等幾個較活躍的民運人士逮捕下獄後，則對其餘的部份民運人士進行百般引誘，使他們脫離政治，以達其對民主運動分而治之的目的。如李一哲的成員陳一陽，在中共的「照顧」下，則因安於所安排的工作而淡於政治；李正天則在中共的「指導」下走上了藝術道路。中共控制的宣傳媒介有時還特意為他們宣傳一下，一方面為自己樹立開明形象，同時也告訴人們：不走問政的道路，我可以容忍你。

②允許并鼓勵人民發財致富。近幾年，自鄧小平提倡「向錢看」以來，中共的新聞機器就大力宣揚「萬元戶」，對度盡幾十年貧困的老百姓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頗大的引誘，人民對發財致富的興趣濃烈了，但對政事國事却冷淡了。再說，由於中共允許人民對私有財產有了一定的自主權，如允許城鄉個體戶的存在，因此容易使一些人對政府滿足而不再多問國事。不過，由於中共所允許的發財致富是在國有化的體制下的發財致富，因此，人民發小財也許沒大問題，但若想發大財，那就不容易了，除非你有特權。

鄧小平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與毛澤東、四人幫的「窮過渡」形成對照。

③對人們日常生活的管制放鬆。早在六十年代初，蘇共為了減輕青年人的不滿情緒，就曾開始引進某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活方式和內容，如允許迪士可、爵士樂，甚至裸體舞在蘇聯流行。當時，蘇共的這種開放曾被中共指為變修，祇是中共未想到它今後也不得不走



近幾年，中共對人民生活的管制放鬆了，青年們脫了中裝換了西裝（左圖），與外國人的接觸也較自由了，右圖為大陸某大學的學生在與外國留華學生們跳舞聯歡。

上所謂「變修」的道路。不是嗎？在近幾年的大陸城市中，不也可看見許多青年在翩翩然跳着迪士可，在悠悠然聽着爵士音樂嗎？此外，在外來現代觀念的衝擊下，大陸青年不再發揚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而是熱心追求生活和工作的舒服和個人的自我美化，如他們開始講究穿戴、打扮，在實際上也變得較現實了，等等。總之，人們的生活比以前豐富多彩多了，比以前活躍多了，比以前自由一些了。人們的活動或言論祇要涉及政治，一般都沒人認真限制的。

這和毛澤東非理性專制時代男女一律穿藍黑制服的情形大不一樣。

總之，過去腐敗的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是讓人民「莫談國事」，而今日之中共統治者則是不着痕迹地引導人民自覺地「莫談政治」，這與毛澤東非理性專制時代泛政治化傾向又形成對照。大概當專制統治者們需要利用人民時，就會鼓勵人民按着自設的方案去關心政治，當他們的統治會因人民的關心政治而受到威脅時，就會強制或引導人民莫談政治。專制統治者讓人民關心政治也好，莫談政治也好，都是他們愚弄人民的伎倆，與民主國家中人民與政治關係的性質不同。

### 宗教信仰放一把

第五，開放宗教信仰自由。早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蘇共對宗教的管制就較為放鬆，蘇聯人民可以到教堂裏做禮拜，可以舉行各種各樣的宗教性活動。但當時非理性專制的中國大陸，宗教正處在被嚴禁之際，成千上萬的宗教人士遭到迫害，大部份教堂或寺廟被破壞或強佔。宗教書籍被查禁焚燒。鄧小平復出掌

權後，宗教政策得到恢復，并釋放一些獄中的宗教人士，為一些宗教人士平反，歸還所佔教堂或寺廟，出版宗教書籍，人們可到教堂做禮拜，也可舉行一些宗教性活動。儘管中共仍將宗教限制在「三自」的原則下，但畢竟是開放多了。據說，自宗教政策恢復迄今，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已猛增了五六倍。

## 共青團向聯誼組織蛻變

第六，共青團組織的蛻化。共青團向來被中共視為自己的得力助手和後備軍，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組織，其組織生活充滿了濃厚的政治氣味。但今日這個共青團組織蛻化了，蛻化成了青年們藉着從事娛樂和社交生活的團體，如團組織經常舉行各種舞會、娛樂晚會，組織青年團員們進行旅遊或野營活動；也幫助青年們解決生活或工作上的各種個人問題，如設立婚姻介紹所，幫助青年們擇偶。這無疑會增加團組織對廣大社會青年的吸引力，會增加青年們的參與感。

## 意識形態適度放鬆

第七，對意識形態的適當放鬆。毛澤東非理性時代，中共對馬、列、毛思想是獨尊的，對其他各家思想則一律否定。同時中共強制人民必須不折不扣地堅持馬、列、毛思想，因中共認為馬、列、毛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人民祇能信從，不能懷疑，更不能批判，以致久而久之，十億人民大都養成一個縱的、綫的、單一的思維方式，好像十億個大腦都變成了一個大腦。但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由於形勢發展與舊思想意識發

生衝突，因此中共已不得不把昔日所死抱的理論放鬆一點，對昔日所否定或批判的諸家思想學說，予以重新肯定，這樣中共才能較靈活地解釋未來多變的形勢。事實上，近幾年中共一方面已把黨在過去思想意識上犯的一些錯誤歸在「四人幫」或極左份子等人身上，一方面則對馬、列、毛思想給予新的解釋，如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評論員在「理論與實際」一文中對馬列主義的新觀點，就是一個極明顯的例子；其次，異化論和人道主義在大陸的提出，雖曾引起了一番激烈爭論，但後來還是被許多人接受和容納了；再次，哲學工作者在哲學的多元論方面的探討，則是更深一層的對獨尊馬列的懷疑和否定。總之，上述現象都是中共對思想意識的放寬。當然，這和鄧小平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觀點有着密切的因果關係，如中共既然開始注重實際，就不可能再極端地強調那些空泛的理論問題了。又如有的改革派首領為了免於思想理論上的過多糾纏，則有意識地引導人們少談政治理論問題，而祇談經濟問題。儘管中共對這方面放得還不穩，有時顯出收的跡象，以致給人收收放放的感覺，但這都是當前改革派與保守派勢力消長變化的反映，一旦保守派勢力穩定地式微下去，那麼所謂的放就會相對穩定起來，例如蘇聯近二十多年來的政策就比中共的穩定得多。

## 文藝的烏龍政策

第八，對文藝的有限放寬。近幾年來，中共的文藝政策呈現出收收放放、放放收收的形勢。事實上，收和放是形勢發展的一種因果關係，如白樺的「苦戀」因放而出，但「清污」

運動為收而來，但人們却衝破「清污」的堤壩，迎來了作協會議的召開；胡耀邦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為收而發，但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却又因放而出，等等。當然，由於收對放的制約，因此放的程度總是有限的。一般來說，作家們寫一些風花雪月的文章是自由多了，但寫政治黑暗的暴露文學就會遭到或多或少的壓制和刁難。在毛澤東非理性專制時代，情況有很大不同。像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可能發表，即使發表了，也會被送入牛棚。

總之，鄧、胡的文藝政策可以說是文藝烏龍政策——你可以飛，但飛不出它的籠子。

上述理性專制的幾個主要表面特點，有些是中蘇兩個專制集團共有的，有些則是中共特有的；所謂一些政策的放鬆，是相對的，有限的。例如，中共在一些實際運作中是採取放的政策，但却把「四個堅持」寫入憲法裏，築起了一個大框架、大籠子。但筆者認為，中共放收收的政策是一個非理性專制過渡到理性專制的必然現象，是新舊勢力不斷較量的反映，也是歷史發展的常見現象。筆者之所以列出上述特點，并非說它們有什麼不好，反而認為它們有相對的演進意義，但主要目的乃是要人們透過這些表面特點去認識專制制度的本質。

## 專制體制的本質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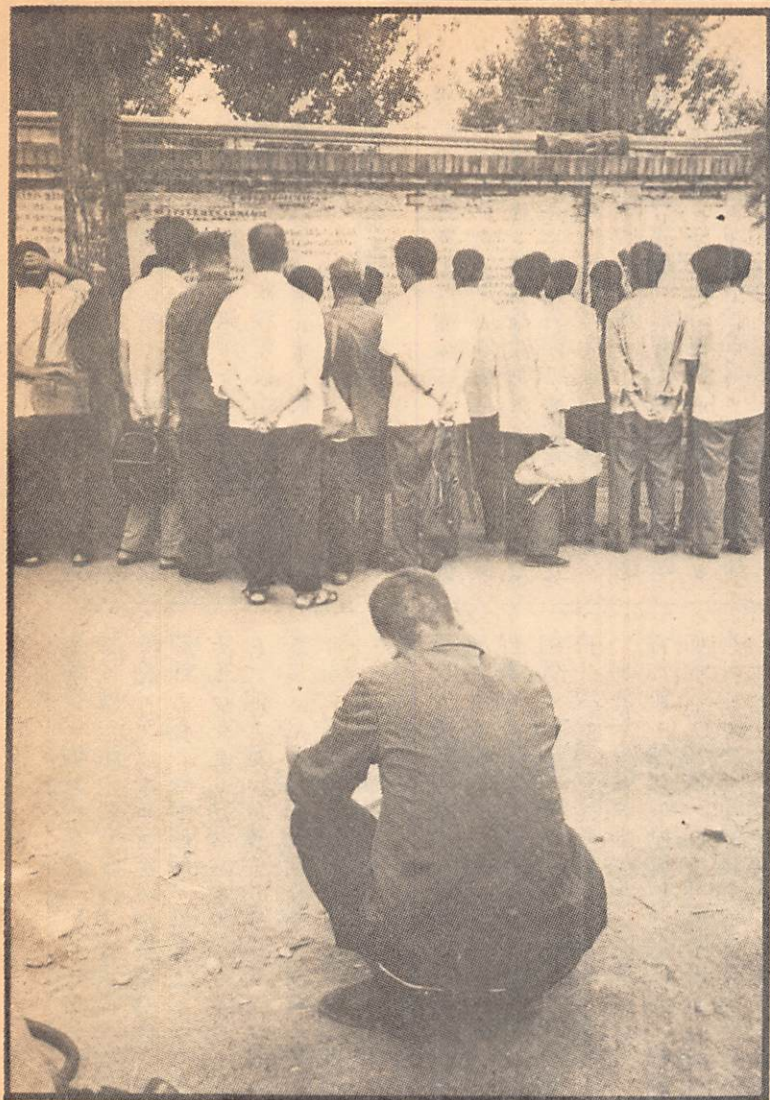
從上面文中我們看到，專制統治者對體制的表面層次可以放鬆甚或可以改良，但他們却不肯放鬆或改革體制本質的東西，本質的東西不改，它就仍是專制的。一般來講，它的表面變化祇能形成其專制程度上的不同，本文用「非理性專制」和「理性專制」來區別這種不同。但是，不管是理性專制，還是非理性專制，

其本質都是專制。專制體制在本質上究竟有那些特點呢？與民主制度有什麼根本不同呢？現在筆者就此試舉出以下數點：

第一，對言論、出版及新聞自由不放，執政者缺少輿論的制衡。無論是在今日的蘇聯或中國，人們似乎可以享受一些有限度的純生活上的自由，如跳舞、交際，也可以擁有少量的財產自主權等等，但人們却不能任意發表自己的政見，不能出版被統治者認為「大逆不道」的書刊，不能創設非官方的電台，不能從政治上批評政府，更不能實事求是地發表新聞，等等。總之，在專制者的統治下，人民沒有實質上的言論自由，沒有出版自由，沒有新聞自由。在近幾年的中國大陸，「苦戀」作者白樺不

是挨棍子了嗎？「異化論」作者王若水不是遭免職了嗎？「第二種忠誠」作者劉賓雁不是會氣憤得表示要封筆嗎？「四·五」運動後人民創辦的民刊不都全部被查禁了嗎？去年大陸興起的大量小報不也遭過查禁嗎？「中國之春」、「爭鳴」、「九十年代」等民辦刊物不仍是被拒於祖國的大門之外嗎？

第二，對民運鎮壓不誤。當初中國人民看到鄧小平與毛澤東、「四人幫」不同，本期望他復出後能給人民較大的自由和民主，為此人民自發地進行各種活動來支持鄧小平，但人民的期望落空了，因為人民原來看到的祇是鄧小平與毛澤東在表面上的不同，却未看到他們所共有的專制統治者的本質是難改的。一旦鄧小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看到對民主運動的利用價值已經完畢，于是下令封閉西單民主牆，逮捕了魏京生等民運人士。圖為昔日民主牆情景。

平重新掌了權，他可提倡「四個現代化」，可進行經濟改革，但却不可搞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他復出掌權後，西單民主牆被關閉，民刊被查禁，民運人士被逮捕，整個的民主運動遭到壓制。近幾年，中共能釋放許多國民黨軍官，也能釋放一些宗教人士，但就是不釋放獄中的魏京生、王希哲、徐文立和劉青等民運人士。

第三，不許人們真正有結社、集會和遊行示威的自由。近幾年，儘管中共可允許大陸人民成立極小的純學術性的社團，但絕不允許任何有政治性的社團存在，如徐文立等人籌備的「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還未成立，就被打為「反革命組織」；至於集會和遊行，在黨、團組織的「領導」下也許可以，但若是人民自發的集會和遊行示威，則要遭到百般阻撓或壓制，八五年北大學生和西安各大學學生自發舉行的「九·一八」示威活動就遭到當局的無理限制。

第四，不許人民有組織新黨的權利，不許其他政黨與自己平等競爭。專制統治者連一般政治性的社團都不容人民成立，當然更不會容許人民有成立政黨的權利。在中國，至於一些既存各黨派，早已成了「花瓶黨」，在理性專制下，和平共存也許沒大問題了，但要平等競爭，恐怕是絕不可能的了。

第五，在中上層權力轉移上採取世襲和禪讓相結合的制度。民主國家在政府權力轉移上是採取制度化的民主選舉方式，但專制國家則不會搞出真正的民主選舉，因為沒有任何政黨可與統治者平等競爭。他們若在自己的統治集團中搞選舉，如八五年九月鄧小平、陳雲等高層領導曾在黨代會上參加投票，那完全是表演給外界看的，沒有任何意義。但他們都會按



黨內的指定培養所謂的接班人，或搞什麼第幾梯隊。在這些接班人中，一部份是幹部子弟，一部份則是被某些幹部發現的可以追隨自己的所謂「賢者」，由此可見，專制統治者在權力轉移上所採取的方法，既有世襲的色彩，又有禪讓的色彩，這是理性專制者的發明。

第六，不能充分地尊重和保障人民的人權。不久前在日內瓦美蘇兩國舉行的會上，美國總統雷根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雙方都曾愉快地談論世界和平問題、限武問題等，但當雷根談及蘇聯人民的人權問題時，戈爾巴喬夫則大感不快，由此可見，人權問題却是蘇共集團不願重視的問題。今日中國大陸人民的人權又如何呢？除了人人皆知的魏京生、王希哲等知名民運人士的人權受到了侵犯外，在大陸不知還有多少無名百姓的人權毫無保障呢？八四年鄧小平一聲令下，打擊刑事犯罪份子的運動一夜間波及全國各地，短短三兩月內，成千上萬的人被處決，這就是專制統治者無法治無人權觀念的具體表現。

以上幾個主要特點是區別專制體制與民主體制的本質特點，一般來講，凡保留這些本質特點的體制，都是專制的，非民主的。

## 制衡系統的重要性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看到，不管是非理性專制，還是理性專制，社會都缺少一個健全的制衡系統（或稱負反饋系統），因此，不能稱為民主制度。

有人總是說，現在不錯了，政策比以前好多了。鄧小平則說，怎麼能夠保證政策不變，主要看政策對不對頭，政策對頭，就能保證不變。這種看法說明，鄧小平根本不懂得制衡的

原理。怎麼才能保證政策的連續性？我們的看法是：祇有建立有效的制衡系統。當執政者的政策出現偏差時，制衡系統可以及時將之糾正。問題不在於當前的政策正確與否，而在於制衡系統的建立與否。

健全的制衡系統包括：

- 一、輿論制衡，即言論出版自由，社會信息全面而準確地直達決策者。
- 二、權力制衡，即分權原則。國家最高層一定要分權，互相鉗制。
- 三、選舉制衡，即民選制。決策者做不好，人民就要罷掉他。

中共主要決策者要把中國帶上理性專制的道路，并未着手在中國建立完善的制衡系統。今後，他們在做決策時，可以改變毛澤東、林彪一、二個人說了算的情況，而會找些專家進行協商和諮詢，但他們決不想放出權力，不想把自己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也就是說，當領導者的決策出現偏差時，人民仍缺少制衡系統糾正之。

## 專制統治者為何要走理性專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一些封建統治者作為自誠的辯證哲言。其中水乃指人民，舟乃指封建統治者。過去凡能明白這一哲理的統治者，大都能吸取前朝覆滅的教訓，實行較開明的官僚專制，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唐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李世民稱帝後，常以隋亡為戒，知人善任，察納雅言，勵精圖治；對人民實行較開明的專制制度，如推行均田制，節徭役，興水利，發展科舉制度，等等。不多年，國強民富起來，史稱「貞觀之治」。但他同時也在一面積極

地鞏固其中央集權的統治，一面整軍經武，西征東伐。當然，唐太宗的這種開明對人民也有善意的成份，但主要的還是因他要鞏固自己的皇朝統治。事實上，唐太宗也大規模地鎮壓了竇建德、王充等人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九七六年北京天安門前的「四·五」運動不僅敲響了毛澤東秦王朝的喪鐘，而且危及了整個中共統治政權。鄧小平看到這一點，如果再不進行改良，如果再不收斂一下非理性的瘋狂專制，那麼中共統治者就有被人民覆滅的可能。鄧小平因怕亡黨，於是推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與人民之間的一些矛盾。然而，鄧小平也祇作出一些體制表面上的改良或放寬，而在專制的本質層面上却沒有顯著的放鬆。同時，他反而在某些方面借用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更加強化了其專制機器。鄧小平的這種做法，無疑是消解了大部份的民主力量，這是專制統治者一個很高的手法。當年拿破侖在法國稱帝後，為了消解法國人民的民主力量，就是利用這種手法的。如拿破侖於一八〇四年制定保障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私有財產的民法後，也制定了限制工人罷工和結社的法律，並且建立了強大的警察機構。

總之，專制統治者會走向理性專制，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也是為了消解新興的民主力量。近幾年來，有不少中國人把鄧小平、陳雲等視為「大青天」，把鄧、陳今天的政治視為「清官政治」，豈不知「大青天」乃中國特色的封建專制下的產物？豈不知「清官政治」乃是「贓官政治」的反義詞？你若肯定了今日中國大陸的「大青天」，這不恰恰否定了今日中共的社會主義了嗎？你若認為鄧、陳政治是「清官政治」，那麼這不就說明鄧、陳以外幾十年的大陸政治都是「贓官

政治」了嗎？說不定鄧小平某天明白過來，會向稱他「大青天」的人大發龍威哩。據說，有些被平了反或被放出國的知識份子，就像被騙昏的無知幼童一樣，整天念念不忘地要向中共感恩報德，真是阿Q跪堂却不知縣老爺會罵他奴才！假如冤案不是中共給定的，現在中共給平反了，那是理所當然應感謝中共的。否則，在邏輯上根本講不通。筆者并非說中共為冤案平反有什麼不對，而是認為中共是應該為之平反的，這種知錯能改的勇氣仍是值得肯定的。其次，筆者也并非完全否定「清官政治」的意義，在一個專制國家中，出現「清官政治」總比不出現好。而是認為我們這個民族，至今仍把命運完全寄託在偶爾出現的「清官」身上，是極為落後和不可靠的，是對今日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莫大諷刺！

## 理性專制的可怕之處

專制猶如一個鐵球，鐵球外面套上一層或兩層橡皮，形成一個外軟而里硬的皮鐵球，這就是本文所謂的理性專制。它看起來像皮球，是軟的，但你若往地上摔它幾下，你就會看到它總是跳不起來，這是鐵球的本質所決定的。不過，由於它外面畢竟加上了軟的橡皮層，因此它也會具有很小限度的彈性，這種彈性有消解民主力量的功能，這就是理性專制的表面特點。當人們受了鋒利刀刃的刺傷時，人們會馬上感到劇痛，並會見到鮮血從傷口流出，這是硬傷或外傷；但人們若受到一個皮鐵球的擊打時，祇會感到一種沉沉的隱痛，無傷無血，這是內傷，會慢慢地使人致命。理性專制就如這皮鐵球一樣，是一個慢性殺傷物，特別是在一個人人民民主覺悟不高的國家中。這是一處可怕

的地方。

理性專制雖在表層有一定的改良，但本質結構未變，因此在這種制度下，統治者對國家的控制相對來說會較為穩固，軍事科技也會得到較高發展，但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却仍很難發展，今日蘇聯就是一個例證。

## 理性專制可能變為非理性專制

理性專制在一定條件下容易變為非理性專制，非理性專制之所以有時會轉化為理性的專制，乃主要因專制體核心人物的更換所致。新核心人物若是較理性的專制者，那麼他就會使專制理性一些；若是瘋狂的專制者，那麼他就會使專制也瘋狂起來，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澤東都是這種歇斯底里的專制者。有人說中國再不會出現第二個文革了，我們認為，祇要制衡系統未建好，文革可隨時再演，祇是規模可大可小而已。如果中國仍保持一個專制制度，如果在我們這一代經受過文革的人都死後的中國人仍停留在無民主覺悟的愚昧狀態，如果那時中國再出現類似毛澤東和四人幫式的人物，他們把祖國的大門再關上幾年，然後搞起個人崇拜，那麼掀起第二次文革是不太困難的。但願這些假設永遠不會應驗。但無論如何，這是理性專制可怕的地方。

## 理性專制的相對穩定性

一、理性專制有它的迷惑性。毛澤東的非理性專制固然令人毛骨悚然，但專制的本性容易暴露，人們容易看清專制的面貌，在高壓之下，人民有求變的心理。文革之後的轉變，首功應歸於毛澤東。反之，理性專制有很多的漂亮外衣，有各種供參觀用的「樣板」，不但外

面世界認不清（很多美國人就被中共哄騙了），裏面的人有時也被迷惑。人們在迷惑之時，求變心理不強。

二、理性專制有它的滿足性。理性專制下，人民有些小自由，可發上一點小財。這對於一個容易滿足的中華民族來說，有着特殊的危險性，因為人們知足了，就不太想改變現狀。

三、理性專制有它的相對穩定性。理性專制較非理性專制具有較大的彈性，加上它的迷惑性和滿足性，故相對穩定。蘇聯的專制模式要較毛澤東的專制模式穩定得多，這是不爭的事實。中共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理性專制的架構，就是想增加其專制的穩定性。

## 把中國推向民主多元社會

文革之後，中國集權專制制度開始崩解，社會出現了鬆解的傾向。中國共產黨的某些領導人看到了毛澤東非理性專制的硬性結構已不適應於中國的社會，已威脅到共產黨的自身存在，便開始摸索新的方向。自一九七七年至今，已摸索了八年之久。現在，他們的心中大概已經定底：一步步地把中國導向理性專制。和蘇聯的緩解，準備任命李鵬為總理，準備向蘇聯和東歐大批派遣留學生，都在為此做準備。這是一個危險的傾向！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中國在一個類似匈牙利或蘇聯的理性專制架構下穩定下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將大大拖延。

中國現在有兩種走向：一個是理性專制社會，一個是多元民主社會。何去何從，命運就掌握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我們應該把握時機，防止中國穩定在理性專制的架構上，把中國社會推向民主和多元。

# 鳥籠人權



鳥兒可以「飛」了，但必須在專制的籠子裏面飛。

##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

● 本刊評論員 ●

本期我們發表數篇關於中國大陸人權現狀的評論，其中有美國國會舉辦的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的證詞。

多數對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有長期研究的專家認為，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共為許多冤假錯案平了反，恢復了地主、富農的公民身份，廢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進行了對法制觀念的宣傳教育，加強了一些法制的改革工作，等等，使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有了一定的改進，這是應當肯定的。但也指出，這種改進是有限的，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並未有根本上的改變，人權現狀還極待進一步改善。

中共自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以來頒發的新憲法和有關法律，一面恢復和增加了有關公民權利和自由的條款，但一面也列有四項基本原則和「不准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等可以在政治上制裁公民的條款；一面列有保障人民「通信的自由」，一面又列有准許公安和檢察人員以「國家安全或調查罪犯」為由依法拆檢信件的條款等等。法律條文的矛盾和含糊，給一個黨高於法、司法不獨立而又無監督制衡力量的國家中的執法者提供了可任意解釋及任意加罪於人的藉口。現在，大陸人民能享有的人權和自由不僅是有限的，而且也是極無保障的，隨時都有被無理剝奪的可能。

一個人為一隻鳥解綁時說：「鳥兒，你現在得解放了，有自由了，你有權飛了，但你在行使飛的自由權時，可一定不能撞着我的籠子！」如果說毛澤東把人民綁了起來，鄧小平則在毛後做了鬆綁的工作，但同時也給人民罩上了一個籠子。這籠子就是北京當局對公民的人權和自由的諸般不合理限制，人民則如籠中之鳥，有在籠子裏飛的「自由」，但要極為小心，否則一碰籠子就會有魏京生、徐文立的下場。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大陸，人民只能「享受」上面恩賜的一點有限「自由」，但無保護這點有限自由的權利，更無制止和監督政府侵犯自身權益的權利，這樣僅能「享受」的有限「自由」是無保障的。

中國人民要想真正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人權，不僅要拆除中共諸般限制的不合理鳥籠，而且還須要求保護自身權益的權利，要求監督和制止任何侵犯自身權益的權利。人民只握有橄欖枝還不夠，還要握有弓箭，否則猶如籠中之鳥，被侵犯時束手無策。

從鳥籠經濟到鳥籠人權，這就是北京當前一系列改革的寫照。

索拉茲議員



# 美國國會中國大陸人權聽証會開幕詞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

## 衆院外交委員會亞洲太平洋小組主席索拉茲

(本刊譯者)

周立仁

編者按：美國國會衆議院於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在衆議院雷邦大廈舉行了第一次中國大陸人權聽証會。以下刊登的，是索拉茲衆議員的開幕詞以及哈定博士、丘宏達博士及黎安友博士在聽証會上的證詞。開幕詞及證詞由本刊譯者譯，譯文與原文如有出入，由本刊負責。

上個月是主宰中國政治制度三十多年的毛澤東去世九週年。作為一個革命者和空想家，毛澤東試圖以他的想法改造中國社會，但他却使中國人民疏遠了他們的政府，損害了中國共產黨。毛死後，鄧小平和其他的中國領導人試圖把中國從經濟和政治崩潰的邊緣挽回來，使他們的黨重新獲得政治上的信託。

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毫無爭論地認為，毛澤東的統治，至少在它的後期，是二十世紀的暴政，為了把一種正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人民，結果造成了普遍的蹂躪人權。今天世界所關切及作為本聽証會的基礎的問題是，中國在開放政治制度的方向中，改變了多少？還可能作到什麼程度？

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與人權暨國際組織小組委員會，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舉行兩次聽証會，這是第一次。我很高興與並列主席、我的好友、同僚雅特隆萊議員參與評估，這是小組委員會四年多來進行的第一次評估。今天的聽証會以個人證詞為主；本月底的聽証會將聽取國務院和人口普查局的代表的證詞。

總的來說，中國今天比九年前穩定多了。政府的政策更加務實。人民的生命受到國家權力專斷處置的情況大為減少。但是肯定仍有許多事項，是這兩個小組委員會及美國人所關切的，仍有一些領域是我們將在這兩次聽証會中要探索的。不過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認識：一種共產制度已經有了很大的質變。

我們無意經由這些聽証會來干預中國的內政，也無意要把一種意識形態的藍圖強加於中國。我們最先承認：民主政府本身並非十全十美的。然而，在一個民主國家，人民的價值必然會在它的外交政策中表現出來，猶如人權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表現出來一樣。這種聽証會將集中我們對其他國家的了解與認識，並使這種了解與認識在我們的對外關係中產生影響。

這兩次特別聽証會，有現實的意義。八月八日里根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的一九八五年的「國際安全與發展合作法案」中有一條規定，它授權總統在他認為符合國家利益時，可以取消對一個共黨國家經濟與安全援助的禁制。我預期總統會行使這一權力，取消對中國的禁制。如果政府在某一天要求國會授權援助中國

，國會將依法根據中國的政治情況和人權紀錄，對這一請求進行評估。這兩次聽証會，就是評估的開端。

今天在聽証會上作證的是：

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哈定博士 (Dr. Harry Harding)

馬里蘭大學法學院丘宏達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但是黎教授今天陳述的是國際特赦的觀點，而非他自己的意見。這是有點遺憾的，因為黎教授最近剛出版了深獲好評的一本書——「中國的民主」。對您這部學術著作，黎教授，我和其他委員一樣，想問一些問題，但今天忍住不問。

各位以前都在本小組委員會作過證，我們歡迎各位的再度光臨。大家都記得我們的慣例，各位的書面證詞將全文列入紀錄，請各位以十到十五分鐘時間扼要說明其中內容，使小組委員會委員有充分的時間發問。現在由哈定博士首先發言，以後由丘、黎發言。



哈定博士

# 希望中國政治改革永不停息

## 在美國國會中國人權聽證會上的作證

(美國布魯津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哈定

(本刊譯者) 周立仁

應國會兩個備受尊敬的小組之邀，來為中國最近的政治進展問題作證，本人深感榮幸。同時感到：為這個問題作證也極富挑戰性，因為，毛澤東死後中國所進行的改革，是一個異常複雜的研究課題。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改革，對美國人來說，是很難瞭解的。有些觀察家傾向於誇大此改革的目標及其範圍，聲稱中國已經放棄馬克思主義，引進資本主義，甚且，有時還暗示：中國已採多元化的政治形態。相反的，也有許多分析家，對中國基層政治及經濟結構的改變，採取相當保守的看法。他們認為：那些改革祇是蘇聯式經濟制度的皮毛修正。關於人權，中國仍然停留在毛澤東統治時代。

甚於時間關係，我想將毛之後的中國政治改革狀況簡括如下：①中國尚未建立多元化或類似多元化的政治體系；但是②現階段的中國，已比過去共產黨統治三十六年來的任何一時期都更為開放；③大幅度倒退的可能性很小，在最近的幾年中，政治上有可能進一步開放。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國實施了哪些重大的政治改革呢？

首先，對十億人民的日常生活的任意政治干擾已大為減少。藝術方面，不論形式或內容都更具多樣性。知識份子的言論，受到調查及搜索的情況減少，言論甚至還可以涉及政策性問題。一般在衣著、嗜好、儀表及宗教活動上，黨已能包容更多的選擇性。最近的經濟改革，削減了基層領導、特別是公社幹部、企業管理人員的權限，以避免對一般老百姓及工人的任意控制。

生活方面開放的同時，仍有很多控制措施，但政府加強了這些措施的規範和預測性。法律制度剛開始成形，對老百姓在實質上和程序上應有的權力，有了更全面的規定，並規定老百姓應免於被肆意拘捕、囚禁及虐待，對憲法上的「反革命」罪，也有了更明確的界定。階級歧視——如毛澤東時代三百萬人被扣上的「右派」、「走資派」等頭銜，已經解除，其他的如當時的地主、資產階級、富農等所受的污辱，亦都得以平反。

其次，參與政治的機會增加了，特別是被認為可對經濟現代化做出貢獻的那些團體。另外一點值得注意：中國是目前有選舉制的共產國家中，少數實行地方選舉的一個。更具意義的是，國策制訂之前，中共進行廣泛地正式與

非正式的意見協商。黨的政策被越來越多地送到立法機關訂為法律，立法時，常被立法機構輕度修正。中共起草的主要文獻，包括去年的城市經濟改革決定和最近的第七個五年計劃，都能在經過全國性的公開討論及會議商訂後有所修補。國家做重大決策時，向研究機構的諮詢正在加強。

第三方面的改革，關係整個國家結構及經濟體系的復甦。以往較老的官員，已由年輕而且教育程度高的人員所取代。同時，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以避免直接受黨的限制。官僚體系、公職任期、退休年齡的修正，經過這些改革，已逐漸制度化。其他，黨對各種組織的控制權限，也受到相當的限制，絕大部份在黨的體系中任職的官員，不能同時在國家的體系中兼有職銜。省長、工廠管理幹部、研究機構的所長、大學校長，有更多的權力指派自己的部屬及制定自己的行政決策而不須經由黨委書記的指示。

第四，毛死後的官僚制度，在內容及範圍上，都有重大的改變。黨幾乎已經放棄所有毛後期的重要原則，特別是「階級鬥爭」和反對所謂「走資派」。更重要的，黨已經廣泛地認識到知識性、科學性、技術性問題的重要性。

比起毛時期，在經濟政策、政治組織上，已不再嚴格恪守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目前，馬克思主義祇是作為指導國家未來前途的大目標，而不是作為國家實際決策上的細則及不容觸犯的天規。

最後，鄧小平嘗試使上層政治步向正常與穩定，也嘗試克服文化大革命十年來所造成的裂痕與強烈衝突。軍隊不再廣泛干擾民事。在領導層中恢復傳統的集體領導，服從多數，尊重少數；訂立了官員在職期限及權限，以防安插親信等，所有這些都降低了政治上的衝突。以上所談，是一些已經或正在實行中的政治改革，但是，另一方面的情景如何？政治上還有哪些方面相對沒變？

如我所言，中國的政治改革，不論已經實施或正在實施的，都受到相當的限制。下面是幾項重點：

第一，政府對社會控制放鬆的程度以及黨對政府控制放鬆的程度，都頗為有限。黨對於政府及國營大企業中的關鍵職位都有指派權。地方選舉候選人的提名、地方立法，都受到上級指使；黨仍在監視社會上的各種社團活動；國家絕大部份的重大決策都由黨，而非由國家來制定。此外，黨仍然週期性地進行所謂根除「不健康傾向」、清除「精神污染」或其他「不當行為」的努力，儘管其干涉範圍與方法較前有所收斂。

其次，雖然教條的色彩已大幅降低，但中國領導階層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國家最高指導原則。現在，在社會各個層面，黨已不再恪守馬克思教條，並容忍很多民衆對馬列主義的淡漠態度。黨也允許、並在相當程度上鼓勵創造性地解釋馬克思主義。然而，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中共不容倡導任何其他意識形態。

第三，老百姓對政治的自主參與權，仍然受限制，不僅某些言論的發表會受到限制，甚至用什麼方法表達也會受到限制，尤其限制獨立的政治團體去追求本身的政治目標。一九七九年初，鄧小平訂了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堅持」，限定了政治討論的容許範圍。從本質上講，四個原則涉及黨的領導權、國家的基本結構、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及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此外，法案的提出或否決、工人的罷工權、報章雜誌的獨立出版權，仍然受到限制。最重要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團體，可能在聲稱脫離黨的領導下而獲得成立。政府仍然保留權利，以便控制任何非官方認可的組織，包括職業團體和工會。

最後，仍無堅實的保證使過去六年來的政治改革制度化。法律制度還沒有健全到足以防止領導階層去濫用權力的程度。政府仍然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嚴厲措施，而卻又對黨內官員從輕發落。兩者往往都是受到行政上的處置而不經正規的法律程序。人民在憲法上的權利很容易被收回。例如一九八〇到一九八二年間，便不允許寫大字報或罷工。最重要的是，黨的組織網、公安系統、新聞、出版的控制等極權主義架構，雖然已經大幅度地鬆動，但尚未完全解除。

如我剛才所言，中國政治改革的成績及其改革的限度，是難以評估的。它能改多少？限度多大？平衡點在哪裏？

且讓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做個回顧與展望。中國現今的政治體系，已較文化大革命時期大為開放，它不僅僅相似於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間所謂的「百花齊放」時期，它似乎較那個時期更為穩定、更具持續性。公平而論，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今天的政治

形勢乃空前的開放、寬容、自由，而且規範化。比較其他社會的政治體系，我認為中國已不再算是極權專制制度（TOTALITARIAN SYSTEM）。然而，中國也絕不能算上一個多元社會，甚至也稱不上是一個準多元社會。因為中共禁止反對黨的成立及對立性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成。我稱中國當前的制度為「協商性專權主義制度」（CONSULTATIVE AUTHORITY-FARIAN SYSTEM）。

未來如何？簡言之，中國幾乎不可能再會回到毛時期的極權統治——一種被絕大多數中國人所唾棄的政治制度，一種嚴重阻撓中國步向經濟現代化的制度。即便鄧小平倡導的經濟改革有某些回潮，我認為其出現機會也不足以百分之五十。

中程來說，至本世紀末，我相信中國的現存政治制度將可能再發展、再完善。有組織的或自發的都市抗議行動可能出現，政府因此週期性地採取鎮壓手段。但是，主要的傾向將是擴展立法權及司法權，提高政府官員的平均教育水準，政府進一步與官方認可的職業團體和群眾團體協商，更高層政府官員的直接競爭選舉亦有可能出現。

遠程上，二十世紀初，中國可能繼續現代化，財富增加，經濟控制放鬆，與外國文化教育界的聯繫加強，迫使中國更趨於開放，壓力也會隨之而來。我們很難預料，中共對此種發展會採取怎樣的對策。樂觀的是，一些年輕知識份子（他們很多已身居要職）相信，還會有更顯著的改革，包括進一步降低黨的作用，以至出現真正的組織多元化。這將呈現某種希望——我強調，這僅僅是一個希望——中國政治的解放過程可能會永不停息。

丘宏達教授



編者按：丘宏達博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律系博士，現任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著有「國際組織締約的能力」（海牙出版）及「中共條約彙編」（哈佛大學出版）等。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在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暨國際人權組織小組委員會、亞洲及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就中國政治發展與人權狀況舉行的聽證會上，丘宏達博士應邀作了如下證詞。證詞由本刊譯者譯，譯文與原文如有出入，由本刊負責。

# 中國最近的法律發展與人權情勢

● 本期專題 ●

（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 邱宏達

〈本刊譯者〉周立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去世後的領導班子的主要考慮之一，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以便提供一個較為安穩的環境，來實施它雄心勃勃的四個現代化。爲了達到這一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仍然維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革它的法制，以圖建立一個有限程度的「法治」和對人權有限程度的尊重。一九七九年中期頒布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在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一九八〇年制定的暫行律師條例，於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生效（在此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允許某些律師開始執業）。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大擴充了它的法律教育和研究。

法律改革中最顯著的，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頒佈了新憲法，一位中國著名學者認爲它「明白宣告了『以法治國與充份肯定法治』」的重要原則。在走向一個比較穩定的制度的積極發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展開了打擊刑事犯罪運動，在

運動中至少草率地處決了一萬多人。本文首先分析新憲法，其次，明確地確定，哪些民權是新憲法與其它有關法律和行政命令所實際承認的，第三，檢討打擊刑事犯罪運動，第四，探討政治犯問題，第五，司法獨立問題，最後，探討這些發展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 中國的一九八二年憲法

一九八二年憲法，和以前的三部憲法一樣，有一篇序言和四章。序言的重要性在於它顯示了中共對中國歷史最近發展的觀點，並透露了對內、對外政策的趨勢。要改變中共對中國近代史的解釋並支持其新的政策的立場，必須拋棄整部憲法，因為修訂就太累贅了。

第一章名爲「總則」，載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各種政策。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以工人階級爲

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它並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基本制度」，「不准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採用民主集中制」。這些規定明白表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一個極權制度的國家，它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容反對的，決策過程是在「集中制」的名義下，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中。

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二章，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共有二十四條（第三十三條至第五十五條），佔全部一百三十八條的百分之十七點三九。第三章是關於國家結構，第四章即最後一章，規定國旗、國徽和首都。

總的來說，除了未見列入居住自由外，這部憲法恢復或擴大了一九五四年憲法有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條款。最顯著的一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十三條）。在宗教自由方面，新憲法刪掉了一

九七八年憲法中所載宣傳無神論的權利。它規定「國家保護正當的宗教活動」，但又說宗教事務「不得受制於國外」(第三十六條)。新憲法保證「秘密通信自由」，但同時又准許公安、檢察機構，爲了「國家安全或調查罪犯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檢查信件(第四十條)。

憲法的主要增訂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個人尊嚴不容侵犯。不得以任何方法侮辱、誹謗、中傷或誣控」(第三十八條)。在人身自由方面，增列了：「禁止以拘禁或其它方式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個人自由；禁止非法搜查人身」(第三十七條)。憲法特別強調公民的權利與義務不可分割(第三十三條)。中國人民不但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工作(第四十二條)和接受教育(第四十六條)。增列的公民義務有一項是保守國家機密(第五十四條)及在行使各種自由和權利時，不得侵犯「國家、社會、集體的利益，或他人的合法自由與權利」(第五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可利用這些措詞含混的規定，限制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

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公民有批評國家機構之權，也可對國家機構提出訴願，以建立國家在侵犯公民權利時的賠償原則。

除了第二章一些條款外，還有一些其它條款，是與執行公民的權利義務有密切關係的。第一章第五條確立了憲法至上的原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的幾部憲法中，沒有可相比擬的條文。因此，在一九八二年憲法中列入這一條文，明白顯示了目前的領導班子，是比較認真的要提高憲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

尤有進者，一九八二年憲法在第三章的第一百二十六條和第一百三十一條中，恢復了一九五四年憲法中的司法和檢察獨立。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根據

### 一九八二年憲法與有關

#### 法令所享有的民權

上述憲法規定，如果真正實施，將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一定程度的「法治」和人權的尊重。但是不論你如何樂觀，在法律與事實之間，仍存有尖銳的矛盾。最嚴重的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法與行政機構，是否可以制訂法律與頒佈行政命令，限制公民享受憲法賦予的權利，和增加公民的義務。爲了說明此點，下文提供了幾個實例：

(一)雖然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選舉法，却在選舉人大代表的規定中，歧視農村地區的公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每十三萬人產生一名人大代表，但農村地區每百零四萬人才能產生一名代表。由於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地區，所以選舉法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是一種歧視。在中國最近的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見下文)，一直有人抱怨，有權位者及與有權位者有關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二)第三十五條保證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和示威自由」，但實際上，除了極爲特殊的事件外，任何人如果爲了政治目的企圖行使這些自由權利，都會受到懲罰，而且大多數都會被判入獄或被送往勞動教養所。

(三)第三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批准，不得逮捕。但是在許多定義模糊不清的情況下，諸如「無正當職業」、「拒不接受工作調派」，公安機構

可以逮捕人民並送往「勞教所」進行再教育，最高可達四年。這一措施的依據是國務院在一九五七年關於通過勞動進行再教育的決定，以及人大常委會後來在一九七九年通過的「通過勞動進行再教育的補充規定」。

(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七九年制訂的刑法的第七十九條中允許類推適用的方法，這就破壞了憲法意欲建立的以「法治」爲基礎的精神。

(五)第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夫婦雙方均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但是國務院却專斷的確定了一家一嬰的原則，並強迫準備生育第二胎的婦女墮胎。違者將受到罰款、開除工作等嚴厲懲罰。

圖中牆上為中共的計劃生育宣傳畫，上寫着「媽只生我一個」。





(六)一九七九年的逮捕與拘留條例規定除非妨礙調查或無法通知外，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將逮捕的理由和拘禁的地點，通知被拘留或被捕者的家屬，(第五條)。在最近的幾個案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顯然是應用第五條的例外條款，無限期地禁止被拘禁者與外界接觸，從幾天到一年以上。其理由顯然是，如果走漏拘留他的消息(包括通知家屬)將「妨礙」調查。黃賢案是最近的一個例子。黃賢是香港華人，一九六七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他先在一家美國法律事務所工作，然後到中國北京外貿學院和北大教授法學。不久出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法律顧問，(此公司是中國爲了吸引外資而成立的)。一九八二年一月，他打電話給他在香港的母親，告訴她說，他在北京換了一家旅館。但是黃母在過了將近兩年之後，才再聽到兒子的消息。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的發言人說，「他(黃賢)因從事間諜活動被逮捕、審判、定罪，被判十五年徒刑。」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迄未公佈對他的判決書，也未報導他被捕受審的任何情節。他在今年得到假釋，但不准接見訪客，也不准離開中國。

以上這些例子，顯示了中國公民所享受的憲法權利的根本問題，是憲法中並無有效的法律防止立法和行政機構不願憲法的規定，限制公民的權利，和增加他們的義務。

理論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是根本大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任何法律、或行政、地方法規不得與憲法抵觸。」所謂「基本法規(法律)」在法律次序的排列上居第二位，只有人大能夠制訂和修改(第六十二條第三款)的。拘束力次於上項法律的，是人大常委會制訂的法規(第六十七條第二款)。

然而，國務院能根據憲法和法律，「採取行政措施、制訂行政法規、發佈決定和命令」(第八十九條第一款)。一位中國的法界顯要說國務院制訂行政法規，不需人大會或人大常委會事先批准，也不需向它們備案。換言之，國務院制訂的所有行政法規，都被推定是與憲法和法律一致的。雖然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七款規定，人大常委會可行使權力，「宣告國務院制訂的與憲法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或命令無效」，但迄今尚無這種事例發生。而且，人民也無程序可循，來對國務院發布的行政法規的合法性，提出異議。

根據憲法第五條第二款，人大制訂的法律不得與憲法抵觸。但實際上人大可不顧憲法的精神與條文，制訂任何它希望制訂的法律。這是因爲憲法賦予了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的權力(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很難設想下級機構能解釋它母體機構——人大制訂的法律是「違憲」的。

尤其是，儘管憲法限制人大常委會的權力，只能在人大休會期間，「制訂」不與人大制訂的法律的基本原則抵觸的補充規定和修正案(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然而實際上人大常委會因爲有解釋法律的權力(第六十七條第四款)，它可以對人大制訂的法律爲所欲爲。很難設想，人大常委會會把它對人大制訂的法律的補充或修正案，解釋爲與這一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在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人大常委會所作的一些決定，就是最好的說明。

### 打擊刑事犯罪運動與法治

人大常委會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通過了兩項處治犯罪問題的決議。第一項決議是賦

予高等人民法院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期間有批准對殺人、搶劫、強姦、投擲炸彈、縱火與從事破壞等罪犯的死刑之權。但根據刑事訴訟法，死刑必須由最高法院批准。第二項決議是對逃亡的勞改犯或勞教犯處以重刑，全國性的打擊刑事犯罪運動就展開了。

在這一運動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紙不斷有舉行群眾大會宣判死刑，立即執行的報導。儘管在刑事訴訟法中有各種程序上的制約，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司法當局顯然置之不理。例如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在大會中宣判了一名姓羅的殺人犯的死刑並立即執行。從犯人被捕到處決的全部法律過程，只有八天，包括警方的調查、起訴、審判、判刑和犯人向省高等法院的上訴。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起訴書至少應在開庭七天之前送達被告(第一百一十條)。被告在受到判決後，可在十天內提出上訴(第一百三十一條)。此案如何能在八天之內處理完畢，未能說明。

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加強了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一九八三年九月二日，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修正人大制訂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允許最高人民法院將殺人、強姦、搶劫、使用炸藥和其他重大罪行的死刑批准權，授予省級高等人民法院。人大常委會的另一項決議，實際上廢除了人大所制定的刑事訴訟法中對殺人、強姦、持械搶劫等暴力犯罪的正當處理程序的一切保證。這項決議使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條中，被告至少應在開庭之前七天接到起訴書的副本，以便準備答辯的規定失效。它還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規定的上訴期從十天縮短到三天。人大常委會在同一項通過的另一項決議，修改了人大制定的刑法

，將可以處死刑的犯罪項目擴大到任何嚴重犯罪，並命令法院對暴力犯罪從重量刑，包括處決。依照修正後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被控暴力犯罪有嚴重罪行的人，可在八天左右被處決，這期間包括逮捕、調查、起訴、判刑、上訴和處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沒有人公開提出，人大常委會對這些基本法修正，是否是與這些法律的基本原則相違背的憲法問題。對

一九八四年，中共掀起了打擊刑事犯罪份子的運動，到處都貼有殺人佈告，神州大地一片肅殺恐怖。



刑事案件的迅速處理，實際上在這些修正案制訂之前，已經如此。

犯人在臨刑之前，通常還要遊行示眾並受到其它方式的侮辱，諸如強迫他們低頭插上寫明罪狀的標示。儘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左，「犯人不應展示在公眾之前」，但實際上他們經常是當眾處決。

刑事訴訟法規定應「公開審判」（第八條），但對死囚的審判情形鮮為外界所知，報紙和法律期刊只偶而發表一點審判的簡短消息。作出判決的法院外面通常張貼佈告，摘要說明案情，包括被告的簡歷，但通常不公佈審判的過程。據其他的消息透露，這種程序是很草率的。因為中國的法院要迅速結案，被告不可能有效的行使辯護權。最近的一篇中文文章透露，中國律師執業的一些法律顧問處，不願接受刑事案件。更令人震驚的是，有些法庭在審判之前已經作出判決，在開庭之前已經寫好了判決書。至此，吾人必須了解，刑事訴訟法仍然否認對被告的「無罪推論」原則。因此，某人一旦被捕，幾乎可以肯定會受到刑事懲罰。

大多數被處決的，都是十五歲到四十歲的。許多人是失業者，雖然有些人看起來是因殺人、強姦、搶劫或其它暴力犯罪被定罪，但也有些人因其它種種犯罪被處死。例如有一名工人因為偷竊一千六百克（約五十六點六盎斯）黃金，和四萬三千克（約一千五百十八盎斯）白銀被處死。有一名女工因為盜竊一百四十八噸國家石油被處決。兩名男子因為在旅館窗口懸掛一幅「反革命」標語，圖謀建立電台和兩個顛覆組織，於一九八三年九月五日在廣州被處決。另有兩名男子因為依照古時的儀禮和宗教習慣組織傳統的秘密組織，於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天津被處決。有一名農民因為「

調戲婦女」，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被處決，有兩名男子因在博物館中偷竊古物，於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廣東省被處決。被處決的罪犯總人數無法知道，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公佈任何統計數字。西方記者根據中國國內的少量資料，估計從一九八四年八月到一九八五年一月，總共處決了五千人到九千人。顯然僅僅在一九八四年一年之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至少處決了一萬人，他們的罪名從價竊到反革命份子。

### 政治犯罪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比率最大的罪犯是政治犯。有些以前的政治犯說，人數高達百分之四十。而且這些犯人還在獄中或勞改營受到虐待，因為他們被視為是「人民的死敵」。在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的政治犯人數大為減少。原因之一是新制訂的刑法縮小了反革命分子的範圍，它強調這種人必須是從事公開活動的（第九十條），僅僅胸懷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不算犯罪行為。但是這一積極的發展，却被一九五一年代的國家機密法所削弱，此法幾乎把所有未經正式公布的資料都列為「國家機密」。根據此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任何人向國內外敵人洩漏「機密」者，都將以反革命分子論處。

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之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逮捕了一批在中國鼓吹民主與人權的知識分子。通常他們至少在被拘禁了一年以後才受到審理。對他們控告的罪名通常都是「反革命宣傳與煽動」、「組織或參加「反革命團體」、鼓動「拒捕或違法」、或洩漏「國家機密」。大多數的案件的犯人都是在未經事先

通知他們家屬的情形下秘密審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的法院，偶而也進行「公開審判」，但只有選擇地邀請一些人（不包括犯人的家屬）旁聽。

## 司法獨立問題

雖然一九五四年的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都規定司法獨立，但是認真對待此種規定的法律學者和律師，在五十年代後期都被打成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右派分子」。司法獨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黨透過所謂書記批案制度，主宰了一切司法工作，也就是「不論案子的事實是否明確，證據是否足以可信，被告都應受到刑事懲罰，對被告如何量刑，應送到同級地方黨委會主管政法事務的書記進行審批」。

一九八〇年八月，當時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長的江華宣佈，黨決定取消這種制度，但根據「人民日報」報導，仍然有一些黨的幹部繼續干預司法機構行使司法權力的事例。

而且，取消「書記批、審案件」的制度，並不意味黨放棄對司法的控制。江華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的一次講話中就說，對於重要的政策問題，和重要與複雜案件的處理，法院應主動向黨委會匯報和請示。對司法工作的情形，法院也應定期向黨委匯報工作。事實上，中國的司法幹部，今天仍然和以前一樣，在處理許多刑事案件時，認為向黨委請示匯報才是明智的。黨委會有時還直接干預，解決一些有政治性或爭議性的案件。

## 結論暨對美中關係的影響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企圖建立

憲法至上的原則，以確保一個有限程度的「法治」，但却未在憲法中作出規定，保證立法機構不得制訂與憲法基本精神和條文相抵觸的法律。把解釋憲法和監督實行憲法的任務，付託給人大常委會（立法機構）與蘇聯和其它共產黨國家的憲法相似。這些國家，除了南斯拉夫之外，沒有一個是認真實行憲法的。而且公民個人也無程序可循，來對各級行政機構發佈的違憲立法或不合法的行政法規與命令，提出異議。

雖然頒佈了新的憲法，實施了刑法、刑事訴訟法，但是它們的效力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制訂的含義不清的而現在仍然保留的一些法律和作法所削弱，這些包括一九五一年代的國家機密法、勞動教養、刑事責任的類推適用、拒不接受無罪推斷以及其他等。

中國的領導人雖然意圖在中國建立一個有限的「法治」，但到目前為止，他們在執行政策時，並不太注重法律程序，而且還希望在立法中保留一些例外條款。他們顯然認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打擊刑事犯罪運動就是一個例子。在進行這一運動時，他們幾乎完全不顧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適當程序。在對待不同政見者時，也表現了相似的态度。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是在中國建立有限度的「法治」和對人權有限度的尊重，都還得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與毛澤東時期比較，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七七年以來，已大大改進了它的法律制度和人權情形。但是法律制度和人權情形，仍然低於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四八年一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訂的各項國際標準。宣言第一條規定：「人皆生而自由並享受平等的尊嚴與權利」。中國的選舉制度與此一規定不符，因為百

分之八十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口受到歧視，他們的選票價值只有城市居民的十分之一，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規定：「任何刑事被告在充份行使辯護權利，依法公開審判定罪之前，應推定為無罪。」根據國內法或國際法，如果被告的作為或不作為當時不構成犯罪，就不能認為有罪。也不能用較重的刑事處分來代替以前適用的刑事處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不承認無罪推定的原則而與第一款抵觸；它的刑法允許犯罪的類推適用，因而與第二款抵觸。

如果美國並不要求接受互惠援助的國家，承認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和第十條中所規定的刑事正義和尊重人權的基本原則，美國當然沒有理由在美國的人權政策中，為中國訂立一個比較高的標準。

在另一方面，如果有些國家，如蘇聯和東歐各國，在它們的國內立法中承認刑事正義和尊重人權的基本原則，但却因它們的人權狀況而不能得到一九六一年援外法案中的援助，那麼美國國會如果根據一九六一年援外法案批准對一個在紙上都不願承認刑事正義與尊重人權的基本原則的國家的援助，怎能自圓其說呢？里根總統一九八四年九月在聯合國大會演說時指出，美國將繼續把對人權的關切，視為美國政策的道德中心。如果總統與國會都認真的執行這一政策，他們就應在美國與所有國家的關係中，採取一個一致的人權標準，不管它們是盟國、友邦還是敵國和不結盟國家。

註：法律術語 1. ESCAPE CLAUSE 例外條款

2.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無罪推定

3. USE OF ANALOGY 類推適用

4. AN ACT OR OMISSION 作為或不作為

或不作為

# 國際特赦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切

作者／黎安友教授

譯者／周立仁

編者按：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國際特赦美國小組中國協調組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博士，在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暨國際人權組織小組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委員會就中國政治發展及人權狀況舉行的聽證會上作了如下的證詞。證詞由本刊譯者譯，譯文與原文如有出入，由本刊負責。



黎安友博士

我是黎安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政治專家，著有「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一書，也是「當代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一書的共同作者。

今天我是以美國大赦國際的發言人身份作證。我是美國小組中國協調組的顧問。國際大赦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組織，它的宗旨是維護在各國因信仰而被囚禁的人士的權益，並且反對刑求和處決。這個組織不反對，也不支持任何政府。

經貴會同意，我所準備的證詞的重點是國際特赦作為組織所表明的那些事項。其目前的工作有下列三點：

— 要求釋放思想犯，也就是那些因信仰，但並未使用或提倡暴力而被囚禁的人。

— 使所有的政治犯，接受公正與迅速的審判。

— 反對死刑和刑求犯人。

在聽證會的問答時，我願就國際特赦所關切的事情及其調查結果，作出答覆。

國際特赦在一九七八年出版了一本篇幅長如書本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囚禁」（

POLITICAL IMPRISO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往後的

幾年中，國際特赦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表示歡迎，但繼續有所關切，並且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以一份備忘錄向中國政府提出，在一九八四年底，以名為「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犯人權、思想犯和死刑」（CHINA: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小冊子，公諸於世。

國際特赦當前所關切的事項有：

— 思想犯的逮捕與囚禁，以及拘禁他們的立法狀況。

——因政治原因被捕的人，不加審理的長期拘禁情況。

——對因政治理由被捕的人，審理程序不足，也沒有使他們能夠得到公正與公開審判的確切法律保障。

——在公安局的拘留所對犯人的虐待情況及拘留情況。

——大開殺戒。

儘管在一九七九年有立法上的重大改變，但這些長期存在的令人關切的情況，仍然繼續存在。

上述小冊子以部份篇幅敘述死刑的大量運用（尤其是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打擊刑事犯罪運動期間），又以部份篇幅敘述對思想犯的繼續拘禁情況，國際特赦把思想犯分為六類：

——一九七八—八一年期間「民主運動」的參與者。

——因對侵犯人權提出抗議或因鳴冤而被拘禁的人。

——羅馬天主教教士。

——因宗教信仰或因支持西藏獨立而被拘禁的西藏人。

——被控洩漏「國家機密」的人。

——自文革以來因政治觀點或行為而被捕的官員。

相信小組委員會各位委員，都收到了這本小冊子。如有需要，本組織的華盛頓辦事處願意繼續供應。

在下面的證詞中，我將對向我們提出的各類問題，詳述國際特赦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調查結果。

## 一、政治演化與改革：政治開放與國家權力專斷行使的減少

國際特赦對最近改革所最關切的，是建立法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九年通過，並且在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在此之前，對刑事犯罪的處理，是根據未成法典的，大部份未經公佈的政府規章與黨的政策。因此，制定法典本身就是一種進步。而且新的立法對行使各種辯護權利，作出了某些保證，並對專斷的拘禁作出了若干防範規定。

但是，在另一方面，新的法律仍有條款，可用以監禁行使基本人權的人。最重要的是，一些處理各種反革命犯罪的條文，諸如反革命的宣傳與煽動，組織與鼓動等。新法律對國際人權會議所闡明的某些最低限度的保障，也未給予保證，這些保障包括在被捕之後立即並經常接見親屬和律師的權利，以及在以後有充份的時間和便利準備辯護的權利，和在法庭被證明有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的權利。

國際特赦對最近釋放幾名思想犯，包括龔品梅主教和陶森，以及魏京生拘禁環境有所改善的消息，表示歡迎。我們對我們最近印行的小冊子中所列的其他思想犯，繼續表示關切。

## 二、對中共政府權力的限制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憲法。它載有保障言論、出版自由和其它政治權利的條文；保護公民的住宅和人身不受侵犯；保證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它也取消了一九七八年憲法中的一些自由，包括罷工的權利；對宗教信仰自由也有限制，它規定「不得利用宗教從事擾亂公共秩序、損害人民健康或干涉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得受制於國外。」憲法中還有一條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基本制度，人民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破壞。

## 三、對政治意見與組織的限制：

### 「反革命」的定義

除了憲法和刑法已有的限制外，政治言論和組織還受到一九五一年國家機密法限制，它禁止洩漏被分類為國家機密的事或「不應洩漏」的事。雖然對什麼構成「國家機密」在中國沒有嚴格的定義，但這個用語在中國比在其它國家有廣泛得多的意義。例如，它可能是在雜誌上已刊出的資料，雖然這些雜誌沒有對外公開發售，但許多專家或政治幹部都可得到；它也可能是黨的文件，雖然不會公開買到，但廣為流傳。

根據一九五七年國務院關於通過勞動進行再教育的決定，可以拘禁對官方政策有不同意見的人，也可以不加審判地拘禁被認為有「反社會主義觀點」或被認為是「流氓」的人。一九七九—八一年期間，幾十個民主運動積極份子和請願份子，根據這些法律被捕入獄。中國刑法第九十條對「反革命罪」的定義是：「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目的的人。」

## 四、法律的適當程序與公正審判

「勞動再教育」的運用；一九八三年維護公共秩序運動。

國際特赦雖然歡迎一九七九年刑事訴訟法所體現的改進，但它仍然對某些案件，沒有遵守這一法律的要求，以及訴訟法未對公正的審判提出可靠的保證，很表示關切。在其它關切

事項中，國際特赦建議建立制度，防止不加審判的長期拘禁；規定程序，以保證被拘禁者的家屬、友人或律師得到通知，也保證上述人員有權探訪獄中的人，和他通信；保證公開審判並公佈審判記錄；並採用無罪推斷的法律標準。

根據一九五七年通過勞動進行再教育的決定，警方的一個簡單命令，就可以使人在未被控告或未經任何司法程序處置的情況下，勞改一到三年，勞改期還可延長一年。這些人在勞改營中勞改的情形，和那些被定罪的犯人從事勞改的情況差不多。有些勞改的人由於要把戶籍永久性的遷到勞改營的所在地，所以，即使勞改期間後，也不得不繼續留在那裏。這些條款曾在一九七九—八一年間，用來懲罰那些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的人。

關於一九八三年的維護社會治安運動，國際特赦的主要關切是在這一運動期間的大開殺戒。雖然沒有完整的統計數字，相信這一運動的最初三個月已處決了好幾千人；國際特赦獲知在這一期間，中國少數幾個地方就已處決了六百多人。死刑使用的範圍很廣，而且採用加速處理的程序，有時在群眾大會上宣判，犯人在臨刑之前還經常遊行示眾，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有相反的規定。自從一九八一年以來，進行了新的立法，增加二十三種可判死刑的罪名，使死刑的罪名總數多到四十種。採取這些措施，是與聯合國重申希望限制死刑罪名，並且最後廢止死刑的一些宣言和決議的精神是違背的。

國際特赦曾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函李先念主席，呼籲停止這種處決的浪潮。但未得到直接的答覆，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據報導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過「這是維

持國家公共安全的正常措施和例行作法。這是一個國家的內政。」

擴大死刑的範圍仍是一項主要的關切。召開群眾大會，宣判死刑，以儆效尤的情況，仍在繼續。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底為止，國際特赦在少數幾個省市，記錄了八十二件處決。這一數字不包括是否已經執行死刑尚未明確的案件。

國際特赦無條件地反對死刑的理由，是因為它違背了世界人權宣言中宣佈的生命權，不受殘酷的、不人道或侮辱的處罰的權利。

### 兵、西藏的情況

國際特赦承認，由於忠於流亡在外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主張他返回西藏、呼喊贊成西藏獨立的口號，或以其它非暴力的方式表達政治與宗教的意見而被捕的一些西藏人為思想犯。

### 六對未來的展望

中國政府曾經發表聲明，表示已在繼續修改和改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與法律。國際特赦呼籲釋放所有的思想犯；對限制以非暴力行使言論、結社和宗教信仰權利的法律予以修改；改善刑事訴訟程序，以保證公正審判；廢除死刑。

### 七、對美國政策的建議

國際特赦繼續敦促美國政府官員，透過公、私途徑，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傳達他們對侵犯國際間承認的人權的關切。



一九八四年雲南省思茅縣人民法院貼出的對「刑事犯罪分子」的宣判佈告，有十六人被處決。



一九八四年雲南省保山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貼出了對「販毒犯」喻煥文、馬耀恒判處死刑的佈告。

# 廢除良心囚犯

## ——司馬晉教授談中國大陸人權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吳軍

編者按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司馬晉（James D. Seymour）教授在其哥倫比亞大學辦公室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司馬晉教授畢業於哥大，曾執教於母校、紐約大學等高等學府，現任哥大東亞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司馬晉教授不僅是學者，而且還是一位著名的人權活動家，他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紐約地區的負責人之一，也是人權刊物「保護東亞人權協會」（SPEAHR head）的主編人。著作有：「中國人權年鑑」、「第五個現代化：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中國人權運動」等。以下「中」代表「中春」，「司」代表司馬晉教授。

中：您在最近出版的「中國人權年鑑」一書中，對中國大陸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間的人權問題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對於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很有參考價值的書。爲了使廣大讀者進一步瞭解大陸人權的狀況，能否請您對其中某幾個問題着重介紹一下？

司：當然可以。不過我想先要說明一下，一般來說，我是以學者和人權活動家的雙重身份來探討中國人權問題的。作爲一個學者，我盡量對中國人權問題作客觀的分析和研究；作爲一個人權活動家，我對海峽兩岸政府凡有違反基本人權的做法都給予批評。

中：好，那就先請您談一下「良心囚犯」這個

問題吧。

司：「良心囚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這個詞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國際特赦組織」開始使用起來的，以此來區別「政治犯」（POLITICAL PRISONERS）一詞，因爲「政治犯」這個詞包括使用暴力的犯人，而「良心囚犯」專指那些由於信仰不同而遭到當局拘禁的人。在中國大陸，近幾年來可以說大致有以下四種「良心囚犯」：①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②宗教信仰徒；③不順從的少數民族；④極左派份子。

中：請您舉些具體例子來談談這四種人的情況好嗎？

司：第一類「良心囚犯」中最出名的人物當然是魏京生了。根據香港「爭鳴」雜誌的報導，魏已患精神病。魏在七七年被捕前是個意志堅強的人，現在身體垮得這樣厲害，連他的朋友們都感到吃驚。另外，長春有四個人因爲出版一份名爲「東北新聞報導」和據稱企圖成立政黨而被捕，後來判了七年徒刑。他們都屬於「良心囚犯」。還有像施東定（譯音），他因爲「散佈反革命言論和明目張膽地要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而受到政府控告，他也是一個「良心囚犯」。

第二類「良心囚犯」都是宗教界人士。八三年以來，保定的天主教和另一處的雷主教，因爲「繼續和梵蒂岡保持聯繫」、「接受外國津貼」以及「反對（中國）政府」，而被判了十年徒刑。范是最後一批由羅馬教廷任命的中國主教之一。根據一份報告說，他之所以被捕，是因爲他拒絕加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這個說法似乎

得到中共官方的證實，宗教局的一名官員在解釋范主教被捕一事時就曾說，他「頑固地拒絕接受『天主教愛國會』」。范是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遭拘捕的，這樣他就成了一名「良心囚犯」。

第三類「良心囚犯」中以西藏人最為突出。據約翰·阿凡敦（JOHN AVEDON）估計，每十名西藏人中間就有一名坐過牢。目前拉薩一共有五座監獄，裏面關押着七千名犯人，相當於拉薩五分之一的藏人。中國政府一直說那裏關押的都是有罪的人，但阿凡敦却認為：「實際上在那裏受苦役的西藏人，是因為出身不好或有某種公開的對抗行為而被捕入獄的。」至於獄中的狀況，「常常是可怕得令人難以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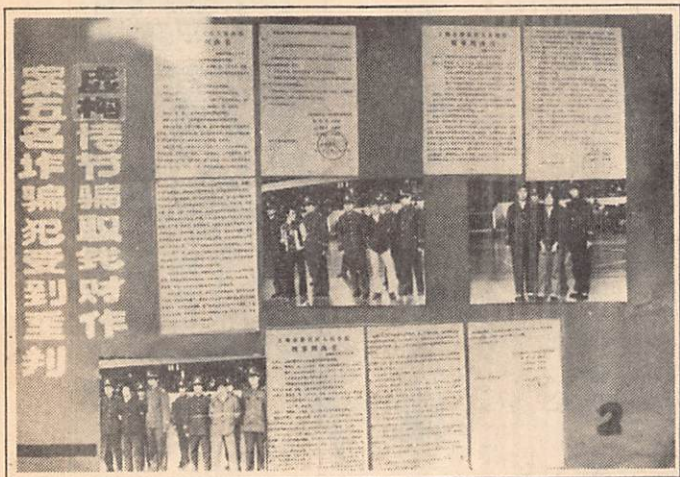
第四類「良心囚犯」跟文革有密切關係，像戚本禹、劉慶棠、張鐵生等都屬於第四類「良心囚犯」，當然我們并不能把這些人中的大部份都稱作「良心囚犯」，因為他們中有些人確有過暴力行為。不管怎樣，中國大陸不應有任何的「良心囚犯」。中：記得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總部曾經在去年出版過一本書，書名叫「八十年代裏的拷問」（TORTURE IN THE EIGHTIES），裏面談到中國監獄中一些不人道的做法。

司：不錯。在毛澤東時代，儘管在法律上禁止對犯人施以刑罰，但實際上用刑逼供是司空見慣的。文革後，特別在八三年至八四年間的大規模打擊犯罪份子的運動中，更是如此。根據『羊城晚報』的消息說，在某公社一百五十七人被捕，其中有四十四人受到逼供。受害者慘遭毒打，被迫跪在

尖石上，或是腹部被壓上沉重的石塊。大陸獄中的待遇通常也是十分嚴酷的，有時會使犯人精神崩潰，上面說到的魏京生就是這樣。犯人如頑抗，就會被長期關在單人牢房裏，有時竟長達數年之久。

中：「聯合國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五條規定，不許對任何人施以不人道的虐待和酷刑。這裏所謂「任何人」，想必也包括「犯人」在內了。

司：那是自不待言的。這裏我倒想提一下關於「死刑」問題。在中國大陸那場打擊犯罪份子運動中，究竟有多少人被判處死刑，關於這點外界曾有過廣泛的猜測性報導。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佈告，圖中有三張犯人  
被處決時的照片。

這些報導雖未經證實，但也未必不可置信。多倫多太陽報（THE TORONTO SUN）曾引用中共一份內部文件，指出該文件要求在八三年十一月中旬前處死五千名犯人。而法國人權聯盟則估計，在十月至十一月間，處死人數高達一萬之多。國際特赦組織估計有六百人在八三年秋季被處死，這個數字也許是總數中的一部份。國民黨人說在八四年頭一個月裏有六萬人被處死，當然在這些問題上，他們的說法是不足為信的。目前流亡在國外的西藏人則說，那次運動的打擊對象除了罪犯外，還有持不同政見者，當然這一點也還沒有得到證實。

中：下面能否請您談一下大陸的法制狀況？

司：在中國大陸，法院是否應該被用來作為一種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這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不過在八二年，所謂「反革命份子」的案件倒是下降了，下降到祇佔全部刑事案件的百分之零點五。從數字上看，大陸已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話要說回來，大陸上有些幹部對法制根本沒有一點興趣。彭真曾經抱怨說：「在我們國家工作人員中，至今有人沒有認識到建立法制的的重要性。在一些地方，不重視憲法和法律，不按法律辦理，甚至知法犯法或執法犯法的做法，還大有人在。」

中：那您對此的看法如何呢？

司：中共官員一方面要按法辦事，另一方面又要服從黨內上級領導，當這兩者有衝突時，他們就有左右為難之慮了。在大陸也會討論過，應在何種程度上允許外國法律標準影響中國的司法程序。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可以允許提到外國法律和法學



理論」，但却堅持認為，「至於在民主和人道問題上，我們決不能讓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和理論阻礙我國法律的執行。」我看，這裏的關鍵是，政治是否在干預司法。儘管紅旗雜誌表示法律面前不分派別，人人平等，但是地方上仍然在用政治眼光看待法律。所以中國雖然成立了律師協會，這種協會却是非常馴從的。要想維護司法獨立性，一個辦法是建立真正自治的律師協會，然而對這一做法，中共當局早已表示過反對。因此，目前大陸法庭所發揮的作用仍舊純是掛個名而已，而黨委書記倒是在沒有法庭參與的情況下作出「司法」決定。

中：大陸上的律師也有敢於說話的，問題是這些敢於維護法律尊嚴、敢於在法庭上為被告真正辯護的人，却常常遭到中共黨政幹部的凌辱和迫害。例如鞍山市三名律師因為替一名刑事犯辯護，結果連他們自己也被抓了進去，真是令人既可氣又可笑！

司：是啊。不過再一想也不怪，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真正的法治。

中：接下來是不是請您談一下「言論自由」問題好嗎？

司：中共主張和容忍「言論自由」的程度通常可用毛澤東的「百花齊放」方針來表達。中共也一再強調黨要聽取群眾意見，對提批評的人不要打擊報復。但事實上他們的所為并不是這樣。中國一些主要的持不同政見者至今還被關在監獄裏，還有許多知名度較低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在受着歧視。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瞭解自己的政府，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政府一直裹在神秘的帷幕裏。在西方民主國家可以公開的消息

，在中國那樣的專制國家裏，却成了統治集團的私有物。有時候根本談不上什麼機密，也會受到嚴格控制。一九八四年雷根總統訪華時的講話也被刪改不少，這就是個例證。

另外，中國雖有許多優秀記者，但却一直難以使這些記者保持他們想要保持的高水平。劉賓雁是人民日報的一位正直記者，他的作品很受歡迎。但據說有一位跟他「友好」的官員曾經這樣對他說：「誰都知道你的筆不饒人……然而你有多少人是可以得罪的呢？」香港一家刊物曾經報導過這樣的事，說是大陸幹部甚至不惜向劉大拍馬屁，以便使他不再作客觀報導。又據說還有人向劉提供假消息，以此來破壞他的可信度。

中：從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國內的報紙一向是報喜不報憂的。「文革」期間，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邊緣，大報小報還天天高唱着什麼「社會主義祖國到處鶯歌燕舞，條條戰綫形勢一派大好。」

司：的確是這樣。這種情況到現在總算有了一點改進，在過去像墜機、劫持、大地震都通常不見報的。不過，像大字報這種形式的自由表達已被列為非法，違者至少要受到短期拘留。八四年八月，湖南有一對夫婦就因為寫大字報批評當地司法部門，結果被判到了一個月徒刑。

中：您在書中收集的資料相當廣泛，我們應該向研究中國問題的人推薦一下您的著作。看來，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還亟待改善。由於時間關係，我們今天暫時先談到這裏吧，以後有機會再向您請教。謝謝。

## ●文藝園地●

### 詩人之命

你睜開假鏡子般的眼睛  
被遠方的地平綫截住  
景物倒映在天空  
時而從乳白色的黎明透出  
時而又溶入混淆樹與樹之間距離的黃昏  
但你一步步穿行  
在數不清的迴廊  
大腦

（比《解剖學》插頁更複雜）

尋覓概念、語言、無電磁波的奇特之光  
去喚醒心靈又一個心靈  
悄悄，像來時那樣潛意識地  
然後消失

### 距離規——人的透視學

空氣、空氣、空氣  
不存在時方感覺存在  
眼睛、眼睛、眼睛  
閉上了才渴望睜開  
嘆  
誰在那條路上行走  
朦朧  
像早晨的霧  
實實在在  
似默數星群的樹  
——他轉過臉來  
一樣的亞洲型  
我，你驚醒了夢  
的確冤枉

（中國大陸詩人）嵐之凝

# 國內出現了「萬人坑」和「販賣人口」

## ——讀「人吃人的新聞」所想起的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澳洲）王法堯

去年一份雜誌報導了一篇「人吃人的新聞」，聽來駭人，細細讀來，是說國內有的人「吃人工流產的小人」。作者最後慨然說道：「中共當政以來，一直沒有循過正道行走。正道不行，歪道就會擴張。看他們那個混亂的社會和政局。中國將來還不知還會有什麼奇形怪狀的事出現」。其實，不必看將來，且看現在，多得很。

中國有一句俗話，「少見多怪」。對中共了解得太少，自然對中共的倒行逆施和野蠻退化，就感到驚奇。筆者在中共統治之下生活了卅五年，不久前剛來到國外。對國外的中國人了解中共的事情太少，而感到驚訝。有一位朋友，在國內是一個醫務人員。十多年前，在北京協和醫院實習的時候，就說過一些從「吃胎盤」到「吃人工流產的小人」的事情。國內的人，長期生活在中共的統治之下，千奇百怪的事，層出不窮，神經不免有些麻木了，對一些慘無人道的事情，也習以為常。只有在看到了「人吃人的新聞」，才使我想起了「萬人坑」和「販賣人口」的出現。否則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筆者在一九七八年看到過中共的一個「黨內文件」，說人口已經超過了十二億。爲了控

制人口的發展，出現了「萬人坑」。這在廣大農村是人人目睹的事實。住在城市的人，只是聽聞而已。「萬人坑」，簡單的說，就是強迫懷孕的婦女到醫院去做人工流產，把流產的小人扔進一個大坑裡面，老百姓稱做「萬人坑」。在突擊強迫做流產的高潮時期，每個醫院都是幾個「萬人坑」。墮胎的方法是，給胎兒扎一種藥針，使胎兒流產下來。五個月以內的胎兒，一針斃命，死後出生。人的胎兒是七活、八不活。七個月的胎兒生下以後是可以活命的。所以做人工流產在七個月以後的，新生兒不能立即死去，扔進「萬人坑」之後，還要活動多時，然後才死。形狀之殘忍，令人毛骨悚然。這是助產醫生的政治任務，只能遵命，不敢違抗。中共「萬人坑」之遍及農村，比起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的「萬人坑」，不知多幾千倍。



中國的人口應該控制，提倡「計劃生育」，無疑是必要的。問題在於中國的人口爲什麼形成現在的局勢？在「計劃生育」的美名下，爲什麼出現迫害和摧殘人民生命的罪惡行徑？爲什麼採取人類有史以來，聞所未聞，又爲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國家從未出現過的暴戾人口政策？

中國的人口膨脹和失去控制，完全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中共是趁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之機，養精蓄銳，在國內戰爭中用人海戰術取得政權的。只知人多的好處，不知人多也有壞處。所以在人口政策上，效法「老大哥」蘇聯，提倡「母親英雄」，多方面獎勵人口的發展。毛澤東說：「在共產黨領導下，有了人就有一切」。一些向毛澤東拍馬屁的「吹鼓手們」，建議把「人口」這個詞，改成「人手」。據說是「人口」的含義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口」

，是要吃東西的，是站在消費的觀點看待一個人，把人看成消極的。而改成「人手」，意義就不同了，每個人都會有兩隻手，一個人就是一個勞動力，每個人都會爲社會創造物質財富，這是用積極的觀點看待「人」。請看，爲了拍馬屁得人情合理，其用心可謂良苦哉！

老學者，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提出中國的人口應該控制。在一九五七年他提出，人口的無限增加會使學校、醫院、住房等衣、食、住、行多方面難以解決。老學者預見的既準確，而說的又周詳。但是他的對事物的銳敏洞察力和善良的合理建議，遭到了以毛澤東爲首的「黨閥」們的無限上綱上線。說是和偉大領袖「在共產黨領導下，有了人就有一切」的英明論斷唱對台戲，老學者解釋說，我的意見是符合馬克思學說的。毛澤東的幫兇們說，你這個「馬」不是馬克思的「馬」，而是馬爾薩斯的反動人口論。老學者的意見不被採納，反被扣上了「反動」的大帽子。一棍子把他打得悶了氣，辭去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銷聲匿跡慘渡晚年。過了廿一年之久，到一九七八年，「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通知老學者，「給你平反啦！」老學者雖然已經老得神志不清，但是對這一無情打擊銘記在心，擲抖着變唇說：「不用你們給我平反，事實早已給我平反啦！」他心有餘恨，並不領其情。

毛澤東的「領導藝術」是「善於把個人的意圖，變爲群眾的行動」。對於「明察秋毫」的偉大領袖的屁，「黨閥」們，和「吹鼓手們」，也是搖尾而來，大喊「香的很」。香臭不分，黑白顛倒，難怪中共是「把好事辦成壞事的專家」。

中共在取得政權以前，幹部和軍官都是實

行「供給制」。那時有一種說法，一個孩子是「貧農」，兩個孩子是「下中農」，三個孩子是「中農」，四個孩子是「富農」，五個孩子是「地主」。哪個幹部和軍官不是孩子一大群呢？因爲生孩子越多，收入越多，生活水平就越高。

中共的土地改革，是按每個人佔有土地的多少，來劃分階級成份。親生兄弟之間，分家時土地對半分，生孩子多的，每個人平均佔有的地數少，成了貧農，多分得土地，政治上又光榮；生孩子少的，每個人平均佔有的地數就多，就可能定爲「富農」或者定爲「地主」，成了階級敵人和專政對象。

農村「公社化」以後，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分糧食，百分之四十按人口分，百分之六十按「工分」分。人口多的，分得口糧就多。人口少的分得口糧就少。勞動力多的，分得「工分糧」和「工分錢」都多。勞動力少的少分，無勞動力的不分給。

現在農村的實際情況是把土地分成「自留地」，「口糧田」、「責任田」三大類，「自留地」和「口糧田」按人口分。人口多的分得地就多。「責任田」是按勞動力分，勞動力多的分得「責任田」就多。在一般情況下，人多勞動力就多，分各類地都多。

所以中共一貫是獎勵人口的政策。現在是一面獎勵一面摧殘的政策。

中國人有一個傳統觀念，認爲只有男子才能傳宗接代。現在一對夫妻只准生一個孩子。城市的人大部分是有工作的，生多了要「降級」，甚致開除工職。所以在城市比較容易行得通。但是因爲生「女」孩，遭受婆婆和丈夫虐待的事，層出不窮。很多地方男孩出生比率過高。其原因是女孩被虐殺而死，河北省易縣，

昔日中共盲目地提倡多育，今日嚐到人口膨脹的苦頭，則又來個強制節育，幾億生靈，豈可如兒戲玩之于掌中？



有一個張德潤，小女兒已經三歲，妻子又懷了孕（那時還沒有強行絕育手術），他讓妻子到醫院檢查，醫生說是男胎。爲了再要一個男孩子，張德潤把三歲的女兒給害死，然後到縣公安局投案，最後受到良心的責備，得了精神病。類似這樣的事，是中共給逼出來的，也是中共欠下人民的又一血債。

中共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譴責之後，發表了很多文章說男孩和女孩的出生比例合理，而且女孩的出生率略高於男孩。這真是「此地無

銀三百兩」。企圖以此否認在其人口政策之下，造成的溺死女嬰的事實。拿毛澤東自己的話說，這叫做「既當婊子，又要立貞節牌」，中共是鐵嘴鋼牙，在事實面前，失口抵賴。

筆者本村的黨支部書記，父輩分家之後，伯父和叔父都是獨子獨孫，人口少，土改時劃爲富農成份。而他們兄弟四人都是孩子一大群，劃爲「雇農」（做長工的）。他家族中人口衆多。所以每到強制墮胎風暴到來時，村中人們都觀望他的兒媳和姪媳們，是否「執行黨的政策」。幾次都因其本家掣肘而落空。老支書左右爲難，向上級黨組織提出辭職和退黨的申請。上級派來了工作組，說先把工作完成，然後再考慮對你的處分。工作組要求幹部和黨員帶頭，家中有懷孕的婦女先墮胎。老支書有一個姪媳，已有兩個女孩，還盼望生一個男孩。姪媳也是我們本村的娘家，得知消息後，逃到內蒙古的姑母家躲災。運動像一陣風，過去之後，果真生了一個男孩。北方農村有一個風俗，生了孩子第九天，請來親戚和近族的長輩們慶賀。叫「做九日」。到了那天，新生兒的外婆請人把老支書叫來，抱着才九天的外孫子向老支書說：「親家，您看看，這小子又白又胖，快叫二爺」，拉着老支書不放，非得要老支書向着孩子說一聲「二爺對不起小孫孫」。弄得老支書啼笑皆非，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口中說：「那是上級黨的命令，我有什麼辦法」。直到現在，老支書見到這位孫子就悄悄躲開。這是一九八二年的事，躲過一陣風就算了。現在不行了，躲藏了的人，就被抄家、拆房子，捉到了要捆綁起來毒打。爲此而傾家蕩產的人，不在少數。

最近兩年來，中共正在廣大農村強制推行「絕育手術」。把軍隊中的所有勤雜人員，辦

理速成手術訓練班。每個公社（約廿個村莊）派去一個手術大隊，每一個村去一個手術組，每組二十多個人。到村後把所有已經結婚，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凡是有了一個孩子的，有生育能力的婦女，一律強制做「絕育手術」。方法是把輸卵管結扎起來。做得潦潦草草，比閹豬鬍狗還簡單而又快。手術完後，回自己家。七天後由赤腳醫生（村中的半瓶醋醫生）拆線了事。這種手術在醫院做算是小手術。但是由於是突擊性的政治任務，條件又差，技術又粗糙，使做手術的婦女變成殘廢的事，各村都有。因而喪命的婦女，不乏其人。有的人用花錢或者送禮等方法，找醫院給開個做了絕育手術的證明，只要能向上級交差，又能堵住群眾的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過去了。很多醫生開假證明發了大財，也有的被人告了狀，受了處理。醫院和醫生都分配了任務數字，每個月完成多少個絕育手術。所以有的醫院，只要是婦女到外科做手術，就捎帶給做絕育手術。有一個醫生任務數字未完成，心中有些着急，又有點大意，不問清情況，粗枝大葉，竟給一個未婚婦女做盲腸炎手術時順便給結扎了輸卵管。聽來好像荒唐，實際真有其事。事情就出在筆者本縣的縣醫院裡。

那些因手術不好而殘廢和死了的婦女怎麼辦呢？只有認倒霉而已。當然也有向上級告狀的。政策出自黨中央，下級是執行中央任務的。黨中央要給下級黨組織做主，要「看主流」，「成績是主要的」，發生點偏差在所難免，是屬於前進中的小問題。到哪裡你也告不准。在農村強行絕育手術的緊張時期，「適齡」婦女們大難臨頭，無處躲、無處藏。這時，河北省張家口軍隊醫院，在報紙上介紹試驗成功了新成果，說是扎一種藥針代替做手術。全

國各地的婦女聞風而來，人山人海，交通堵塞，去張家口的火車買不到車票。該醫院只管吹牛皮，並無把握，又顧全自己的面子。想出了一條巧妙的謝絕方法，必須有省衛生廳的介紹信，才給扎一針做爲觀察試驗，如果無效，仍得做絕育手術。多少人往返徒勞失望而歸，最後還得挨手術隊那一刀。

筆者的親戚和本案，大部份是我女兒給找的關係，去醫院做的手術。只有我的堂妹是手術隊給做的，幸好只是刀口發炎，吃藥扎針一個多月也就好了，未落下毛病。我女兒姨表弟之妻，做手術時已經懷孕了，醫生未發現，又多生一個孩子。老太太們有點迷信，說這個胎兒一定是命強的男孩子，長大以後準得做大官。同年齡的婦女們，也用羨慕的口氣問長問短，結果生下來是個女孩子，加上已有的兩個女孩子，共三個女孩。她唉聲嘆氣地說：「這是『命』裡註定無兒子」。

人們都知道中共是搞宣傳的能手，把各種事情辦的那麼糟，嘴裡說的總是呱呱叫。唯獨對「計劃生育」找不到適當的宣傳方法。所使用的幾個宣傳口號是：「控制人口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計劃生育好」，「一對夫妻生一個孩子好」，都是乾巴無力。有這樣一張宣傳畫，城市大街上到處都有，是一對年輕夫妻中間站着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口中說：「爸爸、媽媽和我」。人們對這幅畫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樣下去我們就是女兒國啦」。「你真糊塗，只有女人，人類還能延續嗎？」「毛主席說婦女是半邊天，今後婦女是整個天啦」。「以後只能由婦女當兵打仗啦」，「以後一對夫妻就得負擔兩對老人啦」，「兵役法都改啦，獨生子也得當兵啦」。中共那張「能夠把死人說活的嘴」，只能啞口無言，無法解答

。中共把各種事情弄糟以後，總是欺騙人們，說那是過去的事了，今後會好的，應該向前（老百姓說向「錢」）看。事不過三，常常如此，就失去了人們的信任。一些大政方針，猶如兒戲，總是「今是而昨非」。人們從慘痛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了幾句話：「事事今是而昨非，今日是者明日非，明日是者來日非，是非非都是黨的嘴，聽來甜如蜜，做來禍國殃民。」

在解決人口問題上，除了「墮胎」和「絕育」之外，中共沒有採取過其他辦法嗎？有的，不過有的見效甚微，有的失敗了。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在中國地圖上面，從牡丹江到廣州市劃一條直綫。東部沿海土地面積佔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十五。而人口的比例相反，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內陸有很多未開墾的荒地。中共在一九五六年左右，搞了一次移民。把沿海地區的回民，經過動員號召，遷往綏遠省，新疆省等地區。回民村莊整個遷走。回漢雜居的村莊，只遷走回民。遷到之後，原來一個村的人們，仍然在一個村。這邊敲鑼打鼓歡送，那裡新房子、新用具歡迎，兩年不納公糧。這應該是解決沿海人口的密集的成功辦法。但是不要忘記，中共是「把好事辦成壞事的專家」。響應號召的人，都上當受騙吃了大虧，有的落了悲慘的結果。筆者妻子是個工人。她的師傅姓李，夫妻二人都是回民，聽了動員報告，滿腔熱忱，夫妻二人帶着剛一歲的女兒，隨其本村回民，一塊去了新疆。李師傅是三級鉗工，工資每月四十五元，起程之前把李師傅的共青團員轉爲正式中共黨員，領導和他談話說：「那裡要建立一個汽車修理廠，你會爲開發落後地區做出偉大貢獻，幾年之後你就會當領導幹部」。李師傅對「黨」的話，堅信

不移。走的時候坐在彩車上，樂得合不上嘴。到了之後，眼，是一望無際的荒沙漠漠。十幾個人分在一個汽車站，半個月不過一次汽車。不只是人少，連其他動物都很少見到，吃不上正經飯，喝水都非常困難。住的是沙坑，上面蓋一塊苫布。這樣住了兩年之久，情況毫無改變，忍無可忍，李師傅三口人討着飯回到了原籍。原來人們的處境大同小異，半年之後就開始往回跑，李師傅是最後一個。除死者之外，無一個人留在那裡。回來之後，政府動員再回去，不給落戶口。人們就搞投機倒把維持生活。年輕人有的成了小偷，被判了徒刑。「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有多少好人輕信了中共的欺騙和宣傳，弄得終身倒霉。欺騙人的結果，中共的移民政策失敗了。

中共還用過一個辦法，是用「備戰」的名義，把一些工廠遷移到人少的「後方」，以收到移民的實效。這個辦法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所謂成功的一半，是人少的地方確實人口多了，只有少數人「走後門」回來。說它失敗的一半，是移走的人數，不如新生的人數多。那裡人多了，這裡人數沒有少下來。「偉大的黨」忘記了這樣一個人口增長的比例關係，百分比雖小（百分之零點二？），十億的基數，百分比出來的絕對數也是相當可觀的。

毛澤東號召千百萬青年學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把廣大青年驅趕到偏僻的山區「插隊落戶」，或者到內蒙古及北大荒「兵團」當戰士。這也是爲了解決人口問題。但事與願違，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其後果之惡劣，整害了一代青年人。走時是「爹娘兄妹走相送，哭聲直上干雲霄」，耳不忍聞，目不忍睹，給一代青年造成了深刻的創傷，這也是「傷痕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下面說說販賣人口的情況。國內出現過兩次販賣人口的高潮。在鄧小平三起三落時期，鄧小平的老家，天府之國的四川省，大量婦女被人販子販賣到全國各地。其中以綿陽地區為最多。只一九七七年這一年之中，賣到華北各省二十萬名婦女。其中只河北省的定縣一個縣，就達四萬名之多（數字來自中共的講話稿）。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之後，開展了兩次大張旗鼓地「打擊人販子運動」。都是不登報紙，不上無線電台廣播，不貼佈告。怕外國人知道了，有損於中共「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定縣一次召開十萬人的公審大會，有中央、省各級的工作組參加，槍斃了四名人販子，判處徒刑者多名。被槍斃的人販子，是販賣的人數多，而又是先姦後賣的。對人販打擊和鎮壓，是應該舉雙手贊成的。可是人們不禁會想到，為什麼「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會出現販賣人口呢？怎樣販賣？又怎樣發展成如此規模的呢？

如果你去國內旅行一次，你會看到城市比過去繁華了，祖國的大好河山使你留連忘返，



大陸某鎮計劃生育辦公室貼的宣傳畫，寫着「優生、優育、優教」的字樣。

我們的祖先留傳下來的無數名勝古蹟，令人感到中華民族的光榮和自豪。像販賣人口之類的醜事，不用說看，連聽也聽不到。只有長期生活在中共的鐵幕之內的人，才嚐夠了中共的苦辣酸鹹。如果你坐一次寶成鐵路的火車，或者坐火車去一次烏魯木齊。你就可以看到鐵路兩旁，有很多衣服襤褸不堪，乾瘦如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用乞求的眼光，望着你，向你伸出可憐的手。如果你到四川省綿陽地區，只要你有五百斤糧票（面額五百斤憑糧票才能買糧食），就可以領回一位婦女來。全國通用糧票才三角錢一市斤（面額一市斤），五百斤糧票價值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再加上路費就行了。一位四川婦女的價錢，可想而知了。一個外地口音的人到了那裡，會有人主動問你：「有糧票嗎？」這就是行話，就可以根據被賣者的年齡像貌，討價還價。胆量大的人販子，一次領來十幾個婦女，每個能賺一千元。有的人當二道販子，也叫坐地販。去四川省的人販子「薄利多銷」，交給坐地販子。坐地販子用介紹對象的方法慢慢出售。有的婦女被倒賣三、四次之後，才有了安身之地。類似這樣的人販子，算得是「正當」的販賣人口。有的是用欺騙的辦法。例如：用介紹工作，或者到外邊旅遊等名義進行欺騙。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被販賣的婦女中，有的人也變成了人販子。辦法是先給家鄉的婦女們去信，說這裡如何如何好，使一些人羨慕她的幸福生活。就會有人請她幫忙介紹對象。她再物色一些找不到對象的老棍漢，由他們出錢和糧票，自己辛辛苦苦一趙，為他（她）們跑跑腿，回一趙四川省，錢和糧票入了自己的腰包。類似這種人販子，情節不算嚴重，即使犯了案，也是輕犯，只是批鬥幾次，退回一部分錢財，並不給刑事處分。

有的男人，買一位四川妻子，滿以為好好和自己過日子，把家中一切經濟大權統統交給她。有的趁丈夫不在家，把所有財物一掃而空，帶回到四川省老家去。這類婦女之中，有的是已經生兒育女，和丈夫商量好，從中發財的。形形色色，難以盡述。

前面說過的筆者的那位堂妹，婆家也是我們本村。妹丈兄弟五人，他居行三；四個人結了婚，唯有四弟長的外表差些，其實很聰明，總是找不到對象。父親早去世，母親為老四的婚事發愁，於是兄弟五人湊錢買了一個四川姑娘。說來也是有點巧合。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一位鄰居老太太到堂妹家來，要借八百元錢。這位老太太的丈夫，是個壞蛋。因為「海外關係」鬥爭堂妹的時候，他很積極。現在「海外關係」翻過來了，他又表現很關心，常常問堂妹「妳父親又匯錢了嗎？」這次老太太來借錢，堂妹手中確實無錢，老太太懇求說：「是給我家老大買媳婦用，人已經領到家了，拿不出錢就告吹……」說話之間老太太的兩個兒子，吵吵鬧鬧也來了，七嘴八舌，異口同聲地說：「只管給哥哥買個媳婦，幾年才能還清債？我們還要不要結婚？」轉臉又向堂妹說：「不論誰借給錢，我們一律不管還債！」事情到此，攔了淺。

第二天那位老太太又來堂妹家，後面跟着堂妹的婆婆。兩位老太太笑容滿面。鄰居老太太說：「這次不是來借錢，是求妳給當個保證人，只要妳保證兩個月後給錢，人就算留下了」。堂妹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婆婆趕緊補充說：「好媳婦求妳吧，這次是給咱們老四買下，妳大爺是介紹人。我倆來是給妳商量兩件事，一是你們兄弟五人湊一千元錢，你和老三不同意？二是還得求妳給當個保證人，人先留

下，兩個月交錢。這是我最後的一件心事。你就答應了吧！」婆婆一面說就掉下了眼淚。堂妹說：「只要大哥、二哥兩家同意，我們隨着辦。當保證人是可以，但是不寫字據」。大事成功了，婆婆歡天喜地。結婚那天，請席花二百元，給新娘子買衣服花三百元，給介紹人買一身衣服花五十元。一戶貧困的山區農民，為此虧下了一千五百多元債。

對老四這門親事，鄉親們議論紛紛：「二十八歲的傻小子，娶個十七歲的一枝花，只知道唱歌跳舞，能過日子嗎？」「雞飛蛋打」，「人財兩空」、「……」。這些話傳到婆婆耳朵裡。使本來憂心重重的婆婆心臟衰弱症復發，辦完喜事的第七天，婆婆就病故了。

時間不久，農村包產到戶，按人口分地。根據中共的政策，是把婆婆的一份地收回，新買來的媳婦是非法的，不能分給土地。她生了孩子，因為媽媽是「黑人」，孩子也不能分給土地。無獨有偶，村支部書記和黨員之中，有三、四家是買的四川女子，民不告，官不糾，也都分得了同樣一份土地。

這位女子叫「小英」，是四川省綿陽地區一個農民的女兒，認了一個在重慶市工作的無兒無女的人為乾爸爸。乾爸、乾媽很疼愛小英，讓她去初級小學讀書。那知小英覺得自己年歲比同學們大，怕別人看不起自己。所以名義上是上學讀書去了。暗中和幾個青年男女唱歌跳舞。中共取締「地下舞廳」，抓捕男女「流氓」，有的判刑，有的送勞動教養。嚇得小英整天家心跳不安，害怕犯了案。一位好心腸的「阿姐」說：「我有路費，咱去北京玩一趟，避避風吧」。小英信以為真，就滿口答應了，一路同行不疑，火車到了石家莊的西邊一站地，「阿姐」說：「先到我的親戚家住幾天，然

後再去北京玩」。小英分文不拿，有吃有喝，當然很聽話。到得一家果然熱情招待，親如故交。過了不久，「阿姐」不見了。這時小英才知道是上當了，嚎啕大哭。主人說：「姑娘，不要哭叫，公安局正在抓流氓哪」。心有餘悸的小英不敢高聲哭了。這個主家就是坐地販子的縣去，貴賤不賣給本縣的人。小英三易其身，才做了我堂妹的妯娌。

開始的時候對小英看管的很緊，怕她遠走高飛。時間長了，看小英很踏實地過日子，割麥子又是全村子最快的能手，半年之後小英身懷有孕了，所以也就不注意她了。一天，鄉親們看見小英和一個騎自行車的外地商販悄悄地說了幾句話。人們趕緊告訴了小英的丈夫老四。老四把兄弟五人叫齊，去找那個外地商販，正好那人在村外一棵樹下等「人」。兄弟五人上去就是拳打腳踢，一面打，一面說：「你如果再來我們村，就砸爛你的狗頭」。小商販跑了，可是小英也不見了。這時天色已黑，請了十幾個人，拿着手電筒村裡村外到處去找小英。小英因為沒有和那個外地商販接上頭，不能成行，但是又不敢回來，於是找三嫂——我的堂妹去了。進門就喊：「三嫂，有信封嗎？借給我一個」。尋找小英的人們，也緊隨而來。小英的丈夫老四伸手要打。我堂妹喊道：「老四住手，越打越記仇，還不趕緊問問嚇着沒有」。老四說：「我家的衣物都哪裡去了？」小英說：「在土洞子裡，爛草堆的下面」。小英苦苦哀求，今晚在三嫂家住一夜，並說：「如果不答應以後我還得跑」。於是第二天才由我的堂妹把小英送回家去。

這一場風波過去之後，小英安定了。幾個月後，生了一個女孩。人們都以爲小英這就「落盤

了」。那知孩子三個月時候小英失蹤了。老四找了十幾個人，帶上糧票和錢，騎上自行車，到周圍各村、各縣去找，逢人就問：「見到一個四川口音的女子嗎？」半個月時間過去了，毫無音信。農村買不到牛奶和奶粉，老四整天家抱着小女兒，找有孩子的媽媽們「趕奶吃」。後來，找了一家缺勞動力的婦女施「奶」給女兒，老四幫人家種地。能夠把女兒養活，總算有了一個根。

半年之後，小英自己回來了，而且帶回來幾身「料子」衣服，幾十元錢，但是不肯說出什麼地方去了。只是說以後哪裡也不去了。那時還沒有強制推行絕育手術。後來小英又生了一個女兒。

筆者出國之前，回老家去看望堂妹。妹丈的大哥，是個自作聰明的人。他向我說：「咱村幾個光棍漢，湊了三十元錢，三千斤糧票，請小英回一趟家，給介紹對象，老四增加點收入，小英也可以看看家」。我說：「那就是變相人販子啦」。妹丈在一邊說了話：「大哥，怎麼樣，在外面工作的人也是這麼說吧？以後不要讓小英和那些光棍漢們接近」。

正說話之時，小英和丈夫各自抱着一個孩子也來看我。我是第一次見到小英，細高的身材，粉白的臉，眉清目秀。小英進門好像熟人似的說：「大哥，聽說您要出國啦，多久回來？」我說：「一年到兩年。回來時給你帶點禮物來」。小英比一般農村婦女心靈嘴快，隨口答道：「那就先謝謝您啦」。

筆者沒有文才，只是看到了「人吃人的新聞」，不免有些感觸，隨手照原樣寫來，毫不修飾。筆者如果學會了寫作，國內素材之多，能寫出幾部長篇小說來。

# 勞改生活 十五年

(中國大陸新移民) 龍塘



## 一、起解

六十年代某年初冬的一個傍晚在某省，靠近少數民族地區的Y縣，天上下着細雨，十三輛「解放牌」卡車，開進了縣城邊沿的一條小巷停下來，每輛車上架了輕機關槍，駕駛台坐着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路上稀落的行人見到這押送「犯人」的汽車，都黯然的悄悄走開，他們司空見慣，知道這又是幾百個無辜的人將被送到人煙稀少的龍塘去「勞改」了。

「上清宮」是縣的監獄。這個古老的廟宇，還留存着烏黑的匾額「上清宮」三個金字依稀可見。共產黨統治下的監獄是保密的，沒有正式的招牌，但四週高大的哨樓，使人們都知道這是「監獄」，我們在「隊長」「幹事」的監視和荷槍實彈的士兵嚴密「保衛」下魚貫的從一個小鐵門進入了「監獄」，點名後交與Y縣的獄吏「裝」入了牢房。(註一)

九市尺見方的牢房，內面三層大木架，裝上四十多人，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在卡車上顛簸了一天的「犯人」只好像沙丁魚罐頭一樣裝滿了牢房，腐爛的霉味，大小便的臭味，使人想嘔吐，但困乏已極的人也顧不得許多了，大多沉默的低着頭想着別離的親人和今後的命運。

可是不久之後，由於細小的爭執時有發生，進一步更互相打罵的情形愈來愈烈，而Y縣的衛兵由於我們是寄押，不願費神，而押送我們的人員早已上街去大吃大喝去了，小小的牢房鬧起來更令人心煩意亂，我更為難忍，正在此時坐在我對面的「囚犯」發出了低沉有力的聲音「同犯們(註二)，不要鬧了，安靜下來，

要罵去罵那些壓迫人的禽獸吧！」接着又有一個細小的聲音說道：「是啊！同是天涯淪落人，何必自相殘害？」喧鬧的爭吵停下來了，打架的放下了拳頭，留下的是嘆息聲、輕輕的抽泣，誰沒有家？誰沒有父母妻室兒女？這幾百人中又有多少是有罪的？然而在強權統治下却被判以重刑，流放邊疆，每個人都沉默下來。

## 二、搶飯

在沉寂了約半小時之後，一陣鐵鎖鏗響，牢門打開了，在衝鋒槍的押送下犯人一個一個的都帶上，沒有的只好用破布、帽子(註三)可是從兩個大木桶內舀起來的却是南瓜煮稀飯，一嚼是酸的，一嗅是餿的，一天來僅吃了四兩大餅的犯人渴望了一天的晚餐落空了，有人叫起來：「報告幹事，稀飯是壞了的。」然而這個獄吏答復很乾脆：「昨天就煮好了，你們不來，怎麼不壞？吃不下就算了。」這個答覆激怒了大多數犯人，然而在槍桿底下有何話說，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實在太餓了，唯有排隊去舀。

這時突然在廚房前面的階沿上一個「犯人」高聲嚷道：「同犯們！這裡有乾飯有菜，快來取啊！」這樣一叫，幾百人蜂擁而上，在兩大桶前，兩個人按秩序分給了每個人一份飯和菜，我一看就是在牢房說話的兩個人，這時Y縣的獄吏被這突然發生的事件嚇着了，等他們清醒過來便歇斯底里的叫喊起來：「這是勞動犯人的伙食，你們不能吃，再不停止我要開槍了。」但是這種威嚇在饑餓了一天的「犯人」中是無人理會的，因為在一個縣城裡不便隨便打死幾百人，何況又不是他們的「犯人」這一



點上，大多數犯人都明白，所以兩大桶飯菜終於在獄吏們的氣急敗壞吼聲中全部報銷，Y縣獄吏悻悻的說：「等你們隊長回來再算帳！」當然這種事發生了，其結果是如何大多數人都明白，我知道等待着我們的將是一場殘酷的鎮壓，我勸告他們道：「同犯們，回舍房（註四）去吧。」這兩個「犯人」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們大家都明白這兩個「犯人」將受到「教具」的嚴厲懲罰，還會有不少的「犯人」受到波及，當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懷着沉重的心情，回到牢房，崗樓上的探照燈也熄滅下來。

### 三、審訊

果然在深夜一時，獄警開始在每個牢房叫人出去了，我們知道叫去的就是所謂「靠攏政府立場的犯人」，也就是「犯人」中的內奸，即獄吏安排的一些人，過了兩個鐘頭，又開始叫人了。「COLLUDERS」也就是搶飯的帶頭人，不料又叫了我的名字「GKL」我意識到無恥的內奸把我也列入了黑名單，我已是一「反革命份子」，再加上「反改造份子」，帽子再多也無所謂，也就昂然同行。

行走在巷道中時，C輕輕的對我說「同犯！我會承擔一切，不會連累你們。」我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其實我又何所恐懼呢？十餘年來在極權統治下，我對生死早已置諸度外，何況目前已被列為「專政罪犯」。

走進審訊室，先被戴上了手铐，然後開始審問，要我們坦白交代搶飯鬧監的「反改造的罪行」，被審問的八個「犯人」中有兩個穿著軍裝的是搶飯主謀，我們六個人是從犯，C市的隊長（管犯人的隊長）「棒棒」氣勢洶洶的逼問

，而C却平靜的說：「國家規定犯人定量是一斤，白天在車上吃了兩個四兩麵餅，晚飯應吃六兩，當然應該吃乾飯，我們現在吃的還未超出標準，什麼叫搶飯鬧監？是你們對扣『囚糧』我們有什麼錯？」坐在上面的「隊長」和「幹事」——面面相覷，無言以對，一貫蠻橫的棒棒隊長只好吼叫着說：「好嘛，不坦白交代你們在大會上向犯人交代吧！」當然誰都知道，這是共產黨的鎮壓最後手段，殺雞警猴，他們叫做起到「懲辦」和「教育」相結合的作用，多好聽的名辭啊！

### 四「生」與「死」之謎

在集合場上站了四百多個犯人，週圍站了武裝士兵，台上十幾名獄吏坐着，首先由棒棒隊長宣佈了我們的「罪行」，「聚眾鬧監，搶吃飯菜」；又叫幾名他們豢養的罪犯亂說亂叫一通，算是「檢舉揭發」和「批鬥」，最後宣佈「這種反改造鬧監行為本應嚴懲，由於在押解途中，從寬處理，綁在木樁上罰站一夜，這的確是處理太輕了，我簡直認為兇殘的棒棒隊長今天忽然放下屠刀，要立地成佛了。」

十幾個武裝解放軍把我們八個人分別綁在八個十字架上，但是綁得很鬆，不像平常綁人那樣，雙足站在一疊磚上，我想這真是小學生罰站，太寬大了，這樣站着也能睡覺的，我是第六名被綁，第七和第八名是C和D，我仔細看，不由得驚叫起來，因為我看見足下磚頭的墊法不同，我們是磚頭平放，不會倒，C和D的磚頭立放，只要足一動，磚頭就會倒下，而人也就懸空了，綁索便由鬆變緊，不到半小時人就到陰曹地府去了，任何人決不可能一夜之間雙足保持不動，我明白這是借刀殺人，明天早上，人們看到的將是畏罪自殺的兩名罪犯，

而且還有剩下的六個罪犯作證人，真是陰險毒辣已極。我氣憤已極，也不再考慮自己的安危，良心驅使我叫喊：「這兩個人的磚頭墊得不對」，話音未完，棒棒隊長猙獰的笑道「叫什麼！」順手給我一棒，同時我足下的磚也變為立起的了，我明白我也是同一命運了。這時電筒光熄滅，一片漆黑，獄吏們紛紛離開，我也只好同他人一樣無聲低下頭來，等待我們三人的只有死亡，其他五人也乖乖的去保全自己的生命了，誰還敢去叫？這個社會不會講良心的。

過了一個多鐘頭，人實在支持不住，為了求生存，努力保持不使磚頭倒下，然而這是比登天還難的事，我終於迷糊的睡過去了，彷彿覺得有人在我足下把磚放平，我就在半昏迷中渡過。這是生與死搏鬥的一夜。到快天亮時，我足下的磚頭又被人變為立起的了，我黑暗中看出，這個人是押送我們的排長，但我弄不清楚他為什麼要救我們三個人，因為我一看C和D都還在動，並沒有被吊死。

不多久棒棒隊長和十幾名C市和Y縣的獄吏走了進來，準備來看他們的殺人傑作，然而當看到我們三人都活着時，他們臉上表現出驚訝和疑惑，呆呆的立着，最後棒棒隊長莫奈何的說了一句：「這次便宜了你們，今後若還鬧事，便加重處分。」在眾目睽睽之下也不敢再明目張胆的殺害犯人了，然而這個生與死的謎，仍在我心中十餘年之久未能解答，他為什麼要救我們？一個軍官也許還是一個共產黨員呢！

### 五、C與D之死

經過四天的押送行程，我們終於被送到了

「龍塘」——這個萬人勞改農場。然而我再也未見到C和D，他們被關進了勞改隊中的監獄——小監——（註五）我被分配到「重刑反革命隊」，在毀滅性的十年中的某一年，我却看到了他們二人的屍體，勞改隊爲了要殺雞警猴，集全體「犯人」參加公審宣判大會，進行槍決，當場要我們去看屍體。

我看見八具死屍時眼睛濕潤了，幾年前Y縣的夜晚也是八個人，但除掉C和D之外，已不是當年的那八個人了，我走過他兩人屍體前時見到C的口巾是塞了毛巾的，我意識到他在臨終的一刻也未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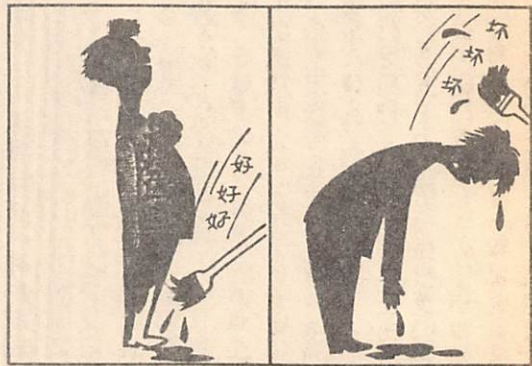
事後經我多方探詢，知道了他二人的一些事實，C是「抗美援朝」中的排長，D是文工團團員，都是由大學裡參軍的學生，後來在反右中被打爲右派，因不服再升級爲「反革命」以至槍決。

在槍決的前一天省城的某處長特別來找他談話，下面我記幾句話也就知道他二人的臨死不屈了。

「你們只要認真交代反對共產黨，攻擊毛主席的錯誤，我們可以從寬處理，不殺你們」某處長審問時說。

C抬頭看了某處長一眼，微笑一下說：「不能！因爲我根本沒有錯，我相信過它們，崇拜過它們，因此我在朝鮮戰場流血犧牲在所不惜，然而今天這一切都是欺騙，把中國引向獨裁與專制，假使要我說我錯了，都只能說當初的盲目與幼稚，生與死的區別不在於生命的存在而在於怎樣活。」

我在目前處在自由的國度裡，仍忘不掉倒在地下八具死屍和Y縣的夜晚，「民主」「自由」「人權」在我們自己的祖國中只是對人類的極大諷刺。



紅與黑

馬德升

## 六、謎的破解

毀滅性的十年過去了，又經過幾年調查，我被釋放了，在臨行前的幾天，我到M區去趕集，也是「自由」後的權利，在山坳口上坐下來略事休息，從對面坡上也走來一個人，我點燃了一支香煙，他也坐了下來，我敬上一支紙煙就聊起來了，他問道「你是龍塘的人嗎？」

我回答：「是的」。

「新生了？」（註六）。

「釋放了，幾天內回家」。

「那就好，是從C市來的吧？」

「是的，我一面回答，一面感到這人很面熟」

他又問：「哪一年？」我說「××年」

我猛然從這蒼老黝黑的臉看到了十多年前一張年青的臉，我立即問道：

「你是×排長，你認識我吧？」  
他茫然的注視着我，我明白我已衰老到什麼地步，十幾年的折磨，已不是當年的我了。我提醒他「Y縣之夜」他記起了我，點了點頭悲哀的說「你還好，可惜C和D已死去七八年了。」

我也黯然的說：「不是你救我，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他注視我一陣，沉重的說「過去的事提它幹啥？一個人要有正義良心，你們三個知識份子，怎麼也不會殺人搶劫的，有的人心太狠了，我可不願昧良心，過去的事也就不必多談，我退役後在森林局作伐木工，我沒有當官，但也未作危害國家人民的事。」

「回家後你還是勞動吃飯的好，騙人的話再也不要相信，願你我都好」。

說完之後他下山了，我也下山了，方向相反，但認識却一致了，我沉默的下山，十多年前那一個陰暗的夜晚在我腦子裡迴盪，他救了我們，但最終只救了我一人。

以上的遭遇只不過是一個備嚐苦難的人，在極權國家裡爲人權而鬥爭的一段小插曲。

（註一）隊長幹事，都是「犯人」對獄吏的稱呼，棒棒隊長是因爲經常拿一木棒，隨時打犯人，故「犯人」贈與此綽號。

（註二）同犯是勞改隊規定「犯人」之間的稱呼。

（註三）勞改隊無餐具，供給多由家庭送，但無家的就只好用布包。

（註四）「教具」是刑具的美稱。

（註五）「小監」是獄中之獄，是對反抗者的懲罰，大小只夠一人坐或站，不能睡眠。

（註六）他們把釋放叫「新生」意思是改惡從善了，獲得新生命。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民主！」、「根據憲法，國內學生有權遊行！」等。

**紐約中國留學生聲援  
國內大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下午，在紐約留學的部份中國大陸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在中國民聯總部組織下，前往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冒着凜冽的寒風，舉行請願、示威活動，要求給予國內大學生合法的遊行、示威權力。

多數請願、示威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頭帶面具，他們手持的橫幅標語上寫着：「維護憲法賦予的國內學生遊行示威的權利！」、「聲援國內大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此外，還有多人舉着標語牌，上面的標語有：「紀念一二·九，反對北京當局壓制學生！」、「要經濟改革，也要政治改革！」、「要四化，也要自由

請願示威後，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代表請願、示威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中國民聯部份成員，在大批記者的陪同下，前往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遞交「部份中國留學生、中國民聯部份成員致國內大學生的聲援信」，要求紐約領事館留學生管理處將此信轉達給國內北京大學等校的學生。領事館傳達室工作人員詢問留管處之後，說沒有值班人員。這時，紐約領事館副總領事阮克山先生突然從樓上衝下來，厲聲指責傳達室工作人員：「怎麼讓他們進來的？」傳達室人員說：「他們按門鈴，我們就開門了。」阮克山瞪了他們幾眼，走出傳達室，向等候在候客室中的王炳章先生及記者們喊道：「滾出去，都給我出去！」王炳章走上前去問道：「您貴姓？」並將「聲援信」遞過去。阮克山一把搶過聲援信，將之撕得粉碎，摔在地上

，繼續怒氣沖沖地推搡王炳章，並大聲喊叫：「出去！出去！快出去！」王炳章見此人在大批記者面前實在有失大國外交官的風度，便對他說：「你曉得嗎，你們外交人員也受不合理待遇，你們不敢講話，我們為你們講話，為你們爭取權利，你好好想想吧！」

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阮克山的粗暴行為和無理態度，都當場被新聞記者拍了照、錄了相。紐約華語電視台事後播放了阮克山的表現，使紐約僑界瞠目結舌。最近，紐約總領事館頻頻向僑界展開微笑統戰，僑界似乎感到他們的作風有所改善。然而，十二月七日阮克山副總領事的表現，使大家大失所望，頓時感到中共的統戰缺乏誠意。一位記者走出紐約領事館說：「中國大陸的外交官怎麼是這個樣子？他們連自己的留學生都容忍不了，還談什麼對台灣統戰？」

王炳章等人走出領事館後，將傳單發給出入領事館的中國大陸外出人員。

紐約部份中國大陸留學生的請願、示威活動，持續了約一個小時。數名同情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美國人士也參加了示威行列。

### 中國民聯總部就聲援 國內大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舉行記者會

中國民聯總部公共關係秘書、中國大陸留學生吳軍和總部委員、中國大陸留學生黃仕中，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在紐約舉行記者會。在記者會上，他們散發了一份部份中國大陸留學生和中國民聯部份成員簽署的聲援信，聲援國內大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他們還散發了一份最近由國內轉出的署名為「紀念一二·九

五十周年指揮部」的傳單，傳單上有「打倒現代的李鴻章！」等口號。

## 日本分部聲援國內大學生 愛國民主運動

中國民聯日本分部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份就國內大學愛國民主運動簽發了一封聲援信。聲援信號召國內大學生們「發揚『一二·九』運動光榮傳統，將中國民主運動推向高潮」。聲援信指出：「隨着新洋務運動的興起，由上至下吹起了崇洋媚外之風。中共現領導者不汲取先進國家民主政治的精華，只垂涎西方經濟的繁榮；不尋求社會制度的變革，一味欣賞外瀝和洋務的萬能，致使在今日中國的土地上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部分中國大陸留學生頭戴面具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前請願示威，反對北京當局壓制學生運動！



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右）進入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遞交聲援國內學生運動的函件。副總領事阮克山（左）搶過函件，將之撕毀。王炳章對阮克山說：「你應明白，我們是在為你們爭取權利，在為你們講話。」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三日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在威斯康辛大學演講，二百多大陸、台灣、香港留學生參加。

## 國內大學生歷而不服

人比中國人要高出一等……。我們祖國的命運又一次處於抉擇的關鍵時刻。眼前的當務之急，不應是在所謂的『小康』、『翻兩番』之類的幻夢中陶醉，而應是首先奮起變革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專制制度，爭取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真正實現」。聲援信通過各種管道，已大量傳入中國大陸。

自一九八五年「九·一八」以來，北京及全國各地大學生展開了愛國民主運動。這一運動，震驚了鄧小平和中南海高層。中共建國前善於發動學生運動、並用學生運動給了國民黨

政權極大困擾。鑒於中共高層深知學生運動的意義，他們想方設法預防北京大學生在「一二·九」發動示威遊行。

北京高層用了軟硬兼施的方法。

軟的方法：官方搶着主辦「一二·九」紀念大會；安排中國女子排球隊和戰勝日本國手的圍棋健將聶衛平去北京大學聯歡；用「畢業後分配到好單位」為誘餌軟化某些積極份子等；

硬的方法：以「開除黨團籍」、「控制畢業分配」、「控制出國」為要挾；以「反對改革」、「破壞安定團結」、「與國外反華勢力相配合」等大帽子為恫嚇。

在北京高層數個月有計劃地壓制下，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校原訂的「一二·九」大遊

行未能實現。

然而，學生們壓而不服。一部份學生秘密組織的「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周年指揮部」在「一二·九」前向全國散發了傳單。傳單上的標語有：

發揚一二·九精神，不忘國耻、振興中華

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反對日本對華不公平貿易！

打倒現代的李鴻章！

要四個現代化，也要自由民主！

全國工農兵行動起來，支援學生的愛國行動！

北京大學有的同學說：「時間長着呢，走着瞧！」、「只要現代的李鴻章還存在，我們就不會罷休。」北京及全國學生運動的實質是反對新的洋務運動，要求自由和民主。只要當權者不改變崇洋媚外的政策，不在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相應的政治方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問題的根子就存在，學生運動就有隨時爆發的可能。「九·一八」、「一二·九」、「慶祝女排奪冠」等，都只不過是藉口而已。當局若想平息學生運動，應該用治本而不是治標的辦法。

## 國內大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在留學生中產生回響

國內大學生最近掀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在廣大海外中國留學生中產生了迴響，在美國部份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讀到「中國之春」雜誌卅期刊登的北大部分同學就愛國示威致中國留學生的公開信後，展開了討論。討論中，出現了三種意見：(一)認為國內大學生所提的口號有

排外情緒，不利於開放和改革政策，不應予以支持；(二)認為國內大學生運動的內涵是爭取自由、民主，應該給予全力聲援；(三)認為不管國內大學生們提出的口號正確與否，但大學生們應享有憲法規定的遊行、示威的權力。經過討論，多數人傾向於第三種觀點。一些留學生寫信給國內的大學同學，對國內大學生運動表示關切。

## 中國民聯世界二大籌備處 募捐取得成績

為了籌備中國民聯世界二大的召開，籌備處展開了積極的募捐活動，除向一些老支持者們聯繫外，還不斷開闢新的捐款對象。截至十二月中，籌備處已募到一萬多美元，為大會的順利召開準備了條件。儘管有了一些捐款，整個團體的經費仍十分拮据，與擔當的任務很不相稱。為了替組織節省開支，除與會的留學生代表獲得部份旅費補助外，有固定收入的與會代表一般都自費與會。

大會籌備處謹向捐助者致以深切的謝意。

## 中國民聯在威斯康辛大學 舉行演講會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三日晚，由香港留學生組成的一場中國民聯演講會，由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以「中國的民主前途——兼談一國兩制」為題，發表了演說。

演講會由威斯康辛大學中國同學會會長，香港留學生張銘凱主持，容納二百多聽眾的演講室座無虛席，約半數為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

生和訪問學者。

王炳章在演講中，從香港的最新形勢發展談到一國兩制提出的背景，從香港未來形勢演變的趨勢談到香港、大陸的交互作用。王炳章認為，香港只有健全代議制度和建立政黨政治，才能有效發揮民主的力量，從而抵制中共的專制控制。王炳章說，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是香港人民缺乏信心，不相信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為使香港人民建立信心，中共不妨先在大陸內試行下一國兩制，讓一國兩制遍地開花，但他懷疑北京當局有這種誠意。王炳章最後指出，香港的真正出路在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鑒於此，他呼籲香港各界除支持本身的民主化運動外，並支援大陸的民主運動。

王炳章講演後，台灣、香港、大陸留學生踴躍發言，紛紛發表自己的見解，並對中國民聯的立場和觀點進行坦率地評論，場面之熱烈，是威斯康辛大學自七十年代保釣運動以來少見的。會後，一群大陸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又圍着王炳章，就國內形勢和中國民聯的方向交談至深夜。

第二天上午，王炳章又約見了一批中國大陸研究生，就中國民主化走向問題，進行了更具體的座談。

座落在威斯康辛州州府麥迪森市的威斯康辛大學，目前是中国大陸研究生和訪問學者人數最多的大學，連伴讀家屬在內，有二百五十多名。大陸留學生紛紛反映：中國民聯的這次演講會十分成功，使他們對中國民聯有了很多的了解。他們大多認為，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存在，對中國大陸留學生思考、認識中國的未來走向問題，具有重要價值。中國民聯的演講，給這所平時冷寂的大學，帶來了一些「春」的氣息。

# 從美國納粹的示威

## 看國內大學生的遊行

### ——談維護憲法的尊嚴

(中國民聯) 王炳章

國內學生運動又活躍起來。從「九·一八」到「一二·九」，大學生們以「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反對日本經濟侵華」、「不忘國耻、振興中華」為首批口號，逐漸揭示出「要四化，也要自由民主」的運動內涵。

學生們的行動，引起了國際間的注意，引起了國內外的紛紛議論：學生們是不是反對開門政策？是不是反對改革？他們的某些口號有沒有道理？是不是有利於「四化」？該不該支持學生們的行動？

如果祇圍繞某些特定的口號進行分析和辯論，就抓不到問題的癥結。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學生們的某個口號、某項要求有多少合理的因素（這是見人見智的問題），而在於學生們有沒有提出自己要求的權利，有沒有遊行示威的權利。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了人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那麼，憲法的精神要不要兌現，憲法的尊嚴要不要維護？是不是祇有在人民群眾的要求「百分之百合理」時，才有遊行示威和請願的權利？

我的看法是，即使大學生的要求「百分之百」的荒謬，他們也應享有憲法賦予的遊行示威的權利，何況，當前大學生運動本來就含有「不僅要求經濟改革，而且也要要求政治改革」的合理內涵呢？

這裏有一個要不要維護憲法精神的原則問題。

前幾年，美國、加拿大曾播放過一齣發人深省的電視劇「斯考奇」(SKOKIE)。斯考奇是芝加哥一個區的名稱，是猶太人的聚集區。芝加哥也是納粹黨總部的所在地，崇拜希特勒的法西斯黨的卍黨旗，在總部門口迎風飄揚，向美國的民主制度公然示威。一天，納粹黨總部做了一個挑戰性決定：到斯考奇猶太區遊行示威。決定立即引起軒然大波。猶太人和納粹是死對頭——希特勒滅絕猶太人的罪行路人皆知。以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力，一小撮納粹份子竟然要到他們的居住處示威，這不是到太歲爺頭上動土嗎？舊恨新仇湧上心頭，斯考奇的猶太人群情激憤，委託了雄辯的律師，

告到法庭，試圖用正義阻止納粹黨人的行動。納粹份子有沒有權利到猶太區進行挑畔？從理念出發，沒有一個非納粹黨人給予肯定的回答。

然而，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年輕的猶太律師在法庭挺身而出，為納粹黨人的「權益」進行「辯護」，聲稱他們應該享有遊行示威的權利和自由。

斯考奇區沸騰了，矛頭轉向這位年輕的猶太律師，一頂頂「叛徒」、「敗類」的帽子扣了過去。聽聽這位猶太律師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吧：我的父母是被納粹殺害的，講仇恨，我比誰都深。但我今天維護的，不是納粹的荒謬主張，而是美國憲法的崇高精神！憲法賦予了每個公民、每個社團的遊行示威權利。不錯，納粹份子今天的少數，然而，我們以前在德國不也是少數嗎？正是希特勒不維護憲法的尊嚴，把我們少數人的正當權利剝奪了，把我們猶太人屠殺了。如果我們今天不維護憲法的原則，我們今天仍處於少數的猶太人早晚會遭受另一次壓制和迫害！

這是多麼鏗鏘有力的陳辭！這是多麼富於哲理、富於法治精神的辯稱！法院判決：根據憲法，納粹黨有權和平示威。遊行那天，斯考奇的猶太人全體出動，高呼口號，進行反示威。警察一字排開，避免衝突。當納粹的車隊開抵斯考奇的邊界時，車隊突然停止，納粹頭子宣告：我們被那位年輕律師維護美國憲法的精神所感動，決定取消到猶太區內的示威，遊行到此結束。衝突避免了。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反思，斯考奇區的猶太人終於體會到了那位年輕律師為納粹黨人「辯護」的內涵。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我應邀到芝加哥伊里諾理工學院座談「中國之春」。會後，我去

了斯考奇區。漫步在街上，耳邊不由響起了那位年輕猶太律師的慷慨陳辭。我沉思着：是的，芝加哥允許納粹黨人的合法存在，允許它在憲法範圍內為爭取自己的理想進行活動。這荒唐嗎？不！它的存在，就是對美國人民的最大提醒：不要忘了世上還有人想實現納粹的美夢，不要忘了二次大戰血的教訓。相信群眾吧，不合理的東西，從長遠看，不會被多數群眾所接納。

走筆至此，想想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當權者視學生的和平遊行為洪水猛獸，視憲法為空文，連學生們表達愛國情懷的權利都不給，不禁搖頭三嘆。共產黨「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信念哪裏去了？

我又想起今年夏天紐約市市長郭德華帶領同性戀者大遊行的事。同性戀者在美國、在全世界是少數，受到社會的歧視，但他們在民主社會享有通過合法手段爭取平等待遇的權利。紐約同性戀者在市中心大遊行時，市政府不僅不壓制，備受紐約市民尊敬的郭德華市長，還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成了報紙的頭版新聞。是郭德華市長提倡同性戀嗎？不！他是維護同性戀者有表達心聲、有遊行示威的權利。想想我們國家，同性戀是違法的，一經發現，即被勞教。別說同性戀者大遊行，連大學生集合起來，在天安門廣場走一走，都不能容忍。

納粹黨、同性戀，都是肯定的少數。但在國內，同情、支持大學生運動的人，並不見得是少數。在我們國家，別說維護少數人的權利，就是多數人的意願，有時也不能違從。

群眾要求是壓不住的，學生運動是壓不住的。越壓，反彈就越大。如果紐約的市政府壓制萬名同性戀者的遊行，不知會鬧出多少亂子。對待群眾遊行怎麼辦？讓他們遊好了，錯誤

的主張一定被社會所拒絕，遊遊二三次也就沒勁了。倘若要求合理，執政者汲取它的營養，調整自己的政策，被汲走營養的群眾運動必然萎謝，消失於無形。

設想一下，北大學生自發地遊行起來，如果胡啟立等像郭德華一樣主動參加進去，帶領大家走一趟，然後坐下來，虛心聽聽同學們的內心想法，學生們還會有那麼大的對立情緒嗎？自稱為「先進階級」——無產階級政治家的

## 為那些我永遠

### 愛着的人們

艾菲

無聲集

誰說我有痛苦

不，我有的只是麻木

誰說我還活着

不，我只是風中的枯樹

我希望深深地忘掉

我所走過的道路

但我却不想知道

那前夜是什麼去處

沒有喜悅

沒有愁傷

沒有憂愁

沒有憤怒

誰說我有親人

不，我有的只是孤獨

誰說希望還存在着

不，它已是消失的晨霧

天使們滾開吧

我現在寧願聽從

魔鬼的擺佈

中共領袖們，還是向「腐朽階級」——資產階級的「政客」學點東西吧！

在此，我對國內學生運動的要求不想多作評論，我要大聲疾呼的是，他們應該享有憲法賦予的遊行示威的權利！我們不要爭辯他們的某個口號，而要維護憲法的尊嚴！

夕

（寫於「一二·九」五十週年紀念日前

(十)

歌唱吧，我親愛的琴弦

唱一首憂鬱的思鄉曲

讓琴聲撕破冬夜死一般的沉寂

把我的心聲，帶到遠方的愛人那裏

歌唱吧，我親愛的琴弦

唱一首歡樂的協譚曲

讓琴弓把旋律變成金色的火焰

在夜幕上繡出神秘的誓語

歌唱吧，我親愛的琴弦

唱一首莊重的鎮魂曲

讓琴弦發出陣陣沉重的嗚咽

把痛苦和愛情一起帶到墳墓裏

(十一)

讓我們舉起金色的酒杯

滴上一滴燃燒着火焰的清淚

淚出和着紅色的甘醇

死神啊，我願和你一同沉醉

唱上一支愉快的歌曲

讓美麗的旋律把我的痛苦撕碎

然後做上一個金色的迷夢

讓夢中的愛人把我盡情撫慰（未完待續）

## ●文藝園地●

# 薄雲與他

●民運報導●

## 「灰暗的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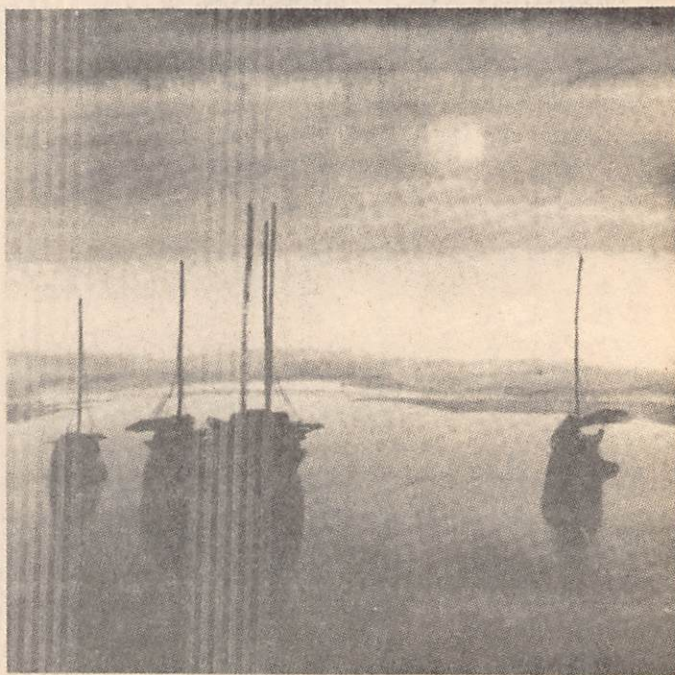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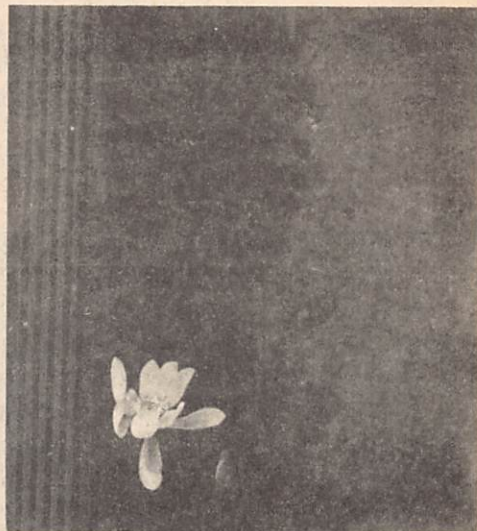
耿晨

「星星」——那個美術新生兒光屁股的時代離現在已經很遠了，當年的「星」人經歲月的陶冶也已東分西散，有漂出海外的畫家李爽、雕塑家王克平，有留在國內的拐腿畫家馬德升，也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星」人在各地開拓着自己的疆野。

薄雲，是「星星」的開拓者之一。在「星星」之後的若干年內，他沒有停留在往日的喊「冤」聲中，「過去的都已過去了！」歷史不會再重演。不滿足命運的人唯有創新，才能開闢新的天地。薄雲就是在創造和思索中渡過這



薄雲



上圖：世物皆濁荷獨清，天地皆昏花獨明。薄雲的「荷」不正是這種寫照嗎？

下圖：風雨靜，夜已去，船兒們已疲倦；日已高，雲未散，船兒們仍安睡在幽幽的夢鄉。待到他們夢鄉回來，必將踏上光明之岸，灰暗的殘雲也將為他們退散。這不正是薄雲「船與水」的畫意嗎？

幾年受壓抑的生涯的。最近，他受法國漢學界的邀請，於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在巴黎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大廳裏，與王克平一起舉行了作品聯展。共展出二十餘幅畫作和六件雕塑。

薄雲的畫，從整體的格調來看，充滿了灰暗的氣息。無論是人物畫還是山水風景畫和花草畫，都籠罩在一股陰暗和壓抑的氣息裏。也許正是這種表象、這種格調、這種手法，遭到了中國傳統老夫子們（政治上的「老夫子」和藝術上的「老夫子」）的貶責。因此，這些青



年藝術新派處於處處受壓、受排擠的境遇，但在藝術上沒有表現的機會，而且在政治上也被視為一群不安份守己的政治危險份子。

但是，這一代人的「灰暗」並不是絕望，以薄雲的「荷」為例，可以看出，整個畫面的污穢使人覺得世之渾濁，昏天黑地，污泥濁水，恰像永遠值得批判的現實人類生存環境似的。然而，在這污穢的天地間，畢竟還是有「希望」，這希望就是那朵潔淨的荷花，雖然它身上有傷痕，有被生活摧殘的痕迹，但它仍是整個畫面的希望，而且也許正是由於這污濁的背景，才更使這「自潔」的身顯得更為超然。這就是畫家、也是畫家這一代人的人生寫照。

同樣的情感也表露在他的另一幅作品「船



薄雲的「走出黑暗」（原名「鄉鎮」）。狹窄而又陳舊的巷子裏是灰暗的，但巷子絕不是無限長，你只要肯不停地探索，終究會走出巷子，走出黑暗，然後進入光明的廣闊天地。

與水」之中，作品的境界給人一種超現實的「靜」感，落帆的桅桿、無風如鏡般的水面，煦陽之外一層似遮非遮的薄雲，無人無樹的遠山……然而，「中國畫」傳統的超現實「靜境」的手法，在這裏具有它的新意，給人的感覺是：這靜靜的船是在經過一番搏鬥、漂泊和勞作之後剛剛靜下來的，它們剛剛經歷過黑暗，雖然已是日高三丈，但它們仍然耐睡在黎明（即使是黃昏也無所謂）。中國人民是應該靜下來過一點「人」的日子了，其他的都不重要。特別是統治者那「振興」的鞭促聲，在這短暫的休息中，不是太煞「風景」了嗎？中國人民是不會「睡死」，而會起身勞作的，因為那船、那河都不是富豪者的境地而祇是勞作者的鄉土。

也是由於畫面頂天底水的昏暗，那太陽、那遠天和遠水，才顯得格外明亮，而且這光明離主題已經不遠，不是遙不可及的事。就那身處於光明與黑暗交界處的船，就給人以鼓舞，使人產生躍躍欲試之念，這畫可說是暗中有明，靜中有動。

還值得稱讚的作品是薄雲的「走出黑暗」（原名「鄉鎮」）一幅畫，畫面上有一個剛剛走出陰暗小巷的人，可以看出（或可以想像出）這是一個少年，他走到了那狹險陰暗的小巷盡頭，面對着太陽，雖然他暫時還不知道遵循哪條路去接近太陽，但——他的脚步並沒有停下來！這就是希望！哪怕他太幼稚，竟然走下了那條在觀眾看來是「斷崖」的盡路。但從他那對光明的熾灼嚮往，就足以相信——他！一定會堅定地走向光明，無論是在水中掙扎還是再走一條曲折的新路，終究他是不会再回到他那所走過的「小巷子」裏去了！這，難道不正是中國大陸和台灣新一代青年的信心寫照嗎？這不也正是中國未來命運的一個預見嗎？就是靠了這種信念，畫家、青年、人民與生活才在這小小的畫卷上熔為一體。

和其他許多青年畫家、青年藝術家一樣，作者在大陸的藝術環境中是受壓抑的，藝術家們的自由展出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甚至以「干擾社會治安」為罪名讓警察插手來管理藝術……中國共產黨啊！你若把世界上一切美的東西都打成「資產階級的……」，可要當心有那麼一天「資本主義」倒必然會勝利。你們真蠢！為什麼不把人民所喜歡的這一切——花兒、少女、音樂、藝術和民主等等，納入「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呢？

不是說：「……社會主義沒有固定的模式嗎？」

# 給你…… 勇敢的探索者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高今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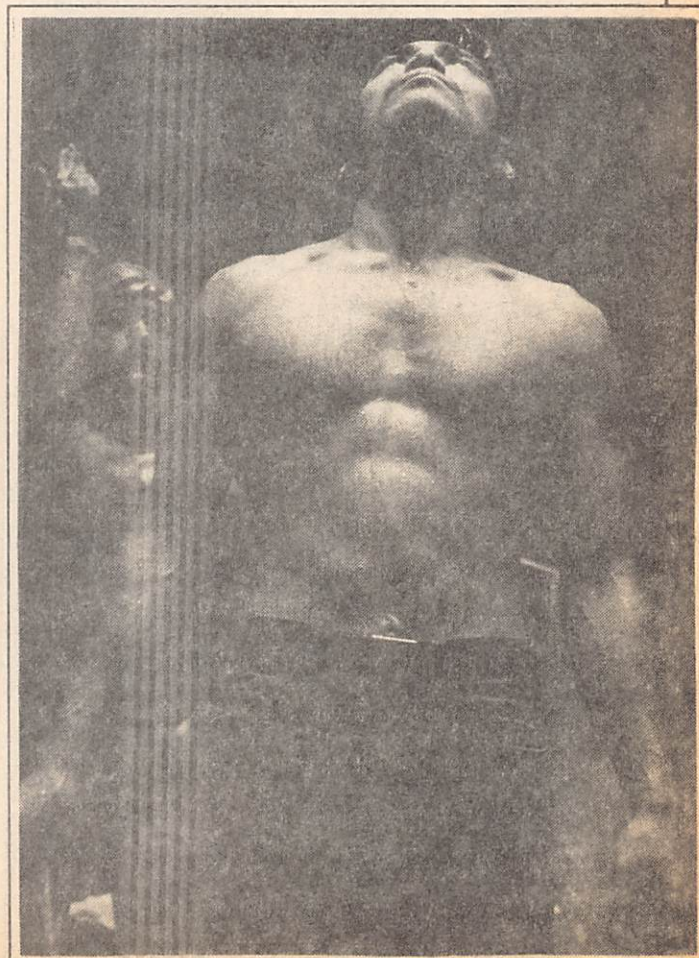
在國內的時候，常聽朋友傳說海外有個叫做中國民聯的民運團體，發行一本名為「中國之春」的月刊雜誌。繼承着北京之春的民運精神，正在開創中國民主運動新的進程。使得我這個當年曾滿懷激情，參加過天安門廣場紀念活動和西單民主牆活動的青年，心中感到溫暖和神往。原來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命並沒有停息，青年民主派戰友們曾高擎過的火炬，正在世界上熠熠發光，這是使人何等興奮的事啊！

我有機會來到日本留學，初到這個花團錦簇般的繁華大東京，壯觀的都會風光、幻境般的遊樂場所、異國的新鮮情調，對我全無吸引力；而在緊張的課餘，我首先是到處跑書店，尋找「中國之春」。

當我第一次在東京的一內山書店「的書架前翻閱「中國之春」的時候，心潮無比起伏激蕩，那每一個標題、每一幅圖片都能引起我的回憶和追思。當我讀到一篇篇文章，為營救身陷囹圄的國內民運戰士而大聲疾呼吶喊的時候，我不禁熱淚盈眶，感到多少民運先驅的血沒有白流，民運志士的苦沒有白受。往事一幕幕如小詩、如清泉瀝瀝掠過我的心頭……

一九七八年底，北京寒冷的冬天正在受着一股熱浪的沖擊；這股熱浪來自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它向人們傳播火的溫暖、春的氣息。

那時，在為數眾多、層層疊疊的大字報中，我特別注意到署名「金生」的文章。如他寫的揭露秦城監獄黑幕的文章，以及他所提出的



關於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主張，都曾博得讀者們的贊許，至今人們記憶猶新。他的文章以極其鮮明的觀點、勇敢的批判精神而引起人們的注意。「金生」這個耳熟的化名不由使我聯想起文革時期就已聞名的一位老校友——人大附中的魏京生。當時他是反對中央文革的秘密組織——「聯動」的成員，曾受到過通緝。其後，在北京之春時他創辦了「探索」雜誌，在民主牆前出售，每次都被搶購一空。這是一份油印的小冊子，封面上有兩個紅色的大字——「探索」。並列有通訊地址：北京阜城門外大街×巷×號。一天我按照這個地址去拜訪了他。原來這個地址是建工部的宿舍。灰磚的樓房，是五十年代修建的；樓梯、走廊都很寬敞。魏

京生住在三層的一個單元房間裏。他的父親據說是建工部裏的一位司局長級幹部，正是依靠父親的地位，魏京生才能夠自己單獨住一套房子，才有條件搞印刷、辦刊物。但他父親的思想十分保守，公開反對兒子搞民主運動，因此而父子不和。他的室內只有一個單人床、一張桌子、兩三把椅子，幾乎沒有什麼傢俱。牆邊有一堆白紙、一個油印機。京生中等個子，留着很普通的頭髮，穿着也很樸素，幾乎和在大附中讀書時沒有什麼兩樣。他待人熱情、說話誠懇。因為我們是大附中時的校友，久別重逢，倍感親切，兩人談得十分投機。我們從天安門「四五」運動談起，一直談到當前的民主運動。當我問他，黨內是否有人支持這次民主運動時，他說，這次的民主運動比「四·五」運動更加廣泛深入，由於這次的民主運動完全是群眾的醒覺、自發性的，並且敢于公開起來批判毛澤東乃至共產黨，所以黨內非但不會有人支持，反而有可能再次遭到鎮壓。他還說，有個外國記者要來他這裏拍紀錄片，他沒同意。又說，他正在學習英語，有時間還想學習日語。果然，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三月中旬的一天，當我去他那裏時，他告訴我，公安局已通知他不得離開北京，他每次外出時都有便衣跟蹤。他風趣地說：「這下我的安全可有保障了。」實際上他當時已作好了被捕入獄的思想準備，他請我不要再去找他了。三月二十五日，我看到西單民主牆上貼出他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直接抨擊鄧小平的獨裁傾向。四天後（三月二十九日）他終於被捕。與此同時，各地的一些民運知名人士也相繼被捕。全國性的鎮壓開始了，迫使民主運動轉入了地下。他被捕後，我曾到處打聽他的消息，也曾聯絡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和朋友企圖營

救他和爲他鳴不平，但終因公安局對消息封鎖很嚴，我們始終無從下手。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魏京生一案。所謂「審判」，實際上是秘密進行的。第一次發出的法院入場券在臨開庭之前突然宣佈作廢。只有特別獲得許可的人才能入庭旁聽。當時曾有人公開表示自願來替魏京生出庭辯護，但魏京生表示將親自爲自己辯護。因爲他堅信自己是無罪的、是正義的。他在法庭上說：「你們今天是以所謂的反革命罪來審判我，但是歷史必將證明，那些逆民主潮流而動的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幾天後，當「四·五論壇」的成員在民主牆前出售根據錄音整理的法庭審判記錄時，大批警察包圍了現場，沒收了全部油印刊物，並且逮捕了出售刊物的人以及許多排隊購買刊物的群眾。當時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記得群眾正在蜂湧排隊購買刊物時，忽然有人喊一聲：「警察來了！」於是出售刊物的幾個青年人拔腿便跑，一邊跑一邊將刊物向空中拋去，警察在後緊追不放，群眾爭搶着飄在空中和落在地下的刊物，警察又從群眾手中搶奪刊物，場面一片混亂。很多外國記者紛紛拍照，也被警察帶走，數輛警車就停在長安街邊。很多圍觀的群眾看到這個場面，都十分氣憤。警察們拉起人網，阻止外面的群眾進入現場。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當局在民主牆前大規模鎮壓民主運動的一次公開暴行。在這之後不久，民主牆也被封閉了。當時，有一位化名「凌冰」的青年（「探索」的成員）在民主牆上張貼出一首詩，詩名爲「給你……」，他鏗鏘有力的詩句，至今銘刻在我的心中：

我的朋友，  
分別的時候已經臨近，  
再見了——民主牆。

我能對你說點什麼呢？  
說春天的寒冷？  
說你像臘梅一樣凋零？  
不，還是說歡樂吧。  
說明天的歡樂；  
說純淨藍色的天空；  
說野外金黃的花朵；  
說孩子透明的眼睛……  
總之，我們好像  
男子漢一樣分手，  
你說對嗎？  
冬天，十一月——  
寒冷把我驅趕到你面前，  
你用灰色的牆壁擁抱了我；  
並用灰色的眼睛對我說出：  
——純潔、友愛、希望。  
你低聲對我說，  
——點起一堆篝火吧！  
讓孩子們不再感到寒冷。  
我的心融化了，  
不由自主地在牆上  
畫出一堆堆紅色的火。  
有一個老人走過來，  
指着你對我說，  
——孩子，不要暈眩了，  
那是這美麗的泡沫；  
那是你自己的倒影。  
我的心哭泣着奔向你，  
——不，那不是泡沫，  
不是倒影，  
那是你，  
你——民主牆！  
也許再過幾天，  
我會坐在一個

圍着鐵柵的窗底下。

那時會有幾個

冰冷混濁的目光，

走過來盤問我。

他們不理解，

我們爲什麼能走到一起。

我要大聲地對他們說，

不，對世界說：

你——就——是——我！

是我童年溫柔的夢；

是小紅帽、灰姑娘、白雪公主；

是勇士復仇的劍；

是人們善良的願望；

是一顆顆流着血的心……

也許有一天

我將要被迫離開你，

到天的那一邊

和星星一同嬉戲，

那時天空會是我的畫板；

那時風暴將是我的琴弦。

我要大聲地歌唱，

唱美麗的諧音。

唱愛的嚶語；

唱你、唱大自然、唱希望……

我相信

你不會消失，

也不會死亡。

在孩子恐懼的眼睛裏，

在成人低垂的頭上，

在每一個活着的人心中，

我都看到了你！

在海的沸騰中咆哮着的你！

記住吧，

只要有人類就有你！

這首詩後來曾多次在民主集會上朗誦，在

北海公園內舉辦的「星星畫展」的說明詞中引

用，影響很大，可稱得上是民主牆晚期的優秀

代表作品之一。在極權的鐵蹄下，魏京生終於

被欲加之罪判處了十五年徒刑。在當時的大學

競選風潮時期，大學生們公開集會抗議當局對

魏京生的非法審判。幾年來，海內外關心中國

民主運動、維護人權的團體組織不斷向中共當

局呼籲釋放魏京生，但中共當局置若罔聞，一

意孤行，毫不理睬國際社會的輿論。據大赦國

際組織一九八四年公佈的一份資料顯示，魏京

生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曾被送往北京

復興醫院治療，有可能已被折磨得神經失常了

。但根據我個人對魏京生的了解，以他的堅定

信念以及堅強性格來說，是不會神經失常的，

也許是患有其它疾病。林希翎二十三歲時被捕

入獄，也是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她出獄後並沒

有神經失常，何況她在獄中還經歷了無法無天

的文革時期。

如今，魏京生、王希哲、傅申奇、劉青、

徐文立、何求這些民運的知名人士，這些有理

想的年青人仍在中共的監獄裏受盡煎熬。我們

要問，一個自稱是「優越的社會制度的強國」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難道

它的「光榮」就顯示在它力量逮捕手無寸鐵的

民運人士嗎？難道它的「偉大」就在于它能

頂着輿論壓力，逆民主潮流而動並肆無忌憚地

迫害民主群眾嗎？！我們要再次提醒中共當局，

鎮壓民主運動決沒有好下場，人類歷史已經證

明並正在證明着這一點。逮捕、關押民運人士

這筆帳是遲早要清算的。如果中共領導人中真

有「明智派」的話，現在立即宣佈大赦，釋放

全部政治犯，及早改正錯誤，回到人民的立場

上來，「亡羊補牢」，尚爲時不晚。

### ●文藝園地●

## 小路之憶

(中國大陸詩人) 嵐之凝

我回憶起昨晚小路邊的情景

默默地站着

我與你，相對無言

彷彿彎着脖子的街燈旁

又兩根眼光暗淡的柱子

……

我悔不該說出那句話

一句話——炸開了心中的惶亂

連時間的碎片

也飛沒了影

兩件冬外套之間——彌漫着填滿緊張的真空

紅色的平靜，紅色的平靜

無法對住一個真實的吻

理念與現實——

這古老的柏拉圖之高次方程

那枝卡拉揚的金屬棒

也無法鑄成一把閃亮的銅匙

我找不到那把現代銅匙

回憶起昨晚小路邊的情景

痛苦地站着

我一個人，開口無語

彷彿張手臂的街牌旁

一個人並不被釘住的模糊的象徵

西單民主牆運動領袖、  
原《四五論壇》負責人徐文立獄中著作

# 我的申辯

〈續〉

編者按：本期所載「我的申辯」的二十至三十二節，是徐文立對其青年時代的憶述。憶述向我們展現了，富有冒險和獨立精神的徐文立，從走向社會，到認識社會，再到萌生憂國憂民之情懷的整個過程，是值得一讀的珍貴文獻。三十三至五十七節將連續刊出。

## 遠足

我從小就敬佩我的二哥，也羨慕他。敬佩他那「行千里路，讀萬卷書」的毅力和獨創進取精神，敬佩他公正無私、儉樸、廉潔、溫良的品格。羨慕他在中學時代就遠足廬山，後來又足迹天下。

六二年他大學畢業了，我也成人了。他是一位同學準備遠足八達嶺，他同意帶着我。我也揹上一個小背包和他們一起出發了。二哥的遠足有二個特色，一少花錢，自備乾糧，野外炊飲；二，爬山是哪兒陡在那兒上，下山是哪兒險從那兒下。這二條既啟迪我，又吸引我。一次下山，十分陡峻，我出了個主意，先將背包順山滾下，然後再一節一節地用繩子把食物和炊鍋繫下去，很得二哥賞識，我也很得意，至今不忘。記得就是那一次，腳蹬小樹根，手抓長草，往下倒爬，突然我雙腳踏空，整個身

體祇靠野草掛繫，居然牢牢的。這才知道，草多了、密了，照樣可以救命，并非「稻草不救命」，不然我就會掉在懸崖之下了。

我隨着二哥他倆順着京張公路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時分來到八達嶺長城上，我們不顧一切地跑上了南烽火台，第一次目睹那火紅耀眼的夕陽，沉入那古沙場。啊！真美，我讚美你，夕陽！「夕陽無限好」。

一連又走了二天，才走到了官廳水庫的發電站。我初次認識了人的足力和毅力的無限，對自己的人生更是充滿了自信。有了第一次，就想第二次，但又不想簡單的重複。

於是就釀成了我們五摯友的第一次遠行，那是在六三年我們即將分手，各奔東西的時候。

我任主管，擬定了路線，籌集了少得可憐的路費。那個時候整個國家也剛剛走出谷底。這一次，是我們上一次路線的反道行之。這樣

，一、我有點引路的把握，二、我想把往日的快感帶給朋友，又不重複，又有新鮮感。

我們的第一站是豐沙綫的「珠窩」，名字很美，就選定了。果然還可以，火車從左山口進，出右山口，倒是一個窩，珠不珠倒不要緊，對於久居都市的青少年，大自然一切都是美的、和諧的。躡山水，才知道再淺的水溜，也會把踏不穩的人沖倒。這就是「勢能」，有勢之能，是動力，又可能成爲破壞力。

僻居山野的人最歡迎外來的客人。人是喜歡人的，尤其獨居而又熱愛人群的人。二位孤島上的、爲單位放羊的牧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們像過節一樣高興，不斷地說：在這個窮山溝，要見到幾個人真不容易啊！其實，這兒距北京城裏不過幾十里。

夜幕將臨，我們趕到了一所小學校，聯繫借宿，這是上次的經驗，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學校證明信，幾位年輕女教師面有難色，中國自古「男女授受不親」，好在她們的老師在，他熱情地歡迎我們到他所在的中學投宿。他說：「不遠，十里路。」不管多疲乏，也得走啊！揹起行李卷，扛起糧食繼續前進。脚下是盤山鐵路路基。大山已經星星點點，那是一座礦山，燈光從坑洞中閃出。天陰了，濃雲翻滾，一層又一層的壓在頭頂。「快到了吧？」「快了！十里？至少也走了有二十里啦，山里人的路距得比城裏人的小一倍。沒逃過去，這大雨，就是六三年那場罕見的大雨的前鋒，徹底地洗禮了我們。大雨瓢潑，塑料布祇夠護着被子、糧食，人就讓他成落湯雞吧。從此刻起，我們就開始了三天的雨中遠足。

特別令人難忘的，就是在這風風雨雨中，都異口同聲：此行不虛。青少年的心是熱啊！第二天到了官廳。官廳的黨委書記先是責

怨，後是憐惜，看着濕漉漉的我們。他特意安排我們在黨委辦公室的沙發上過夜，又怕我們睡不舒服，索性打開小會議室為我們舖床。知道我們第二天一早趕路，又囑咐伙房五點就為我們生火。我事後想，這位黨委書記到任何時候，也是開明人士，且有菩薩的心腸。

第三天的行程很辛苦，風更大，雨更急。途中祇能找一個破崗樓裏躲避休息。背包放在中間，各站一角，爲了取樂，我們開了一個「香腸宴」，其實是吃半粗糧半細糧作的土「江米條」，當地產的，在此時此景別有滋味。不知與我們同時代的青少年們，可有過同樣的體味？

一路上，總是德煥當開路先鋒，他默默地沉着走在最前邊，像一面迎風勇進的旗幟，每個人都堅韌不拔地追隨着。

晚上又來到了一所小學，可能是沙窩小學。真是沙，沙已經堵塞了村中的道路，壓到農舍的後窗沿了。大豆的弱秧不過半尺，稀落的長了幾個豆夾，和東北那齊人高的大豆秧簡直沒法比。當地一年中，有半年吃不上菜，外地調進的芹菜連莖帶葉一起醃着吃。小學黑着燈，停電，年輕的男女教師很樂觀，拉着手風琴，唱着歌，在窮歡樂。是一位校工接待了我們，他很可能是一位被發配的「右派」。城裏人，對北京的一切十分感興趣，問長問短，談個不停。他挑水幫我們作飯；怕我們睡不慣土炕，特意卸下教室的門板舖在炕上；又生起盆火，爲我們除除涼氣，等那四位躺下，又和我一起把每個人的濕衣服烤乾，幾乎忙了一宿。天剛剛發白，又幫我們作早飯和路上帶着吃的飯。我望着這頭髮已經斑白的中年知識份子，心裏酸酸的，他沒有明說什麼，我也沒有明問什麼，讓明白放在肚子裏吧。是啊，「中國知

識份子中的優秀份子即使在蒙奇冤、陷絕境的情況下也不是不可信賴的。」（劉賓雁語）

凌晨，我們告別這位「校工」，趕往八達嶺。沒有羅盤和詳細地圖，稍偏預定目標，逕走到了青龍松車站。也好，該回家了。買了火車票，我這管賬的身上僅剩了一分錢。上車開飯，一鍋涼米飯，連下飯的鹹菜也光了。天無絕人之路，不是還有殿元從家裏拿來的紅絲線嗎？對了，那包在北京與河北交界的鎮上買的一包白糖呢？這包白糖，本想送給大姐作個禮物，當年紅糖是精貴物，她正要臨產。這下子祇好貢獻出來了。白米飯拌上紅糖、紅絲線，煞是好看，這對於五個又饑又冷的大小伙子無疑滿有吸引力。正當其時，著名的「京張三八包乘組」的服務員來了。我向她買開水，當時車上開水要花錢買。我買半壺，她問怎麼好幾個人，咋買半壺水？我不好意思地向她坦白，我們出來三、四天了，祇剩下了一分錢。她看着我那狼狽相，不由地笑了，她甜甜地說：就一分錢，也給你灌滿壺，還管你們夠。我也甜甜地答道：那就謝謝您了。車到沙河攔淺了，水沖壞了中途路基。這可瞎了，晚飯怎麼辦？我動員所有人搜索自己的錢夾、日記本，王東復果然發現了五毛錢，下車買了幾個包子，分了分，墊墊肚子。半夜，車抵西直門車站，外邊仍下着大雨，祇好將行李墊在水泥地上擠成一團睡一覺。不久，一個寒噤將我驚醒，這幾天我負有的責任，讓我的覺特別輕，每天不到五點鐘就能醒來。我一看不見殿元，我慌了，一路平安，別到了北京出點事。正這功夫，祇見殿元還是穿着一身濕衣服，拎着一包包走來，趕忙叫醒大家。大家一看，是一包饅頭和菜，殿元的家并不富裕，糧食也緊，可爲了伙伴，他背着我們偷偷地跑回了家，把家底全

抄來了。他對朋友真是格外心細，還交給我幾毛錢，以備天亮回六鋪炕好有坐車的錢。我們看着這「憨牛」，消瘦的臉上架着的眼鏡也都滴着水，肚子乾癟着，大家心裏都不是滋味：五顆青少年的心撞在一起了，閃着火光。回想起這次遠足，心裏總是久久不能平靜。回想起這次遠足，也使我聯想到現在的國內旅遊。儘管不提倡，但已開始形成潮流。這是大勢所趨，眷念大自然是人類的共同心理。不過，旅遊也不必都擁向那名勝之地。青年，特別是青少年更應提倡到就近的山川、大自然中去遠足。最好是靠自己的雙手，勤工儉學，去自費遠足。當然，社會要逐步創造勤工儉學的機會，和把勤工儉學的收入合理地付給青少年們。

## 下鄉

六三年因爲連日的暴雨，河北發生了罕見的大洪水。我不得不放心農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而且從我自學的角度看，也需要到農村考察一番。春節前夕，我向母親提出，想到鄉下去過春節，我們家很要好的鄰居朱大嫂也願意到我她老家看看。於是，我興緻勃勃地乘車到了河北東鹿。一下火車，視線就被二座山吸引住了，一座是麵粉袋山，一座是大白菜山。據聞，這是國家爲了災區人民過好春節，特意調運來的。我一聽心裏暖呼呼的。

到了村裏，也看不出受災的樣子。村民都興高采烈的忙於辦年貨，左鄰右舍，高聲嚷着，互借磨麵的碾子、過麵的籠和大的炊具，這可能就是中國鄉村一種特殊的「鄉誼」。我奔的是朱大嫂夫家的親戚。村裏人聽說來了個北京的洋學生，都趕來看我，奇怪我這

個城裏人，大過年的不呆在家裏，怎麼到這麼窮鄉村來了。

這家子正在院裏請人宰羊，那時還允許有自留羊。那屠夫真是一把好手，不出十分鐘，宰殺、扒皮、開膛、分解，全部完成，看得我眼花繚亂，比課本上的「庖丁解牛」生動、具體十倍。我問主人：「今年過年比往年怎樣？」他坦誠地說：「別看遭了災，哪一年也比不了今年，往年國家哪能救濟這麼多東西啊！」剛說話這一會兒功夫，主人的閨女就端來一碗熱騰騰雜麵湯，臥了二個雞蛋，上面飄着一層當年的稀罕物——香油。看着這碗麵，在心中深深地刻下了「憨厚」、「好客」四個字。待我吃完，主人問我：「這是雜麵，可中？」我滿意地告訴他：「比在家裏吃的還香，這雜麵條真好吃。」

第二天正趕上主人的本家姪子娶親，好不熱鬧。新郎騎着馬，新娘坐在驢拉的大車上，放的一頂花飾的轎子裏。新郎不足二十歲，隨爺爺長大，爺爺盼着早抱孫子，家裏也需要一個女人照顧。男孩就當了一年車把式，掙了錢娶媳婦。媳婦是朱大嫂娘家村裏的，在太行山的山脚下。一對小夫妻，真是天合地配，男的英俊，女的秀美，一雙大眼，長辮烏黑發亮，皮膚白皙，比城裏姑娘的還細膩。一方山水養一方人，很可能是山裏的礦泉水給她帶來的秀麗和靈氣。

宴席上我成了上賓，我老實告訴他們，我不會喝酒，他們倒也不硬勸我，我就舉杯示意，吃點菜。席上葷腥很少，多是豆製品，算得上豆製品「素宴」。新婚三天無大小，小輩、同輩的一個勁逗新娘子，新娘子祇笑不語也不惱，老爺爺直在外廂囑咐別過火，新娘的嬌笑自有魅力，毫不費力就解了重圍，頗有情趣。

鄉親們的和氣、友愛使得整個婚事辦得很體面、圓滿。那氣氛，與家家戶戶的門楹上「滿招損，謙受益」六個字十分諧調。

當然，那時的中國農村的貧窮也到處可見。初一，大人給孩子買塊糖，孩子捨不得一口吃掉，捏在手裏一點一點地舔。過節，孩子們能製新衣的也很少。朱家的老母雙目失明，孤寡一人，土屋土炕滿是塵土、蜘蛛，很是淒涼。鄉村的火車站也很破敗，候車室無一機椅，中間用土坯盤個爐子，土煤渣塞滿了冷腔，看來也早已不生火了。

我帶着這兩面觀，回到了北京。春節一過，休學一年的期限就快到了。再這樣自學下去，恐怕生活費都要成問題。我就開始結合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遠足、下鄉的體會，寫一份總結，這就是後來獻給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那篇一萬多字的文章——「我們的時代和青年的任務」，提出了中國有志知識青年應該走向農村，改變那裏的愚昧和落後的面貌，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等問題。這也是當時我自己的心願。我向鄙視口是心非的小人。我和王殿元聯名寫信給中共北京市委，自願申請到農村落戶，參加農業生產。可是沒有答覆，也沒有任何回音，祇好作罷。

## 閃電式的大連之行

六四年四月份，我回到學校復學，順利地取得了高中畢業文憑。我心中早已打定主意不考大學，等母親知道我這個決定時，報考大學的報名已經結束，她想挽回也挽回不了了。

我想我即將走向社會，該利用這最後一個暑假出去遊歷一下，母親同意我去大連找大哥

。爲了節省路費，我坐慢車到塘沽，準備乘船去大連，那知道塘沽到碼頭的汽車十分不方便，等我趕到海邊，班船剛離去，我祇好望船興嘆。再等下班要等一週，於是乘車北上，從瀋陽折赴大連。

我滿懷希望，找到了大哥的海校。他陪我到軍官食堂吃早飯，他的戰友們輪番地走過來看我，都顯然帶着一種看怪物的神情，弄得我好不自在。看來他們都知道我就是那個要自學馬克思主義的弟弟。真奇怪，別看我們這個國度，幾乎人人都要宣稱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倘若，果眞有人宣佈要自學它、研究它，又往往會被人看作怪人！

我們剛吃完飯，還沒走出食堂，就收到二姐一封電報：立弟速回，學校開始分配。看了電報，我一笑，告訴大哥：這不可能。學校的慣例，工作分配都在大學考試發榜之後進行，不然不知道誰沒考上，那怎麼分配，分配誰啊？分配工作至少要過一個月才可能進行。大哥顯然已經對我這個愛擅自獨立決定自己命運的人不信任了。也或許怕我誤了分配工作，今後前途受影響。也或許他早已習慣用服從代替理智。他絲毫不考慮我的分析和解釋，立即決定買第二天船票，讓我返回北京。主人下了逐客令，我也毫無辦法，總不能賴在那裏啊！

大哥白天讓我眼中留下了「秋林」公司的掠影，晚上讓我耳邊響過一陣老虎灘浪拍巖的轟鳴，二十四小時之內就讓我結束了這次盼望已久的大連之行。

這是一次「一樂即逝」。

## 參軍

回到家中，整整憋了二個月。一天，學校黨委韓書記把我找去，她突然問我：「讓你參

軍，你不去？」我毫無猶豫地回道：「當兵，怎麼不去？不過，我的眼睛有點近視，恐怕人家不要。」「你看吧，我就知道你這個人的思想有問題，剛讓你考慮考慮，你就打退堂鼓了。」這位女書記說。

天哪！想自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反倒成了思想有問題？！哦，在那個年代，不經在組織的書記們指派，而想有所作為，就是個人主義，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而且，還不許別人說實話，反映實情，一說就是打退堂鼓，不革命，面對有這樣思想方法的「馬列主義老太太」真是毫無辦法！我祇好不語。沉默一刻，她又說了：「如果真是這樣，僅僅因為眼睛，那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我看你這個人很需要到部隊好好改造、改造！」我答道：「改造也好，鍛鍊也好，當兵是我的本份，也是我的責任，我很願意到部隊去。」

別看這老太太，神通也夠廣大的，我這個左眼○·七，右眼○·四的人，居然也參上了軍。

我揹上背包，在家門口與母親告別，好像每次上學一樣離開了家，沒有任何依依不捨，甚至沒有再回頭向母親招手。少年心盛，憧憬的總是在前方，對母親也太缺乏溫情了，回想起來，實在有點負疚。

卡車經過新華門，大家都驟然激動起來，唱起歌，心裏都明白這是向北京告別，向主席告別，似乎他老人家能聽見似的。

迎着魚腥味，來到了青島滄口，海軍航空兵第二航校。

## 嚴己又嚴人的教訓

軍校的生活是極其緊張的。每天早上六點

起床，有時緊急集合，越野行軍就起得更早。一天六節課，下午、晚上四節自習，或政治學習。夏日中午有午睡，冬日中午作集體遊戲，必須參加。晚上九點半熄燈。我當時被指定為學員班長，記得是三大隊四區隊七班。當班長的時間更緊張，除了各種班務活動，碰頭會、匯報會，還要作每一個班員的思想工作，每天起床要按時，晚上睡覺是十一、二點，星期日也搭了進去，在青島學習近一年，我祇進城二趟，一次看棧橋，一次照紀念照。看那張照片，人瘦得像個猴子，體重降到一百斤。

勤奮的工作，得到了很好的評價。一次長途行軍訓練，邊走邊宣傳鼓動，總結會上得到了大隊和學校的通令嘉獎，年終以優秀的訓練、學習成績評為五好戰士。我們班榮獲了四好班集體稱號，我寫了一份「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作好班長工作的體會」，在中隊作了介紹。這份底稿可能還夾在我哪本書裏。

但，在畢業分配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給了我難忘的教訓。

即將分赴部隊的臨行前，我突然發現自己的那副近視眼鏡找不到了。我的東西一向安放得很有秩序，很少丟失，這多是母親和外婆愛整潔的影響。另外，我上小學時，有一次與同學們踢足球，玩昏了頭，將一件脫下的毛衣忘在球門架上，就回家了，等到發現再去找，已經不翼而飛了。回來本以為母親會責罵，出乎意料，她並沒有說什麼，祇淡淡地告誡我，今後要在意。媽媽的寬容反而使我內心很自責：當時爸爸已經去世，丟了毛衣，媽媽是無力再買了，祇會把自己的讓給我，自己這樣馬虎實在不應該。從這以後，我再沒有丟失過什麼稍大件的東西。

在赴部隊的途中，有一個和我分一個部隊

的戰友告訴我，是我的副班長故意把我的眼鏡，扔到地板底下去了。哦，這小伙子還記恨啊！我恍然大悟，想着這件事，心裏倒不特別責備他。

這副班長是個幹部子弟，在家裏很受寵。在學習雷鋒的活動中，他有一件事讓我很反感。他為了作好事，每天早上比大家早起半個多小時，這本來不合乎作息制度，可他每次早起時，總是故意在屋裏弄得叮叮亂響，吵得大家睡不好，讓別人好知道他去廁所，作好事去了。開始幾次，我單獨找他談了談，既肯定了，又提醒他，他不服，反而每天早晨弄得更響，我就不客氣地在班務會上，直率地批評他，作好事動機不純，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可受不了，好事也不堅持作了，還處處與我作對。事後我找他談了好幾次，直到畢業，這疙瘩也沒解開。他臨走拿我眼鏡撒氣，是不奇怪的。

這件事讓我看自己的主觀，看到了方法不當的後果。對自己要求嚴格，是對的；對別人則應該寬厚一點，批評別人不能單靠自己主觀分析，這不正是聖奶的言傳身教嗎？

## 好心不得好報？！

我被分配到上海大場基地，海軍航空兵十八團機務中隊任地勤機械員。機械員的工作是瑣碎、細密、辛苦的，而且責任重大。三個月後，我已能單獨工作。

一次飛行，一位航校剛畢業的飛行員飛最簡單的起落課目，由於飛機着陸時速度過快，飛機失控，衝出跑道，一頭扎在一個很遠的水坑裏。這不是我維護的飛機，當時我剛好在這架飛機着陸的這一頭。見到此景，我抓起身邊的小梯子，就飛快地向出事地點跑去，其他許



多戰友也都跟着跑了過去，我首先登上飛機，幫助飛行員打開座艙蓋，再帮他解開保險帶，邊問他受傷沒有，請他立即出來。這時才注意到，機頭扎在水坑裏，幸虧水沒有灌到高溫高熱的發動機，不然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在當時祇有一個念頭：救飛行員要緊。

由於工作努力、踏實、臨危不懼，又積極承擔中隊的宣傳工作，因而多次受到中隊、大隊嘉獎和表揚，年終評為五好戰士，又被同志

周峰樵作



們推選為中隊的「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成為黨支部的重點培養對象。

好景不長。「文革」開始了。與我們同駐一個基地的「八〇一」廠是四大單位。這個廠，與各地的四大單位一樣，鬥幹部、戴高帽、罰站、遊廠。這個工廠的幹部，大多數是這個基地部隊幹部的老戰友，基地幹部對這些作法十分不滿。我們中隊駐地近臨「八〇一」廠，雖說我們也看不慣那些作法，但並沒有和「八〇一」廠發生矛盾。可是基地的一些幹部却不斷到部隊裏向幹部、戰士散佈對「八〇一」廠的不滿。部隊開始與「八〇一」廠有些矛盾，他們就進一步在中隊會上說：這簡直是騎在我們脖子拉屎！並準備在「八〇一」廠找基地反映問題時，在半路上埋伏抓人。情況變得越來越緊迫。我心裏也很急，總想不能眼睜睜地看着鬧出亂子來。於是，我立即給基地最高領導李副政委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我認為在「八〇一」廠并未直接向我們部隊挑釁的情況下，有個別幹部鼓動部隊與「八〇一」廠發生衝突是不妥當的。我們部隊作為一個非四大單位介入四大，違反了中央軍委的有關「部隊要穩定」的指示。倘若發生衝突，首先會追究我們的責任；而且我們與「八〇一」廠將長期共存於一個基地上，發生了衝突，不利於今後長期團結，望首長立即予以制止。

萬萬沒想到，這赤心可灼的「諫書」，雖阻止了一場衝突，却給我在政治上闖下了第一個大禍。

這封信交上去的第二天，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找我個別談話。他絲毫不考慮，我寫這封信完全是一片赤誠，是爲了部隊的穩定着想，也是避免領導一時處理不慎釀成大錯。他關頭硬說我，也想像「八〇一」廠那樣對待部隊首長

。天哪！天底下居然有這樣不明事理的人。我堅決地予以否定，然後不想再說什麼了，認爲跟這種不講道理的人，沒什麼好多說的。這下子，可大大得罪了這位領導和他的上級。從這件事之後，我再努力工作，再積極要求進步，也都白搭了。後來又風傳我早已犧牲的父親有問題，受審查，有些人就更找到了壓抑我的借口。從此，評五好、獎勵一概沒我的份，祇是中隊念我工作確實出色，經常表揚表揚，「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是大家公推的，不好撤銷。

六七年部隊轉場海南島值班作戰，第一批也沒有我，我就不得已，用「絕食」來表示自己要求上前綫、保衛祖國的決心，才作爲第二批到了海南島作戰值班。

不論是在上海大場的訓練，還是在海南島的輪戰，以至東海岱山的值班，我維護的飛機飛行過近千次起落，沒有任何一點小的差錯。在服役的後二年，我經常代替休假的機械師，單獨負責機組工作。臨復員，中隊路指導員懇切地對我說：「小徐，你在部隊這幾年的表現，大家都看在眼裏，心裏都有數，所以給你的鑑定、評價是全中隊最高的。你的組織問題沒解決，這原因，我不說你也清楚，同志們也清楚。你的表現，我們一定負責向地方介紹，希望你不要灰心，回到地方繼續努力。」

指導員的話，都這麼說了，叫我能再說什麼呢？我祇有感動。當然，我也有沉思：好心真不得好報！

在看守所，有人對我說：修橋鋪路雙瞎眼，殺人放火兒女多。人世間的事，就是這麼回事。

真的嗎？真該如此嗎？我至今不信。我仍然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 最高的評語

我是個創傷易於彌合的人，幾句動情話就能讓我心軟，將怨憤遺忘。以致在「愛犯上」這一點上屢犯屢受挫，幾乎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這是後話。

其實，那次「進諫」受挫，給我心靈上造成的創傷，早在路指導員談話之前就已經彌合

。那個時候，雖然我的名字在上級機關掛了號，但基層支部對我是有數的，同志們對我也是有數的，所以中隊領導對我的各方面工作，依然放心重用，同志們仍讓我作「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的工作，這樣反而促使我更竭盡全力地為大家服務，因而也更贏得大家的信任。在戰友們的懷抱中，我深感人心是公正的，是溫暖的。

六八年一次團幹部到我們中隊聽取意見，我和戰友，也是北京兵王海明（六九年一度在部隊的階級鬥爭運動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後徹底平反。）直率地發表了意見：「現在駐地的老鄉都反映我們不像是能打仗的兵，倒有點像會議兵。每天茶杯一端，板櫈一拿，蔭涼地一坐，就是半天一天的。現在老不搞訓練，將來飛行員怎麼能駕機騰空啊？」團長聽了連連點頭，正趕上這時中央軍委可能發佈了應該適當加強部隊訓練的指示，我們的意見很得領導重視。在領導的提議下，同志們又一致推選我作為戰士代表列席團黨委擴大會議，着重反映戰士們的願望和要求，使得我更不把那創傷放在心上。

六九年大批戰士復員，我也已超期一年了，上級批准我復員。雖說對於復員，老兵們都高興，該回家了。可是見到中隊的一木一物，

朝夕共處的戰友們又不由得戀戀不捨，我離家參軍時都沒有這種感受。

臨別前，戰友們送了許多紀念品，那位「老廣」威軍械師特意送我一個特大號的茶杯，并深情地說：「小徐，將來回去當了工人，哪有多麼多時間打水，這一缸子，夠你喝一天的。」可不，這大缸子能盛半暖瓶水！想得真周到！

我是在舟山群島的岱山島離開部隊的。這天，黃昏時分，全團戰友一直把幾百名老兵送到碼頭。船慢慢地離岸了，招手、呼喚、熱淚，混成了一片。突然間歡送的人群中爆出了同一個聲音：徐文立、徐文立、徐文立……

我楞了，這不是齊聲呼喚我的名字嗎？為什麼？一聲一聲又一聲，連接不斷。我的雙眼模糊了。哦，這是對我往昔的呼喚？這是對我的未來的激勵？不，這不是對我一個人的呼喚和激勵，那麼多名字，怎麼呼得清？我不是當過他們的代表嗎？那就再代表一次，讓我們每一個老兵都記住自己的戰友們，讓我們每一個老兵都來領受戰友們的祝福。

船離岸越來越遠，呼喚聲仍然隱約可聞；島上的人群已看不清了，島上閃起星星點點的燈火。船邊的海水波濤洶湧，我的心甜甜地蕩漾，腦子裏沒有一絲浪花……

啊！親愛的戰友們！你們，你們對我的呼喚，不就是最高的評語嗎？人世間，難道還有任何獎賞和評價，比戰友的理解和信任更可貴的嗎？

## 知遇

結束了五年的軍人生涯回到北京，開始進入了對於我是陌生的社會生活。

學生兵最傻，一點不錯。絕大多數戰友不懂得走門子、巴結人，當絕大多數人被分配到僻遠的昌平、豐台的時候，唯有一個，天天一早一晚到武裝部掃地的「機靈人」留在了城裏，分到低壓電器廠。這就是我回到社會上接受的第一課。

我被分在豐台鐵路工廠當鍛工，從偷大錘開始學徒。幹了五年技術兵種，掄大錘，體力確實有點頂不住，可我没示弱，錘掄得滿溜，師傅們很喜歡我這一點。據說，我進了監獄，還有師傅遠從豐台跑到我家問長問短，表達了對我的關心。

現在有人說，我是因為對工作分配不滿，滋長了個人主義，走上了犯罪道路的。真不知道，「左」王們這些人，硬要把正直清白的人，往這犯罪根源唯一模式裏死套的作法，何時才能徹底絕迹！如果說我有「不滿」，那我的「不滿」是：既然國家這麼缺乏技術人員，我們這些技術兵不正是在現成的人才，為何不用？由於這種浪費，受損失的是誰？是國家，是老百姓。難道有這種「不滿」不應該嗎？這難道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嗎？這就是個人主義？如果我真的從這兒開始走上犯罪道路的，那又怎麼解釋我當時每天幹勁十足地打鐵學藝呢？又怎麼解釋老師傅們對我工作的滿意呢？又怎麼解釋我日夜以繼日地協助黨支部書記趙斌對工廠的整頓呢？……

這種「不滿」完全是一種有高度主人翁責任感式的「不滿」，恐怕是那些充滿着「左」傾僵化思想，祇知整人往上爬的人永遠理解不了的！他們祇會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也不想去瞭解一個人的全部歷史，把一個清白正直的人投進監獄，他們毫不痛惜！

六九年底，國家開始抓國民經濟的恢復工

作，上級派了趙斌任工廠黨支部書記，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瞭解，選中了我任他的助手，着手對工務、電務、建築三個工廠進行整頓。他是一位知人善任的有經驗的基層領導者。他工作潑辣，善於聯繫群眾。在他的領導下，三個工廠不到三個月，生產都開始走上了正軌。他對我十分信任，放手讓我工作。所以說，他是我遇上的第一個真正瞭解我的志向和能力的領導，對待這樣的知遇，我也是不遺餘力，坦誠相待。

上有千條綫，下有一根針。各項工作都要在基層落實，尤其在那不平靜的年代，工作異常繁雜，中心工作一個接着一個，文字材料要得又多又急。我那時的工作每天總是十幾個小時，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有時忙得我祇好連軸轉，二、三天不得必要休息。人瘦了，戀愛也耽誤了，所以我快三十歲才結婚。儘管工作緊張、辛苦，心裏也從來沒有怨言，中國古來就是「士為知己者死」，我總是把老趙要的材料、準備進行的工作，帮他安排得十分妥貼。老趙對於我的工作是十分滿意的，在他的推薦下，黨支部幾次開會討論我的入黨問題，可是因為當時支部一共才五個黨員，其中有三個黨員在整頓中因經濟上不清白的問題受了批評和處分，他們就拿我出氣，借口我父親的歷史問題，二個人反對，一個人故意不表態，所以幾次也不得通過，老趙也毫無辦法，上級黨委在有「爭議」的情況下，也祇得同意再考驗、考驗，我的入黨問題就這樣再度擱淺。

## 我的「左」

在那「左」傾滿天飛的日子裏，我也曾是很「左」的哩！也「左」得很「天真」、很「



圖為大陸文革期間批判「論語」的宣傳畫。

可愛」！有四件事令我永遠不能忘懷。我當老趙的助手的時候，同時也負責着工廠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我接手的時候，運動已近尾聲，「揪」聲仍不絕於耳。電務工廠有位女工，小時在日本人辦的「扶輪小學」上過

學，後在電務段當電話員，與其他女電話員結為「十姐妹」。那些「十姐妹」紛紛被揪為「特務」，寫來揭發材料，領導上決定也定她為「特務」，我也不細緻分析研究，積極參加「揪批」。這位四十多歲的無辜者經此次打擊，人顯然地衰老了。事隔不久，她已被放出「學習班」，我在上醫院時看見她，那原是青絲的頭髮已見斑白，內心很是不安，心想，這裏面也有我一份「功勞」啊！

雖然在「文革」中，我就錯辦了這麼一件事子，可這「左」勁可由來已久了。記得在高二時，一天傍晚，我看見一個農村老婦躲在電綫桿的後面出售雞蛋，我當時非但沒有憐憫之心，反而回家寫了一篇短文，竭力描寫她鬼鬼祟祟，認為她是破壞國家的統購統銷，經不起暫時困難的考驗。這篇短文雖然是自己隨手寫寫，也不想發表，但却反映我不諳民情，一點不關切農民的疾苦，豈不知當年的農民就是靠「雞屁股銀行」換點鹽油啊！後來在鄉下，看到農家的孩子捏着糖菓舔的情景，我不由地責備自己那篇短文。

有了「左」，不但害己，更會害人。在部隊開展階級鬥爭教育的時候，我突然想起，我的高中班主任申學敬老師曾寫給我的二首詩，這詩很明顯地流露了，申老師對當時社會氣氛的一些不滿情緒。實際上，這情緒當時決不止他一個知識份子有，是相當多的知識份子從五七年「引蛇出洞」，擴大反右之後都有的普遍情緒。這并非是對社會主義的不滿，而祇是對「左」傾路綫的「言而無信」的不滿。可是在「左」的指導下，我反而覺這詩有問題，應該揭發，險些鑄成大錯。後來可能是另一種感情佔了上風。申老師曾那樣器重我，把我視為他的得意門生和知己，才會把這樣的抒懷詩抄給

我這個毛孩子，我怎能做出對不起老師的事情？後來我雖沒有進行什麼揭發，沒有害老師，可是這一閃念就夠可怕的！真是人心可畏！我怎麼祇有所謂的「忠心」，就沒有良心了？！這個「左」，竟讓我傻呆到這種地步！

現在，可能有多人已經都知道，是我主辦的「四五論壇」首先為年輕的思想家週羅克平的反，為他出了專刊，還特地請了民間木刻家為他刻了一幅意境深遠的畫像作扉頁。這在「四五論壇」可謂最高格調。可是，大家一定都不知道，也正是我，曾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中，向「文匯報」投過一篇小文，批評週羅克的一篇小文。當時，我的小文已付排，突然因為有人指示，這不是一場學術爭論，是政治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我的小文就沒有見報，現在想起來真是萬幸，多虧他們嫌我不夠「左」！

那篇小文，我已不大記得是什麼內容了，可能是有關帝王將相的評價問題。至於在這個問題上，我和羅克誰是誰非已經不是什麼主要的問題了，問題是我曾與羅克進行過不開的論爭。然而他却犧牲了，死得又那麼悲慘。一個難得的天才竟是那樣被人早早地扼殺了！當我們還泡在「左」的苦海之中的時候，他却孤身向這海洋挑戰。所以，即使在我們論爭過的這一個觀點上，我是對的，我也比不上他的一個小指頭。啊！我幾乎墮落到了他的敵手的地步！真可怕！我正是懷着這種羞愧的自責心理，才下決心不管官方給他平反，「四五論壇」一定要大大地宣揚他，為他出特刊，出專刊，要為他鳴不平，要大大地頌揚他——這位早死的勇士、智者。遲早人民會把他祭奠在中國的先賢祠中，我相信。

一九八一年清明節，當我預感到厄運可能

就要降臨到我的頭上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週羅克的不屈不撓，我特意精製了一個小小的題詞牌，敬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他的一幅畫像前，以示我決心永遠懷念、學習他的志願。

我真正從這神聖的「左」的迷霧中脫胎出來，那是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後了。

## 返樸

當我頭腦開始清醒的時候，我正在單位負責清查「五一六」的工作。

七一年底，鐵路撤消站區，恢復原建制。老趙調永定門分局工程隊。工程隊也要調我去，可重新組建的豐台工務段不肯放，讓我負責工務段清查「五一六」辦公室的工作。我開始從各站區將豐台工務系統有關「五一六」的問題接過來，組成了辦公室。

我接豐台西站一個學習班時，有一個姓吳的學習班的情況真是讓我大吃一驚。這姓吳的本是一個極健壯的養路工，被關在一個前堵門、後堵窗的朝北的小屋裏，夏天也不准開窗子，也不放風，祇是一早一晚出來倒兩次小便桶，三層草墊都濕了，這大漢已直不起腰了，走路十分吃力。我見此景，便對學習班的負責人說，這間屋另有它用，把他換到朝南的屋去，窗戶不要堵死，你們放心，他不會跑。他果然沒有跑。我又到他家去看了看，老婆帶着幾個孩子極困難，糧食不夠吃，我給了她一些糧票。好在不久學習班就解散了。

當工作剛剛有了頭緒的時候，段上派一個叫李向東的黨員來作正手，我當副手。這位正手對我的工作十分放手，讓我繼續負責辦公室的的全盤工作，包括到分局開會、匯報，具體工

作他肯插手，祇是向段革委會，即軍管會的主任匯報工作由他負責。後來，我才慢慢體味出這位年紀雖不大的正手，却心機老深，精於昇官之道，他是吃透了「縣官不如現管」這條實用主義原則的。

隨着我對清查「五一六」的瞭解和研究，越發感到這簡直是一場製造大錯案、大假案的運動。在分局召開的「邱綫分析會」上，我忍不住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我說，我認為，「五一六」這個組織在我們分局存在不存在值得懷疑。我們查出了這麼多「五一六」份子，他們都「承認」（實際上全是誘、逼出來的）參加了「五一六」組織，并填了表，全局交待出來的「五一六」表格起碼也有幾百種，却沒有一個一樣的。既然那麼多的人參加填表，為什麼直到今天也沒有查出一份原始表格呢？又說當時「五一六」不是以反革命面目出現的，那怎麼會把那麼多的表格統統地銷毀得一乾二淨呢？這值得我們深思。現在又有那麼多的人供出，寫過攻擊周總理的大字報、標語、傳單，而且毫無例外地又都是在深夜作案，一到早晨又都被撕掉或覆蓋（實際上都是審訊人員提供的串供內容讓所謂的「五一六」認供）。大家都知道周總理是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如果真有那麼多攻擊他的標語、傳單，而且又是有意識地撕掉或覆蓋的，當時不會不保存原始證據或照片，可是現在却沒有。我當時雖不在北京，但據我所知，在整個運動中，在北京僅出現過二張有關周總理的大字報，一張貼在「二外」，一張在王府井，當即被撕下，并留有證據。所以我認為對清查「五一六」的問題應該更加重證據，而防止人為串供的事情發生。

本來這是一個再次掀起運動高潮的分析會

，我發了這麼一通「標新立異」的看法，頓時炸了窩，與會的四、五十人，包括分局清查領導班子的軍管幹部，大多是五十開外的人，四十歲的寥寥無幾，我這個當時三十多歲的人，簡直算小青年、黃口小子，竟然敢出此不同尋常的意見，實在夠「狂妄」。我的發言，引起了多數人的不滿，幾乎所有的與會者，都是瞪着眼睛看着我說話講完的。我話一落音立刻遭來激烈的反對和批評。祇有幾個人在聽我說話的時候暗自點頭。多數人還交頭接耳在詢問：這個人是哪個段的？過去怎麼沒見過？幹什麼的？

發表這麼一番看法，我一方面是希望分局軍管能冷靜地重新考慮這場清查運動，另一方面是覺得以上我所列舉的事實都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爲什麼都緘口不語，或視而不見，還一個勁地掀高潮，這不是誣誣誤功嗎？自己糊弄自己嗎？寧可因爲發言被貶斥，也不能再這樣對黨的工作不負責任了，我也就無顧忌地放了一通。沒想到，這次倒沒招來什麼禍。相反，事隔不久，中央指示基層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整個停止，我一聽真是高興死了，我可受不了這份洋罪，昧着良知整人。

根據上級政策精神，我擬定了結束我段清查「五一六」工作的方案：第一、解散全部學習班，誠懇地向被搞錯的人陪禮道歉，做好思想工作，妥善安排他們的工作；不論其家屬子女受株連與否，一律到其所在單位做好解釋工作，消除影響。第二、祇對二個人作結論，給予行政警告處分。一是宋福林，因有一般性的打、砸、搶行爲。二是王玉書，由於他在運動中想邀功受獎，主動地暗自串通楊村工區一個姓薛的，提供參加「五一六」的偽證。事後姓薛的以爲自己當了反革命份子沒有出路，自殺

身亡了。王玉書對薛的自殺雖不負有直接責任，但他是間接責任的。對於這樣不老實想取巧的人，應該使其接受點應得的教訓，我特別堅持應給予他行政警告處分。

這個方案經辦公室研究通過，按規定一式二份，報段革委會、軍管會和分局清查辦公室審批。分局清查辦公室完全同意這個方案，而段軍管主任則不同意，於是李向東就把我推上了第一綫，第一次讓我直接向張主任匯報。張問我：「照這樣處理，那不證明我們搞錯了嗎？」因爲按照他的習慣，任何時候任何事都不能讓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錯了，以爲這樣就會損害黨的威信。可我卻傻呆呆地向這種人解釋：搞錯了就糾正，并公開承認，這樣決不會損害黨的威信，相反會贏得人民的信任。他根本不聽這一套，我祇好說這是上級政策規定的，請他和分局辦公室再交換意見。

沒過幾天，李向東被調到段上任團委書記，由我留守，處理辦公室善後工作。二個月後，張主任把我找去，他說：「你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你還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不過，你這個同志很驕傲啊，今後還需要好好在勞動中改造、改造自己。你明天開始就回班組參加工作。」就這樣，我回到了工廠。回班組早在我意料之中，就是「驕傲」這頂帽子給我戴得心裏很不舒服。當時我剛三十出頭，可我這頂帽子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已經戴了長達十幾年之久了。上學的時候，在課堂上不知怎麼就想出了一些老師也難以解答的問題，又喜歡問，被個別老師戴過這頂帽子；到部隊，在工作上願意發表點獨立見解，被個別幹部也戴過這頂帽子。沒想到今天又頂着這個帽子離開了機關。不過，現在想起來這倒是件大好事，沒有這頂帽子，我恐怕還很難這麼快回到這堅實的

大地上，也很難那麼快地讓自己一雙眼睜得更大，把問題看得更清楚……。

## 夏

回到班組，我逐漸發現工人們都愛說這麼二句話。

「咱們是磨坊的磨，聽驢的。」這是在工作中，本應提一點合理化建議時，人們常說的。

「走，給人家幹活去！」這是在「抽袋煙」的名義下歇了半個小時，甚至二、三小時之後，人們愛說的。

工作中，有沒有不計報酬、不計時間地拼命幹活的人呢？有，是少數，多數人不這樣，多數愛說上面二句話，有的不說，也是按上面二句話行事的，這說明當時多數工人，雖然在政治上取得了主人翁的地位，但他們並沒有在經濟上作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并不把自己當成主人。可是，有些人偏偏想要用少數人，甚至極少數人能達到的標準來要求大多數人；或者誰也達不到，他們也自己欺騙自己；或者根本不知道這樣一些最普遍最常見的社會現象。

七三年，老趙在分局建築段任工會主席，他幫助我調回城裏，在建築段大修隊隨一位六級老師傅學電工，本應二、三年掌握的技術，我半年內就掌握了，正式定爲電工，一年後調城內電力工區。

在這一段時間裏，我發現許多電工在搖綫時，從不認真估算，多掐了二、三甚至十多米就隨手一扔；釘子掉在地上，從不彎腰去撿，據說腰是自己的，釘子是公家的。看來，他們也同樣不把自己當成主人。

在城內工區，一度我領着幾個人幹活，遠

遠沒有達到拼命幹的地步，却能輕易地作到省工省料。每到住戶幹活，還盡量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如，人口多的家庭主婦，希望燈頭綫長一點，可供三用：「吃飯用、孩子作功課用、主婦作縫紉機活時用」。又如，愛整潔的人家，不希望電錶裝在室內或廚房，願意裝在走廊或不得眼的地方。又如，有嬰兒的家庭，希望一間屋能裝二盞燈，晚上孩子起夜開小燈。我這樣作，工長兼黨支部書記杜萬峰並不滿意。另一位領着幹活的楊金山，技術上很全面，做工考究，幹活麻利，就是每項工作必超工超料，上班時間領着人逛公園、上商店、打撲克牌，却很得杜工長器重。慢慢的，我就明白了，祇有超工超料，亂填施工報表，杜工長才有

大陸文革期間的宣傳畫。

生產促革命抓

誓師

上圖工人美術組  
集錦創作



可能在亂中謀私利、拉關係。都一清二楚了，他挪用的工、料從哪兒出啊？

時間不長我就成了杜工長的眼中釘。一次，楊金山因為和一個女徒弟的某種關係，動手打他的另一個男徒弟，我在會上批評了楊。事後，我便被攆出了城內工區，調到東便門電力工區。我調走之後，工友告訴我，城內管區的許多住戶問：「你們那個瘦瘦的徐師傅怎麼不見來啊？」「調走啦！」「哦？調走了勒！」「現在，又可能有東便門管區的住戶要問：「你們那個瘦瘦的徐師傅怎麼老不見哪？」「叫人把他當反革命，關到監獄去囉！」「什麼？他是反革命?!」

不知觀者做何感想。

調到東便門工區，才發現那位兼支部書記的買工長雖說比杜工長年輕多了，可在謀私利、不幹活方面却比杜工長更隱蔽、更滑頭。面對着這一些細微的、大量的、司空見慣的現象，我能不憂嗎？

## 憂

一次到密雲車站施工，活完得早，下午我去爬山，下山見一些社員在棒子地裏，歲數大的在抽煙，婦女在聊天，年輕的打撲克牌。我觀察了他們一個多小時，我與他們混熟了，他們見我一個普通工人，倒也跟我說實話。

「你們幹嘛老呆着不幹呢？」

「幹？一個工值才八分錢，幹一天活不夠買包煙。勁都使在這兒，自留地誰給幹？」

「那幹嘛在這兒耗着呢？」

「人家沒打鐘，咱敢回去？」

嚴格地說，這不叫「大呼隆」，而應叫「大糊弄」，在當時農村普遍又普遍。

我又憂。

## 憂

當年更值得人們憂慮的是政治狀況。

在部隊上對外界較疏隔，當老趙助手，陪在大大小小各種運動之中，聽到的祇是這項運動必要，那項工作必要，脫離了活生生的現實，思想是混沌的。但偶然遇到一件事，讓我有所清醒。

那時有個「九大」代表叫安玉榮的，是北京粉末冶金廠工人，靠憶苦思甜當了黨代表。我先後聽過她三次憶苦報告的錄音。第一次，她說她爸爸臨死前想吃一個糖葫蘆，而不可得

。這倒可能是真的。第二次她說，她爸臨死前，想吃一口淨麵的窩窩頭，而不可得。第三次，她又說，她爸爸臨死前，想喝一碗粥，而不可得。這一次一個樣的憶苦，真叫人不敢相信，可她偏偏當上了「九大」代表，莫非「九大」代表……

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是與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手攬手，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上露面。這一次，開始明顯地看到他有點老態龍鐘了。可報紙依然說他「神采奕奕」。我不由地想到這位老人對外界的真實情況都瞭解嗎？這裏暫不談我當時觀察和瞭解的黨內的重鬥爭，什麼「海霞」、「創業」、「慶豐輪」、「譚甫仁之死」……，祇先看一看一些機關和個別幹部的作為。

我所在的建築段是個不過七、八百人的單位，段上的脫產幹部有五、六十人，加上每個工區不應脫產而實際上脫產的二至三人，實際上的非生產人員近百人，據說比「文革」前多一倍還多。可是機關還是常嚷嚷「人不夠用」，寫個屁大點的材料，也要各工區派人送上去。會常去段上的女工魏秀英說：「不上段上去，還好一點。到段上一看，那勁兒全洩沒了。人家聊天的聊天、打毛衣的打毛衣、看報的看報、逛商店的逛商店，成天叫咱們『大幹快上』，也虧得他們說得出口！」

今年（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報導的那位北京市原機械局黨組書記鄧文林，我就曾有幸和他直接交過鋒。我是反對「爛鼓任人捶」的，現在提到他，祇是以這位知名人士為例，易於說明問題。

這位兼書記的鄧局長，原是鐵路分局的高層幹部，所以仍住在靈境胡同鐵路宿舍裏，和城裏水暖工區的工人周雲鶴是鄰居。七六年地

震，他家的西牆山，即周家的東牆山震裂，建築段派人拆修。等砌牆時，鄧家一男一女二個青年人出面刁難，聲稱新砌的牆靠他家那一側沒有了壁櫃，那不行，不讓繼續往上砌。原老牆一米多厚，曾有一個堵死的門洞可當壁櫃。現砌牆，不足四十公分怎留壁櫃？不留壁櫃，鄧家就不幹，在鄧的慫恿、支持下，這二個孩子就你白天砌，他晚上扒。周家四、五口人住一間房不能老露着天睡覺啊，鄧家無所謂，他們也四、五個人，住着四、五間房子，怕什麼。最後，建築段惹不起這位老首長（可能是個「三八」幹部）和他在分局的老同事，妥協了，鄧家方罷甘休。但事情並沒有結束。

七七年初，周家經申請批准，在房前蓋一間小屋給孩子住。這小屋絲毫不妨礙鄧家的事，鄧的女兒却出面干涉，說周家蓋小屋影響了他家從西邊來的光綫，并稱小院朝東開門，側向着她家窗戶（足有四、五米遠），她受不了。一天下午，她揚言要糾集人制止蓋房和砸爛蓋房用的石棉瓦。老周慌了，趕忙打電話請支部去人調停，當時尚未下班，杜萬峰正準備到前門俱樂部看一個內部電影，另外他又怕得罪姓鄧的和他的老同事，他靈機一動對我說：「小徐你不是不去看電影嗎？那你替我上老周那兒去看看。」我就從命前往。

剛到老周家，鄧文林就坐小車趕回來給他女兒撐腰來了。祇聽到鄧文林大聲說：「老周哪！你是怎麼搞的啊？你要在這兒蓋房子不大合適吧？嗯！」他反背手站在周家門前。

老周一聽他的聲音，渾身直篩糠。我對老周說：「別怕他，我去對付他。」

我也雙手一背剪，衝着他便說：

「您就是鄧局長，我是段上（讓他不敢太小視我）派來調解你們糾紛的（一下子把他拉

下馬，讓他和老周處於平等地位，先打掉他以官壓人的威風）。老周是個工人，您是局長，別說這房子蓋在柱子中心綫以西，絲毫不碍您家的採光，就是往東佔一點，您作為局長的，也不能不讓着他作工人的啊！再說老周孩子大了，擠在一間，多有不便，您也是知道的啊，您說呢？」

他白了我一眼，無可奈何地說：「你，你倒挺會說話的！」再也不說什麼了，背着個手，叫女兒隨他回去。

這就是鄧文林在左鄰右舍中的真面目，所以他在機械局那樣霸道也就毫不奇怪了，他在黨風逐漸端正的今天受到應有的處罰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這種人在當年往往有一張王牌：對毛主席有樸素的階級感情。那就讓我們再來看看這類人的樸素的階級感情吧。

七六年九月，鄧文林借口他家西牆震裂，房屋要大修，實際上西牆早已由建築段修好，他家還搗了不少亂。他家這次大修并非修也，而是調來機械局工程隊（為什麼許多幹部捨不得這個「小而全」的落後的經濟結構的癥結便在這裏），大改重建，完全按現代化設施改裝，他這一整排中式平房。在他作這種勾當的時候，他們局不知正有多少職工的危房破屋待修，而無人修理！他心中有鬼，怕夜長夢多，就讓工人加班趕修，到深夜再擺酒宴專門招待二個領工，以示關懷，好讓他們更努力監工、督工，更符合他的要求裝修。九月九日主席逝世，鄧文林怕今後會有變故，不許工人停工參加聽廣播和悼念活動，反而加班加點，日夜兼程。這就是這位鄧局長這類人的「樸素的階級感情」！

對這些，我是又鄙視，又氣憤，又憂慮。■

（未完待續）

疑雲密佈：什麼是馬列主義？社會主義？

## 建黨以來思想最混亂的黨代會

### ——九月黨代會拾零

(北京)董旭生

編者按：這是一篇遲到的稿件，由於轉送原因，稿件在寫就後一個多月才收到。但本刊仍決定發表，因其資料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九月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全國特別代表大會宣告落幕。我走訪了二名與會的代表（一名軍人，一名機關幹部），獲得了連我聽了都驚訝的消息。這二位代表總的感覺是，黨代會思想比較混亂，根本沒有做到統一思想，有些問題越討論越糊塗。一位參加過四屆黨代會的老代表說：「這次黨代會，是建黨以來思想最混亂的一次黨代會。」這大概是比較符合實際的評語。

### 什麼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在分組討論會上，一位老代表半裝糊塗地問：「這兩三年的改革把我的思想都搞亂了，

到底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馬列主義？為什麼入黨幾十年以來一貫接受的教育，和現在的說法不一樣？」這個小組爭論了半天，也沒有統一的答案。本來，多數老共產黨員根本就沒讀過馬列原著，他們稀里糊塗地接受的所謂「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概念，是毛澤東等人灌輸的。他們一直養成了一個習慣：「聽黨的領袖的，絕對沒有錯。」

可是，去了毛澤東，換了鄧小平，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解釋完全走了樣。毛澤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抓革命、促生產」；鄧小平則是「包產到戶」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怎麼不把老頭兒們弄糊塗呢？

疑問反映到高層。胡耀邦又來了個語驚四座，他說：「什麼叫搞馬列主義？什麼叫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把經濟搞上去。」周恩來夫人

鄧穎超說得更通俗易懂：「社會主義嘛，就是人人有飯吃，人人過好日子。」真是實實在在的話！

一位從某部機關選出的黨代表聽了胡耀邦和鄧穎超的解釋，私下議論說：「如果說，『把經濟搞上去，人人有飯吃』也稱之為馬列主義，那中國搞馬列主義搞得最好的地方應該在香港。」

### 階級鬥爭還搞不搞？

一位即將退休的將軍聽到鄧穎超說「社會主義就是人人過好日子」之後，不解地喃喃道：「什麼叫『人人』？包不包括階級敵人？難道也要讓階級敵人過好日子？共產黨、馬列主義不是搞階級鬥爭的嗎？」這班老軍人們，階級覺悟的確高，政治嗅覺的確強，他們一下子就嗅到了「修正主義」的味道，這是毛澤東思想長期薰陶的豐碩結果！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胡喬木上竄下跳，他走訪了好幾個組，到處講「要堅持學習馬列主義，不要忘了自己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共產黨不能扔掉階級鬥爭，不能扔掉無產階級專政。」

胡喬木的鮮明立場，給很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估計，胡喬木一有機會，還會掀起階級鬥爭的新風浪。

### 善於調解的鄧大姐

鄧穎超有鄧大姐的尊稱，她平易近人，善於充當調解的角色，比她年齡小的人，特別是男同志，幾十年來一直尊稱她為「鄧大姐」。



這次黨代會上，鄧大姐居然當起鄧小平和陳雲的「大姐」來了，她充當了他倆——對年過八旬的老頭子的調解人。

在一次高層碰頭會上，陳雲與鄧小平當着衆人面起了衝突。當談到黨風時，陳雲不點名地指責老鄧說，黨內風氣這麼壞，都是由於放的過了頭。老鄧也不示弱，不點名地批評陳雲說，黨風不好主要是紀委工作不得力。說者有意，聽者有心，大家心裏都明白。鄧大姐看空氣緊張，就打圓場，說黨中央的兩個委員會——中顧委和中紀委這兩年工作成績都不錯，大家還是多看成績，團結一致向前看。

### 代表們不再盲從

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代表們群情激憤，一片打倒之聲。「九大」打倒劉少奇，「十大」打倒「林彪」，「十一大」打倒「四人幫」，「十二大」清算華國鋒，這次黨代會，代表們冷靜了，不那麼盲從了。代表們眼着鄧小平和陳雲的分歧，都不輕易表態。他們不再輕易地支持一方。在代表們心中，已沒有什麼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概念。不是嗎？過去幾十年以來，昨天大批判的東西，今天突然成了真理。明天又怎麼樣？等等再表態吧！況且，陳雲和鄧小平誰先去見馬克思，還是一個未知數。

### 別批三種人啦

「三種人」是鄧小平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份子。整黨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清除這「三種人」。

在以前，黨的領袖提出的指令，在黨代會上，代表們祇有歌頌讚揚的份兒，不可能提出質疑和批評。這次黨的特別代表大會，情況大不一樣。幾位高幹代表公開提出來「清除三種人」的提法不妥。他們指出，文革中，造反、結派，都是追隨黨的錯誤路線的結果。錯誤都應該由黨承擔，那些被當槍使的年輕人，不要總是整他們了，他們是無辜的。有的代表指出，這些高級幹部代表之所以這麼爲「三種人」辯護，可能與他們子女屬於「三種人」有關。文革早期，造反造得最厲害的人，打砸搶最起勁的人，莫過於高幹子弟組成的「聯動」了。可是，這些無知的中學「紅衛兵」小將，怎麼知道自己後來也逃不出挨整的命運呢？

### 思想再也統一不起來了

鄧小平不愧爲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面對各種議論，一般都能沉得住氣。他的主要工作，是安排第三梯隊的接班，根本顧不上去統一思想，也無力去統一思想。

代表們議論說，本屆黨代會是歷屆黨代會思想最混亂的一次，思想最不統一的一次。文革之後，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開始走向崩潰。這是一個好的現象，是中國社會意識形態步向多元的開始。不用說，問問今日大陸青年，就是問問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有幾個還真心實意地相信「馬列主義 是真理」、「祇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黨的高級幹部、包括政治局委員在內，有幾個不願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國外？

一九八五年九月份黨的特別代表大會，將以思想第一次出現大規模混亂的「特別」之處，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

### 霧

霧像白色的黃昏  
游蕩在太陽近視的地方  
擠進樹林  
擦過玻璃窗  
又朝着大街小巷  
拼命打着哈欠  
它肯定剛掉進過河裏  
要不，每一陣微風吹過  
總抹掉一些含濕的脚印

### 風夜

起風的時候，正是夜晚  
路燈發出響亮但聽不見的聲音  
寒冷空曠的街道  
行人像落葉掠過一棵棵樹桿：飄  
飄，飄  
我不願，不願  
也無重心地隨風擺動  
比影子還輕  
走向溫暖之家  
裹緊着衣裳，我抵禦陣陣襲來的寂寞  
黎明，明快的陽光如我醒來  
玫瑰色雲霧像掛在唇邊的笑  
那個夢終於消失了  
消失，清晰而遙遠  
那片深沉的愛鬱啊  
那片幽藍的海潮扣人心弦的撕殺

(中國大陸詩人) 嵐之凝

為適應經濟上對外開放和體制改革的需要，幾年來在教育領域，也實行了一系列開放和改革的政策，其中向西方先進國家大量派遣留學生，以學習國外的尖端科技和管理經驗，就是教育改革和開放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國國務院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頒發的「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中，放寬了申請自費留學的政策，指出凡通過合法手續取得外匯資助或外

匯，還打算在今後縮減公費留學生的派遣名額，逐步轉向以派遣自費留學生為主。並且宣稱：「自費出國留學是培養人才的一條渠道，也是貫徹對外開放政策，引進國外智力的一個途徑。各級政府和基層單位應支持和關心自費出國留學人員。」

可是，實行對外開放和改革的好景不長，就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和阻力。有些人乘對外開放、體制改革之機，以權謀私，大發改革財。

國內快訊 ● 時評

## 支持當前的留學政策

### 反對李鵬向蘇靠攏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潘宗純

國獎學金，辦好入學許可證者，不受學歷、年齡和工作年限之限制，均可申請自費到外國留學；在校學生可直接在學校或單位申請自費留學，出國後保留學籍一年；自費留學人員的審批工作，公安部門審核時間最長不超過三個月；等等。根據有關資料，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四年止，中共已先後向世界五十多個國家陸續派出三萬三千多名留學生，其中公費生二萬六千餘人，自費生七千餘人。中共為節省外

尤其是黨內保守派的極力反對，迫使改革派不得不採取退却策略，對外開放出現收縮趨勢。例如，最近中共凍結地方和企業的外匯使用自主權，放慢與外商簽訂投資合同；在過去提出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中，現在祇提以上海、天津、大連、廣州四市為重點地區，其他城市的建設步伐就滯緩下來；等等。

在教育領域也一樣，當實行對外開放和體制改革以後，大批留學生湧入西方資本主義國

家，由於受自由世界民主政治之薰陶和目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繁榮的景象，部份留學生政治思想發生動搖，其中許多人揚棄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西方的多元和民主思想。據說，在美國學習經濟學的五十多位研究生和訪問學者，今年五月份在紐約中國領事館召開的一次經濟問題討論會上，多主張中國應發展私有制，實行市場經濟，反對搞計劃經濟。有些留學生則通過各種途徑和渠道，擺脫中共的控制，尋求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居留工作。凡此種種迹象，都引起了中共當局對實行教育對外開放、體制改革，向西方國家派遣大批留學生的疑慮和擔憂，深恐導致經濟和思想的自由化，改變國家的顏色。因此，教育領域也和經濟領域一樣，在實行了一個短暫時期的以多元民主為特徵的對外開放和體制改革以後，現在出現了一股倒退和收縮的勢頭，而且這股勢頭不小。前者就是倒退到中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時期，轉向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派遣大量留學生，重走過去向蘇聯靠攏的老路；後者就是收縮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放的政策，大量減少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這不能不對未來中國政局的前途發生重大的影響。

近年來，留學生政策在向西方開放以後，不少人接受了西方的多元民主思想，回到國內，思想活躍，舊的框框少，對當前中國各方面的改革工作起到一定的促進和推動作用。但是在改革剛出現一線生機而又遇到相當大困難的時刻，以李鵬為代表的留蘇派，妄想把教育向西方開放的嬰兒扼殺在搖籃裏，扭轉留學生派遣的方向，我們表示堅決反對！我們認為，教育祇有繼續實行按多元民主化的模式向西方開放，才是中國今後走向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

# 向東開放，向西收緊

## ——李鵬扭轉留學政策和教改方向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程瑞雲

最近，據來自大陸知內情的有關人員透露，中共在實行了一段時期的以西方多元民主化為主體的教育開放和改革以後，目前正準備扭轉留學政策和教育改革方向，收縮向西方的開放，改向蘇聯、東歐派遣大批留學生。提出主張實行這項改革的，就是由目前掌握教育大權，早期留學蘇聯、現任教育委員會主任的李鵬副總理。據有關人員稱近來，李鵬利用對外開放和體制改革中的一些困難和問題，乘保守派向改革派大舉反撲之機，在教育領域召開了一系列會議，企圖改弦更張扭轉向國外派遣留學生政策，以培養具有蘇聯思想體系的接班人。其改向的要點如下：①對西方教育開放採取收縮的政策，三年後，擬取消自費出國留學，向西方國家派遣的留學生全歸國家统一安排、分配；②擬大批向蘇聯和東歐國家派遣留學生，以與西方開放搞平衡；③加強對國外留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防止思想「腐蝕」和政治「變節」。與此同時，將加強對國內大學生、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規定招收

研究生要考馬克思主義和時事；④教育體制改革，李鵬堅持要按照蘇聯的模式，排斥、反對試行美國及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等等。

上述李鵬在教育改革和開放方面的改向主張，不僅是一個教育問題，而是當前中共整個改革路線鬥爭的一個側面和縮影，它關係到將來中國培養什麼樣的接班人的問題，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目前，以李鵬為代表的留蘇派，在中共領導高層執掌着很大一部分權力，他得到黨內部份元老、有實力的國務院一些部委以及部份地方和學術團體的支持。這一派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按照蘇聯的集權體制模式和單元思維方式，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紮的根很深，思想上的烙印很重。他們過去按照蘇聯的路子走慣了，如今轉到按西方的模式進行改革和開放，很不習慣，遇到一些問題，思想上總是格格不入。尤其是當在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難和挫折時，這班人往往會冷言冷語，發出埋怨和指責；而且很自然地會重溫舊夢，走回頭路，妄想把歷史的車

輪拉向後退。但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嗜了蘇聯集權體制的苦頭，以致迄今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長期困苦，過去的歷史教訓，記憶猶新，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教育是培養接班人的熔爐，教育事業，乃是百年樹人。中國教育改革和開放的方向，是向西方靠攏，還是步蘇聯、東歐的後塵，關係到將來培養什麼樣的接班人的問題，也關係到今後中國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就以派遣出國留學生為例，是大量向西方民主自由國家派遣，還是改向蘇聯、東歐的共產集權國家大量派遣，無疑會影響今後的國家性質、發展方向及其所執行的政策。西方有眼光的政治家，是把培養國外留學生作為在其他國家培養自己的接班人并影響其將來政策的百年大計來看的。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變了過去封閉和僵死的政策，實行了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無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已開始朝西方多元民主社會的趨向邁進。如今，以李鵬為代表的留蘇派，企圖扭轉這一趨向，改變教育改革和開放的方向，將中國重新拖回到走蘇聯集權體制的老路，那將大大延遲中國步向多元民主社會的進程，那將是中國改革史上的一次倒退。

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遭受到很大的困難和挫折，文化教育改革的道路也不平坦。在這種情況下，是努力克服困難，逐步創造條件，沿着多元民主化的改革和開放的路繼續走下去，還是在困難和挫折面前實行收縮政策，或者改弦更張，扭轉改革和開放的方向，走回頭路，滑向蘇聯和東歐的模式？這是擺在中共改革者面前可供抉擇的兩條途徑。中國何去何從，每位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都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 評中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放寬管制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趙大吉

最近，中國大陸人大法制委員會通過了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出入港澳辦法另定)，明確規定不准出境的五種人爲：①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國家的公、檢、法機關認定的嫌疑罪犯者；②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結民事案件不能離境者；③被判處刑罰正在服刑者；④正在勞動教養者；⑤國務院有關主管機關認爲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者。同時規定，執行本法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索取、收受賄賂者，依照刑法「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罪犯的決定」，給予處罰。

此管理法，進一步落實了開放政策，前四條禁例可說是除了犯人、準犯人，或法院通知了的有民事案件未了斷者，細民百姓和職工，有私事申請出境，幾乎一概可以放行。這是初步承認了公民的人權，而且杜絕了過去工作單位、街道居民委員會、和公安部門無理打壓申請、遲延阻難的弊端，實在是個可喜的進步！

然而，在人人稱善的前四條之後，這第五條禁例，却有些含糊其詞，令人不得要領。何謂損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具體有那些內容？「將對國家安全利益有損害」的「將」字，是個未來式，加上利益等詞概念抽象、含意不清，有此藉口，大可在此範疇之內，大興一面之詞

，使放寬管制的開放政策，口惠而實不至！

法制委員會在討論這第五條禁例時，對原條文作了修改，把原草案的「有充份理由被認爲」出境後，「將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害的」，改成了「國務院主管機關認爲」。「將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這是把主管此禁的管理機構昇了級，從申請人所在單位昇級到國家權力機構，以防止各單位進行關、卡、壓，防止出現新的冤假錯案。可是，這一規定，依然會使爲私事要求出國的申請人，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知是否人人都需經由國務院有關主管機構來審議？否則，國務院主管機構又從何得知這第五種人正在申請出國？根據什麼判斷申請者屬於第五種人？而且，「主管機構」具體又是什麼機構？是國務院接待群衆來訪的值班室呢？還是總理副總理的辦公室呢？公安部門以及海外國家安全部的情治單位，是否仍唱主角？那申請出國的職工人員或老百姓，如非前四種人，一旦得不到批准，豈非立即有第五種人(假想敵)的可疑？豈非要揸上一輩子有口難辯的黑鍋？

簡言之，「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將對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者」的第五種人，實指具有未來罪狀的未來罪犯。這是必須由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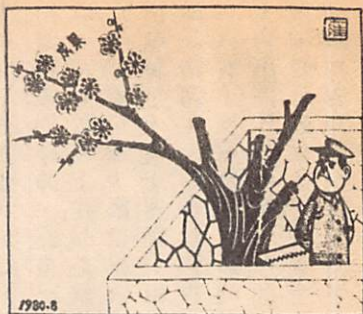
相學家來算命，才可以由推斷作出預言的。如果按法律的科學條文來解釋，恐怕祇有「莫須有」三個字，即使是最高法院，大約也很難作此判決。

出入境管理法中，還有一條規定：公民出國後不得有危害祖國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爲。這一條使人覺得實在多餘。

在國內有話不說，見人祇說三分話，或是保持政見的緘默，是完全可以理解，因爲即使是政府號召大鳴大放，歷次運動的秋後算賬，也使人心有餘悸，深知禍從口出的厲害。而且，不論是說話或是文字，一波三折、無限上綱的例證，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可算到了最高峯。所以，即使是對公民出國提要求，這祖國榮譽和利益，不知是否亦指祇許說好話、假話，不許談事實，或者乾脆點明一句：莫談國事！然而，恰恰是這三十多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事，例如每一次政治運動吧，都牽涉到了細民百姓家庭的生、死、哀、傷，國事、家事，鉅細難分。何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國內有話不敢說，到了海外，難道還要三緘其口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種豪言壯語，怎麼不喊了呢？

有了出入境管理法，這是一大進步，有法可依總比無法可循強百倍。但是，留下一個卡人的尾巴，將會貽患無窮。還是把尾巴砍掉的好。

最後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如果國務院主管機關用「出境後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爲借口，卡住了一些老實人，這些老實人怎麼辦呢？他們能夠控告卡他們的機關嗎？如果不能控告，就無法監督違法的行政機關，自己的出國權力被剝奪就不能申訴。因此，建議人大常委會把這一條補充上去。



1980-8 牆外香

劉荻

# 牆外香

## 炎黃子孫的嘆息

（中國大陸作家·美洲）季康

八五年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副刊第八版，開闢了「炎黃子孫」一個專欄，介紹海外知名華人，如大企業家王安等，科學家丁肇中、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等，建築設計大師貝聿銘，哲學家陳榮捷，作家聶華苓、於梨華等。當我們看到海外華人數目雖不大，但在各領域的成就却這麼大，凡我炎黃子孫，無不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但令人黯然痛惜的是，中國大陸擁有十億之眾，幾十年來，中共為什麼未能培養造就出一批在國際各領域中具有知名地位的人物？中共能把這一切都歸因於毛澤東、「四人幫」等少數人的錯誤上而在制度上自我反省嗎？人民日報乃中共喉舌，不僅不作反省，反而一味對海外知名華人捧拉，多少有點落不

知自慚之譏吧？就以九月份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萃」捧的海外知名人物來說，有兩個作家、兩個畫家，如美國的作家聶華苓、聯邦德國的作家兼畫家周仲錚、加拿大的女畫家黃彥華，再如美籍華人哲學家陳榮捷、加拿大華裔時裝設計師艾爾弗里德·宋、台灣的田徑女傑紀政、美中醫藥中心理事長陸衛平，和一九八二年在法國參加過競選總統的女強人成之凡等等，人們不由得

會說：如果他們的生存空間是在中國大陸，環境條件的壓力，是否能使他們獲得今天的地位與成就，就很成問題。

多少年來，在大陸的報刊和科技文藝界，盛行兩句話：一是「蓋棺方可論定」，二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上一句是把關的編輯黨委用的，意思是祇要是人選活着，最好不要進行宣傳，以免此人思想突然有了變化，反黨反社會主義，報章雜誌作過宣傳了不好下台，還是多宣傳已死的先進工作者為好。下一句是知識份子內部流傳的：有了成績，還是歸功於黨和群眾，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出了名，樹大招風，說不準到哪個運動，會扣上帽子，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儘管早在一九五〇年，大陸就制定了「關於獎勵有關生產的發明、技術的改進及合理化建議的決定」和「保障發明權與專利權暫行條例」等等。三十多年來，轟動全國的發明、專利新聞，有如鳳毛麟角。即或偶一有之，到了文革浩劫，也都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還置於死地，這印證了「人怕出名豬怕壯」民諺的千真萬確。粉碎四人幫後，實行了開放政策，有鑒於海外人材小有建樹即受到國際上各種

獎勵的文明作風，有的科研機構也開始實施發放科技發明獎金。但聽說上海某機關給某技術員的發明獎金總共祇給了三百人民幣，黨委書記說：「沒有黨的正確領導，你的發明能有辦法有時間進行嗎？」於是，該技術員趕快拿出一百元，捐獻機關行政人員和黨委，以示歸功於黨和單位的支持。之後，炊事員勸雜人員又說了：「沒有我們在食堂做飯給你吃，沒有我們打雜搞後動的幫忙，你的發明，能夠得到成功嗎？」於是，該技術員又趕快拿出一百元，買糖買食物，誠懇分送後勤人員的群眾。還剩下一百元，又有看大門的醫務室的紛紛發話，得獎的技術員誠惶誠恐，乾脆全部獎金分光，落個虛名反而提心吊膽，唯恐有朝一日又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所以，最近「人民日報」重新頒佈的「科技工作法規種」，可能祇有「經過批准的專利，包括外國人、外國企業、或其他組織向我國申請的專利、專利權人的利益，都將受到法律的保護」這一段，還有希望在外國政府的法律人員保障下，真正有所落實。對於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來說，不要說像陸衛平教授那樣的列入美國名人錄、世界名人錄是癡心夢想，而且三十多年的前車之鑒，已經有了足夠的教訓，還是太平點一無作爲的好。首先，有此名利思想就該受到批判，何談其他？創造發明了世界第八奇跡也好，第九奇跡也好，還是趕快歸功於集體，至少有發明癮不肯安靜過日子的人，在有了發明之後，也有了一定安全係數的保障吧！

作家、畫家進行的是個體勞動，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曾有話說：「稿費是照顧文化人的落後性的」。這首先就把按勞取酬的原則歪曲了，先給文化人戴上了落後帽子。然後歷次運動又強制文藝家對名利思想作檢討，認為成

名家思想不符合列寧指示「文藝是革命事業的一部份，是集體事業的螺絲釘」之說。於是，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統統是個人名利思想的寫照。作家、畫家幾乎每逢運動都千篇一律要檢查自己對螺絲釘思想認識不足，有萬惡之源的個人主義等。八二年秋天，文藝界才明白了，當初列寧說的原話，是指布爾什維克黨刊，應是革命事業的螺絲釘，并非泛指所有文藝刊物，當時是俄文翻譯的俄文太差，譯錯了。真是天大的笑話，唸了三十多年的經，原來是歪嘴和尚傳錯了。至於個人寫作動機，又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為前提，以毛澤東延

地」一類無衝突文學作品，感到鄙棄。可是，衝突除了對地富反壞鬥爭外，也只落在寫落後到轉變，或是先進與保守，好的與更更好的之間的矛盾衝突。一九五一年，有一個延安老作家蕭也牧，寫了一篇「我們夫婦之間」的小說，刊登在「人民文學」雜誌上，按說也是寫的人民內部矛盾，內容寫的是老幹部進入大城市，不愛自己的農村老婆，變了心，喜歡知識份子女性，文字中略帶批評意味。但小說稍稍涉及生活現實內容，就受到了圍剿，認為這是寫黑暗，沒有寫光明。蕭也牧為此大作檢討，降到青年出版社擔任普通編輯，從此受冷落，鬱鬱不得志終生，終於在文革中受迫害死了

一定是大團圓，先進戰勝了保守，據說這是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漸漸充斥於市。到了蘇聯馬林科夫上台，蘇第十九次作家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典型」是萌芽事物，而非統計的平均數之說後，先進與落後保守的矛盾，又被寫先進中拔尖的萌芽事物，實際也是非普遍事物的論點所代替，這萌芽事物可以是只有一個影子，甚至連影子也沒有，純粹是浮誇的胡編亂造，所謂的作者的理想主義，作品的脫離現實也就登峯造極，包括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許多人都說，梁生寶這樣的英雄人物，是超現實的，生活中根本找不到的，但理論上可以引證梁係萌芽狀態的人物，或者說，是光輝品質的高度概括與集中。這時期，凡對「典型」討論認識不夠「深刻」，多少有點「舊現實主義」不知好歹的作家，藝術家也有開始創作忠實於生活原始面貌的作品，電影如「新局長到來之前」，相聲「洗臉盆」等等，其中新局長到來之前，多少有點落「欽差大臣」舊俄喜劇的巢穴。不過，也有它的現實意義。「洗臉盆」這個相聲，却是大有新意和創見，諷刺了一個單位，行政黨委領導，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討論要不要買一個洗臉盆的芝麻大事件，廢話連篇，但寫來妙語連珠，十分雋永有趣，一針見血地嘲諷了官僚事務主義，受到了群眾熱烈的歡迎。但其結果是在一九五七年，作者均為此打成了右派。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作品，如「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是直接尖銳抨擊黨風的，當然更是打成右派。其他解放後培養名作家如鄧友梅、宗璞、白樺、公列等等，也都因作品被打入了右派行列，下放勞動改造二十多年。有的作品，今天來看，根本不是問題，祇是稍有批評內容。有的作品，全是出于善意的批評，



美國著名科學家吳健雄



聞名國際的美國建築大師貝聿銘



美國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



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為準則，還必須加上一句：主要是為工農兵服務，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所以，像人民日報「炎黃子孫」欄所介紹的聯邦德國作家周仲鐸，寫自己的自傳體小說「小舟」，竟然敢寫上作品是獻給自己的親生母親，而不是獻給黨，獻給祖國或工農兵，那可真是出軌越矩。沒有運動，出版界會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情調，大約會勸告去除，或乾脆刪去。而一旦有了反右文革之類的運動呢，可以想見，大約不問作品內容，僅此一條，也足以打成資產階級反動文人。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文藝作品寫光明還是黑暗的問題，就開始爭論。當時，五十年代初的作家，對蘇聯的「光明普照大

。而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甫剛新生，文藝界對蕭也牧的遭遇，雖憶及四二年整風有嘆息和同情的，但也并未太引起注意，祇是知情人略知其端末，而寫光明也就定論成了作家的基調了。等到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等等一放映，所有的人都把那愛情與集體農莊的豐收所傾倒。「幸福的生活」歌曲唱遍城市鄉村，觀眾既對那蜻蜓點水式保守與先進的矛盾滿了意，作家的作品，便也有了這樣模式，除了好人壞人反特驚險片叫做對敵鬥爭題材外，便祇有騎士精神的先進工作者和好心的保守派作鬥爭的人民內部矛盾題材的小說，這樣逐漸產生了一個公式，愛情必然作為是穿插的，最後結局又

更是所謂含沙射影的冤枉，如公列寫白居易小詩，祇寫了一句，以白居易的大才，屈居杭州小吏，純粹是思古之幽情，也被認為是借古諷今。這種文字獄，恐怕是海外的作家所難以想像的。到了文革浩劫那就更不用提，此文也不想多作涉獵了。

文革之後的傷痕文學，後又統稱為暴露文學。有人反問得好，既有暴露文學，那相對而言，就有「掩飾文學」了，文學泉源於現實生活，作品祇有藝術的真實是否與生活的真實相一致的問題，哪有暴露與不暴露之分。但反精神污染後，自有編輯把關，寫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一則難以發表，二則作者自己也會聞風而



美國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



美國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

動，由於害怕堅持抽回。於是報章雜誌既多發出掘出土文物的消息，也多風花雪月做考古學問的文章。作家的文字，被所有這些框框套套，囚禁了三十多年，敢於寫反面事物的，也必須拉上正面人物作陪襯。而且，正面人物必須壓迫反面人物，或如五十年代初期的模式，寫先進與保守，落後到轉變。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也許是落後到轉變的最高級典型了。電影方面則學開了海外的功夫武打片，或借唐太宗、曹操與華佗之類，或清末民初的傳奇故事，真正借古以諷今。不說諷刺，或說勸世醒世，寓作者滿腔熱血於歷史借鑑。真正像劉賓雁這樣敢於直衝直闖寫真人真事的，最終不得

不宣告退出文壇。這樣的悲劇，海外的炎黃子孫作家，是難以體會的。有人曾驚異，為什麼海外女作家如於梨華等，写的作品竟有魯迅文集一樣的多，精裝本一出二十大卷，而大陸作家作品每每難產，三十多年，能有一兩部長篇，就算大豐收了。殊不知中國大陸的作家，筆端之澀，都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苦難教訓，提筆千鈞人命攸關啊！

至於畫家，比之於作家，也許稍有平安。因為畫山水花鳥蟲魚，從來是康莊大道，國畫的傳統。但不幸的是，除了已成名畫家如齊白石、潘天壽、李可染、葉淺予等舉凡一些有名望的以外，青中年畫家，如果不從事政治宣傳



海外著名華人女作家聶華苓



香港著名企業家李嘉誠

畫，很難出人頭地。美術評獎也從來以政治標準為準則。以致中年山水畫家每每感嘆，畫家是需人捧出來的，沒人捧的畫家，便祇有畫兒童連環畫，賺點錢過日子。而花鳥蟲魚畫，有一度也可悲到了畫隻螃蟹要加上一句題字：「看你橫行到幾時？」畫麻雀，因為，麻雀被毛澤東列為四害，也必須加上一句題字：「看你往哪裏逃？」像女畫家黃彥華那樣，帶了照相機四處跑，邊防檢查站還隨時有可能把你抓起來，作為間諜國特來懷疑。畫家被拘留的事，常常發生。當然，拘留了會放出來，可是，創作情緒已被破壞殆盡。畫家同樣不可不重視政治。人物畫雖被重視，但像蒙娜麗莎的微笑

這樣的畫，由於蒙娜麗莎不是工農兵，在大陸可能連評獎都不一定評得上。海外的炎黃子孫，也許是得天獨厚，即使賣畫為生，落魄未成名畫家，也不致有政治上動輒得咎之慮，至少對於政治運動，可以風馬牛不相干，僅此，也就是一福了。

再說人民日報介紹的成之凡女士在法國競選總統的事，對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來說，更加可以說是天方夜譚了。如果把這一事件放在大陸，不是關進監獄，也會被認為是政治狂人。別說競選總統了，就是小小一個芝麻七品官，例如供銷社主任之類，恐怕也要先問問，你是什麼成份呢？查查三代是貧下中農或工人，抑或高幹子弟否？入黨（中共）沒有？一貫政治表現如何？有無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言行？是否擁護共產黨？社會關係中有無海外關係或右派親屬？……夠了！想競選總統？就憑這個意念，就足夠打成反革命了！像法籍成之凡女士的著作「大道經」或是美籍華人哲學家陳榮捷的新儒學，在大陸開放政策之前，出版社可能都會認為是匪夷所思，反動文人的文集。開放政策之後，也要先問問是否洋人已經肯定。正如大陸近幾年流行的想法：凡事如果外國人叫了好，在大陸也一定吃得開。唯有體育界，真正可以靠個人拼搏，嶄露頭角。但新近公佈的秘聞，連榮獲第廿五屆世運會冠軍的榮國團等人，國家都未予保護，造成被鬥爭後自殺身亡。恐怕即使像台灣田徑女傑紀政這樣，被評為世界最佳運動員，如果生活在沒有人權而可以被利用才智的廣闊土地上，也是難免受各種政治運動的牽連，前途吉凶難卜的。

人才、人才，首先是人，應享受到人所應享的人權，不受政治迫害，這恐怕也正是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想法吧！

# 民主制度的優越性

訪「中國的民主」作者

黎安友教授

本刊記者

(中國大陸留學生) 吳軍



編者按：二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哥大辦公室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黎安友教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中國問題專家，他的許多觀點受到美國政界和學術界的重視，尤其是他的近作「中國的民主」(The Chinese Democracy)一書頗有影響，該書從康梁變法一直談到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

在接受本刊記者訪問中，黎安友教授以一位外國專家的眼光，簡明扼要地論述了有關現代中國民主的一些問題，並對「中國之春」在中國民主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作了一定的評價。以下「中」代表本刊記者，「黎」代表黎安友教授。

## 美國民主觀與 中國民主觀的異同

中：您在最近出版的「中國的民主」一書中談到，美國人的民主觀和中國人的民主觀不同。請您談一下它們不同在什麼地方好嗎？

黎：舉個例來說吧。你們「中國民聯」的民主綱領內容就相當普遍，相當廣泛，它包括言論自由、社會的多元化、私有財產、人權等方面的問題。我在 The Chinese Democracy 中所強調的一點是，這些一般概念既吸引着美國人，也吸引着中國人。但在理解這些概念的特殊內容上，中西方却常常有所不同。就拿「權利」(right)

這個概念來說，美國人一般認為，「權利」是一種保護個人免受國家侵犯(invasion)或侵害(encroachment)的東西。當然，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在這個概念上也不是完全沒有差別，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嘛。在中國人的主要傳統上，「權利」被認為是國家爲了獲得人民更積極更有力的支持而給予人民的東西。進一步說，美國人的「權利」觀是建立在「國家」與「人民」在某些方面互爲仇敵、互相敵視這個概念上的，而中國人的「權利」觀則是建立在「國家」和「個人」具有最重要的共同利益這個概念上。

中：您認爲今天的大陸人民是否真正享有公民權？

黎：中國官方和大多數美國人，甚至在「享有公民權」這個概念上看法也不同。當然，總的來說，中國在人權狀況方面最近有了相當的改進。我們也認識到，一九八二年公佈的憲法，給了中國人民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選舉權和其它許多重要的權利。但是，我們也要指出，憲法中所規定的這些權利，並沒有得到當今中國法律制度及行政制度的很好保護。

中：您能否舉些具體例子？

黎：好，我們就着重談一下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吧。這兩種權利在中國是受到許多法律和行政慣例制約的，所以我們要詳細看一下它們的含義究竟是什麼。首先，中國目前還沒有出版法，也沒有私人經營的刊物



，更沒有對於私人刊物在法律上的保護和保障。即使在憲法中，也要求一切出版物要按照「四個堅持」去辦，而「四個堅持」則限制了人民的創作自由，也限制了人們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其次，中國有一條刑法，對一種被稱為「反革命宣傳和煽動」的罪行下了定義。這條刑法的實施面很廣，像魏京生、王希哲都是受到這條刑法制裁的。但據我們西方人士所知，他們只不過是行使了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罷了。中國還有一條所謂「國家秘密法」，此法對國家秘密所下的定義是那樣的廣泛，以至人們不知道究竟還有哪些東西剩下來可以出版的。還有所謂勞動改造的制度，即「勞教」。這種制度使警察有權決定某人是否在從事現行的破壞活動，或是否會引起社會騷亂。很明顯，這樣的制度也可以被用來阻止人民行使言論和出版的權利。所以，儘管憲法中明確規定人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但是一經法律和行政程序的限制，這種自由的範圍就變得狹窄了。

中：去年中國文聯在北京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會上，名記者兼作家劉賓雁被選為文聯副主席。但事隔不久，劉因在一篇題為「第二種忠誠」的長篇報告文學中發出了不和諧的逆耳忠言，得罪了最高當局，結果作品受到了查禁。您對此事有何看法？

黎：我感到那次大會表明，中國作家渴望享有創作自由，在我所接觸過的中國人中，大多也希望有更多的言論自由，的確，他們現在說話比毛澤東時期要自由多了。我認為，中國的作家要求有更多的言論自由，並不是爲了去反對政府，而是爲了更好地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服務。胡啓立在那次

會議上的發言，意思也是要作家和藝術家們有更多的自由來發揮他們的專才，以便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一點就跟西方的自由觀不同。西方的自由觀，還包括着反對政府和反對執政黨的自由，雖然一般並不包括推翻現行制度的自由，但却包括批判執政黨以及其領袖人物的自由。所以我認爲，胡啓立的發言仍然沒有顯示出中共領導人將會執行全盤西方式的言論自由政策。大會以後的情勢發展，也證明確是如此。胡耀邦在針對新聞工作的講話中就明確重申，一切出版物必須支持黨的事業。胡的講話雖是針對黨的報紙而言，但我相信，他在講話中提出的基本原則，應該被認爲是適用於一切出版物的。

### 「民主牆」短命的原因何在？

中：「四人幫」垮台不久，中國人民在很短一段時間裏倒是享受過一些自由的。

黎：你是指「民主牆」時期嗎？

中：是的。記得您在「中國的民主」一書中也提到「民主牆」時期。您說，這是一下子不起的民主運動，但可惜時間不長。

黎：不錯，我稱它爲壽命短促的（Short-lived）民主運動。

中：原因何在呢？

黎：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當然，主要原因還是在於，運動中有一批人開始批評黨的領導，這就使黨決定把運動鎮壓下去。一開始，鄧小平等領導人認爲這次運動會支持他們的「撥亂反正」計劃，例如爲劉少奇、彭德懷平反啦，給千百萬在「文革」中受冤遭屈的人恢復名譽啦。當然他們也

認爲運動會對改革政策有利。鄧顯然沒有想到有人會利用這個機會抨擊一黨專政理論。這樣一來，當然就不能爲中共所容了。

### 文化傳統不會影响民主化

中：我們曾接觸過不少西方人士，他們中有些人認爲，由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民族性等原因，所以民主並不適合於中國。您對此有何見解？

黎：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因爲有許多中國人也持有這種觀點。事實上，黨的領導人也是這樣認爲的。鄧小平在多次講話中談到，如果民主太多了，各人走各人的路，那就會導致混亂。我也接觸過不少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自由，但其中有些人又覺得如果讓全中國人有太多的自由，就會產生不良後果，原因是中國人中大部份都是農民。就我個人來說，我覺得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爲我是研究政治學的人，我希望我的結論能夠建立在有憑有據的研究成果上，可惜這樣的憑據目前並不多。我只能在這裏提出幾個探討性的看法。第一個看法是，新加坡雖然還不是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但其某些民主運作很不錯。台灣雖然也實行專權，但在這個制度下有不少言論自由和競選自由。印度跟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水平相仿，但印度民主運作良好。日本是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實行民主的，而當時日本的經濟並不發達，雖然這種民主嘗試後來導致了軍事法西斯主義。綜上所述，我認爲歷史並沒有向我們表明，實現民主非要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才行。同時我也認爲

，歷史並沒有向我們表明，中國人因為文化傳統等原因而不能實行民主。

## 民主不是「權」的反義詞

中：您的第二個探討性想法是什麼？

黎：第二個想法是，民主並不是「權」的反義詞。你可以既有一個堅強的、能夠維護社會安定的政府，同時又可以有良好的民主運作。很多人認為中國還不到實行民主的時候，這些人其實犯了一個錯誤。在他們看來，似乎實行民主就會使政府變得軟弱而無法控制局面。可是請他們看一下美國吧，我們有堅強的政府，強大的軍事力量，遍佈各地的警察部隊，我們也有範圍廣泛的法律制度及各種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同時我們的人民又積極參政，而政府對各種不同的政見都能加以容忍。我看，中國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強大的政府，也許正是應該讓人民有更多自由和讓人民參政的合宜時機。

## 實行民主制度的好處

中：那麼照您看，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後會有哪些有利方面呢？

黎：我在「中國的民主」一書裏列舉了四個有利方面。其一是，「民主對衝突起調節作用」。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社會裏都有利益衝突。在民主國家裏，這種衝突是通過和平討論的方式得以解決，而不是通過暴力手段去解決。從表面上來看，民主國家似乎很亂，原因是各種衝突都被「和平地」提了出來，實際上這種制度倒是比較穩固

的。其二是，「民主使政府更具有合法性」。在民主國家裏，領導人在作出某項決定時一定要允許人民參預意見，因此當此項決定正式作出以後，人民就會自願地服從它，即使某項決定對個人利益有衝突，人們也會理解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決定。其三是，「民主使政府質量得到改善」。現代國家都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民主提供了監督這種官僚機構的最好手段，也可以防止政府領導人濫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民主還對政府官員起一種管束作用，使政府官員在制定政策時必須十分謹慎。同時，因為有了民主，人民可以從更多的競選人中去物色自己的領袖，從而使政府人員能力更強，並且也能容納更多不同的意見。其四是，「民主有助於政局穩定」。民主國家定期通過和平手段舉行大選，政客們用不着使用暴力來謀求或保住官職。另外，由於政策是在各有關團體之間經過長期討價還價後制定出來的，因此很少會突然改變。拿水門事件來說吧，我想大多數中國人都同意，這件事表明了美國的民主制度可以通過把有可能危害這種制度的人革去公職，從而使制度本身更加鞏固。肯尼迪的蒙難，林頓·約翰遜和尼克松的被逐出白宮，這些事例都表明民主制度保證了美國能夠和平地移交政權。但在一個非民主國家裏，人們無法知道政權會不會和平轉移，也不知道政權會落在誰的手裏，結果人民往往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總而言之，民主制度的好處極多，這一點，我想甚至連中國的領導人可能也看到了，問題是他們不願爲了這些好處而換來一個多黨制。

## 「中國之春」與民主運動

中：您是「中國之春」的老讀者了，您覺得「中春」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作用如何？

黎：我覺得，有更多的論壇讓中國人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對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方向等問題暢所欲言，這是非常有益的。這種自由探討會有助於中國人澄清對一些問題的認識。至於中國究竟應該有何種民主，或應該採用何種民主形式，這些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去爭論，去澄清，任何一個外國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內，都無法說明得了的。我在「中國的民主」這本書裏也只是向西方讀者介紹一下中國人在民主問題上曾經出現過哪些思想或爭論而已。

中：您認為「中春」有助於西方人士了解中國的現狀嗎？

黎：「中春」刊登了許多關於中國國內的消息，但它是一份中文雜誌，所以只有西方專家才能閱讀。不過可以肯定地說，「中春」爲我們提供了相當多關於中國發展趨向的有用建議，尤其是關於你們在海外活動的報導，以及你們搞民主運動的歷史等，西方專家都具有濃厚的興趣，因爲透過它們可以使我們了解一群在海外的中國公民是怎樣看待民主問題的，也可以了解他們是怎樣把「自己」在海外耳目目睹的東西與他們所知道的國內現狀進行比較。這裏要說明一點，我雖然經常閱讀「中春」，但因爲工作太忙，讀得不够仔細，要能再讀得仔細一點就好了。

中：今天我們就暫時先談到這裏吧，以後有機會一定再向您請教。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 中國統一問題裏的 困結、涓水、死水和新機

邱垂亮



邱垂亮教授

編者按及作者簡介：邱垂亮教授，出生於台灣，任教於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系，近年多次訪問大陸及台灣，對中國統一問題有獨到見解。一九八五年八月，在廈門召開了第二屆「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邱垂亮在發言中指出，中共的統一運動的涓水還不能成洪，水不到渠不成。他認為，國共兩黨談判解決台灣問題，不可能真正照顧到台灣人民的意願。他還指出，要使「一國兩制」真正行得通，中共必須從憲法中取消「四個堅持」。邱垂亮教授是頗有風骨的海外學者。

下面刊登的，是邱垂亮教授提交該次會議的論文。因篇幅有限，本刊發表時，去掉了原文中的註釋部份。

## 前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宣佈：「隨着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三通」的建議，宣佈了和平統一中國的方針。同一天，中共領袖鄧小平說：「今天把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台灣的統一問題，就這樣變成中共一九八〇年代三大主要政策目標之一。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一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有名的九點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的建議。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負責統一工作的廖承志給他年輕時的好友國府總統蔣經國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公開信，呼籲「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旨哉斯言，蓋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否則，吾弟身後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同年九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時，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構想。一九八三年六月，鄧小平會見了美國西東大學的教授楊力宇，進一步解說了「一國兩制」的意念和以此制度和和平統一中國的設想。他說：「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

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祇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不現實。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適當方式，所以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宣佈。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祇能意味着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如果他們能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以及一切致力於中國統一事業的人，歷史都會寫得好好一些。當然，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如果說不急，那是假話，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

中美關係最近略有好轉，但是，美國的當權人士從未放棄搞「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

中國「一國兩制」的統一政策，就在上面的幾段話中闡述得確切清楚。經過兩年的艱辛談判，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中英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四年九月草簽，十二月正式簽定。算是相當成功地初步地解決了困難的香港問題。

## 困 結

香港問題一解決，馬不停蹄地、聲勢壯大地，中共就展開了一連串的統戰攻勢，把台灣國民黨政權衝擊得手忙腳亂、接應不暇，產生了籠罩台灣全島的憂鬱、沮喪和錯亂氣氛。

今年年初，我去中國做了一個月的研究訪問，和好幾位負責統戰工作的幹部詳細討論了「一國兩制」和台灣統一的問題。大家深入淺出、坦誠交談，真的談到了統一問題的最麻煩、最無法紓解的困難部份。回來後寫了一篇「中共對台統一政策的困結」，在香港的「九十年代」發表。文裏，我詳述了一系列目前看起來無法輕易解開的死結。它們的大意如下：

一是香港結，我認為，一方面中共認為「一國兩制」模式在香港前途問題的解決上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台灣和香港的情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的模式可以一樣地使用在台灣問題上；另一方面又一再強調，因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台灣是一個另一政黨主權控制的中國領土，兩地基本情況不同，所以香港問題的解決程序和經驗不可能一樣地使用在台灣問題上。在這「一可」和「一不可」之間，明顯地存在着重大矛盾和困難。

二是美國結，中共一方面不停地遣責美國，說台灣問題三十多年來是美國人一手造成的，說沒有美國人的刻意製造「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或「兩個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台灣問題；可是另一方面又一再強硬地宣稱，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絕對不許美國人插手，像英國人在香港問題上，在台灣問題上扮演任何的角色。中共一方面承認歷史和國際政治的實際情況，知道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幾年、幾十

年中，鑒於自身的經濟、戰略利益，美國一定不會放棄台灣，撒手不管台灣；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實事求是地接受美國以「調解人」或「見證者」的身份參與台灣問題的解決程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中國領導人的言論中，這個困結一再出現。

三是蔣經國結，也可以說是國民黨結。中共領導層一九七九年以來對統一問題有一個「早解決比晚解決好」的心結，鄧小平的「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道盡了這個心情。爲了在他們去會見馬克思和毛澤東以前完成這個心願，從一九七九年的人大常委會的「告台灣同胞書」開始，中共就採取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和蔣氏父子愛國忠貞歷史地位爲中心論點的和談統戰攻勢。鄧小平的談話和廖承志的公開信，都充滿了這個情結。他們真的怕「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所以，真的希望蔣經國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中華之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

但是，這個以蔣經國個人意願爲主要決定因素的國共和談有一個嚴重矛盾的先決條件，那就是，不管怎麼談，只要一統一，蔣經國和他的國民黨馬上就失去統治台灣的政權，馬上就失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台灣的國府也馬上必然地變成爲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一個地方政府。這個先決條件蔣經國一定不會接受的。不只是在實事求是，就是在感情主義的層次上，蔣經國都絕對不會接受中共目前推出的「一國兩制」的和談統一建議。最大的矛盾是，鄧小平和他的決策者，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蔣經國不會接受他們的

和談建議，但是他們還是一廂情願地頻送秋波，希望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地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實在是一個因結，甚至是一個死結。

四是台灣結，也就是台灣人民的意願結。國共兩黨談判合作解決台灣問題，是不可能充分地注意、照顧到台灣一千九百萬人民的意願的。國民黨專制統治台灣，不能代表台灣人民，是世人皆知、不能爭辯的事實。還有，雖然中共一再宣稱他們非常重視台灣人民的意願，他們相信台灣人民向祖國、渴望回歸大一統的中國，但是事實上，他們是不太相信台灣人民的，他們怕，給予自決的機會，大部份的台灣人民可能會選擇獨立。所以，在這個虛實不定的「台獨」陰影下，中共一方面答應會照顧台灣人民的意願，另一方面却快馬加鞭，希望速戰速決，和蔣經國展開「兩黨談判」，不經過任何「人民自決」的程序來解決台灣問題，以免「夜長夢多」。中共能否忽視這個台灣結，不顧台灣人民的意願地逕和國民黨「私下」達成協定，達到統一的目的，國民黨是否能夠這樣做？台灣人民是否會接受、會反抗？台灣情況和香港情況、台灣人民和香港人民是否一樣？恐怕都不是容易解答的問題。

五是意識形態結，鄧小平說：「蔣經國提出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現實嗎？你那個『三民主義』在中國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到一九四九年，中國搞成了什麼樣子？」同樣地，蔣經國可以反問，「四個堅持」的國家憲法下的「一國兩制」模式的統一台灣，又現實嗎？共產主義在中國搞了三十五年，中國又搞成了什麼樣子？只要國共雙方都是一點也不修正地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四個堅持」之間，雙方恐怕都不容易找到可以交談的共同語言吧。

## 涓水

除了上述的五大主要統一因結以外，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上的困難。我一九八五年初下的定論是，在這些重現實嚴厲的因結下，中國統一的前途是不可能樂觀的。

最近半年多的發展，雖然顯示了一些零星的變化，但是基本上國共雙方的立場沒再有實質重要性的改變。不管中共發出了多少「仁盡義至」的和談邀請書，國民黨回答的都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

在香港「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上，中共的基本政策已定，「香港能，為什麼台灣不能？」的心態，仍沒有改變或放棄。倒是美國結方面，偶然有「要求美國介入北京與台北之間協助推展中國統一程序」的說法。不過，中共最高領導層還沒有公開表示要求美國介入的想法。今年七月十一日，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赴美加訪問前夕，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中就宣稱：「中國和美國之間最大的障礙就是台灣問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我們也和平統一台灣。任何入想搞『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中國人民是絕對不會同意的。」外國報紙認為李先念是在答覆「美聯社」記者問：「你這次去訪問美國有沒有給里根總統帶去有關台灣問題的新的信息？」時的答話，顯示「美國結」還沒有解開的可能性，中共不讓美國插手台灣問題的立場沒變。

當然，政府公開講的話和私下講的話以及實際做的事，常常是不相同的。李先念和里根見面時，是否會要求美國扮演魯仲連的角色，促使國民黨接受和談，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在台灣和中國雙方關係方面，自從去年洛

杉磯世運會以來，雖然國府一再宣稱「奧會模式」只是一時權宜之計的措施，事實上，台灣已經用「中華台北」之名多次參加了國際運動活動。最顯目的是今年三月間台灣參加世界圍棋聯盟和後來派隊參加該聯盟的比賽，以及六月間台灣第一次派代表隊參加在美國舉行的美國乒乓球錦標賽。這兩個活動，台灣都是採取主動，以新參與者的身份積極爭取參加原屬於中共「勢力範圍」的國際活動。

在國際文化學術活動方面，半年多來，在世界各地，更是常常出現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專家同聚一堂的現象。就是敏感性極高的「中國之前途」、「台灣之前途」或「中國統一問



一九八五年在紐約舉行的「中國之前途討論會」上，兩岸學者共聚一堂，商討國事。

題」之類的討論會，海峽兩岸現在都主動積極派人參加。這在一年以前是不可能的，去年六月間，當時任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的張京育還向我強調，台灣絕對不參加可能被誤認為是和中共「接觸」的學術會議。今年七月初在芝加哥舉行的「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海峽兩岸都有學者參加，發表論文，顯示類似的學術活動將會繼續發展下去。

在「通航」方面，據說，每年已有兩萬以上的台灣居民經由第三地區「轉口」訪問中國大陸。國府曾三申五令不允許台灣人民轉口訪問大陸，但是台北當局「張一隻眼、閉一隻眼」，已經不再認真執行這條法令了。

在「通商」方面，多年來，經由香港轉口中國大陸的台灣貿易成長速度實在驚人。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數字，去年台灣產品經香港轉口大陸，直攀高峯，金額高達三十三億港幣，比前年成長百分之一百七十一。這個龐大的數字震驚了台灣經政界。國府經濟部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應對。立法委員則大肆攻擊政府的對策不當。終於迫使新聞局長張京育於七月四日宣佈：「政府對轉口貿易的立場是，禁止我國廠商與中共機構、人員直接接觸通商；但是對無法管制的他國轉口貿易行為，不加任何限制。」

「中國新聞」為此發表了一篇述評，說：「台灣當局一再聲稱『三不』政策是永不改變的『國策』。世界上永遠不變的東西實在不多見。事實上，『不接觸』政策，早在幾年前就已突破。過去，兩岸運動員、專家學者、藝術家，同場比賽，同台演出，同堂聚會。最近，又有外交官在國外接觸、握手的新聞傳出。兩岸貿易已勢不可擋，台灣當局如真的要和平統一，不如順應形勢，向前邁進一步，開放

直接貿易。這對兩岸加強瞭解，溝通訊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大有裨益。和平統一事業的確定要從實際入手，點滴做起，方能涓水成洪，水到渠成。」

這個「水到渠成」論，大致講得通。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去年來世界經濟又呈低迷，台灣產品銷售無路，在極端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台灣商人才被迫走上中國大陸的轉口貿易的道路上。這條路的前途是非常曲折不定的。國府當局一再警告台灣「業者小心因應，莫為假象蒙蔽。」事實上，要從轉口貿易進入直接貿易，還遙遙無期，要從經濟接觸進入政治接觸，更是一個目前還是完全不可能的發展。「水到渠成」還不知道要多少涓水，才能成洪，才能成渠。

## 死水

倒是目前尚未解決的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國會籍問題上，也許會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這個問題正引起各方注意。假如能不像世界銀行和國際基金會的先例，在中國進入亞銀的時候，台灣能維持會籍的話，這將是第一次中台雙方同時並存。在一個官方的國際組織，也就是一個完全政治性的國際組織。假如雙方能夠容忍，創下這個慣例，國共關係也就有了一個新的方向、新的發展。

另外，最近台北駐香港的「官員」有了不尋常的調動，派了屬於蔣經國嫡系幹部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外工作會總幹事黃達紀常駐香港，同時調換了國民黨在港機構如「香港時報」和「國華旅行社」（情治單位）等的領導班底，並在香港發行新的報紙和刊物。有人認為，這些重大變動，顯示台灣不再鴛鳥式地退縮，

將在未來的十二年過渡時期、甚至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的特別行政區的時代裏，在香港和中共的政權正面斡旋到底，盡力保護和爭取台灣的利益，並支持和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有人則認為，國民黨的動作，完全是要分裂、破壞香港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搞亂香港，傷害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以向世人證實中共政權失敗，香港「一國兩制」失敗。

前者是建設性、後者是破壞性的行動，兩者都將對中共造成挑戰，但也可能造成溝通、接觸（包括三通）的機會。

明顯地，上述一些可能正面性的發展，離國共和談和中國統一還有十萬八千里的遙遠路程。這些真的只能算是涓水。

相反地，在重大關鍵性的幾個問題上，半年多來，困結不只是沒有任何紓解的跡象，反而有惡劣、僵硬性的發展。在意態結上，蔣經國最近說：

「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民國之目的在實現三民主義，以建設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國。此項理想，在中華民國台澎金馬的實踐成果，業已獲得極高的成就與肯定。相反的，中共極權暴力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三十餘年來，充滿了鬭爭與屠殺、貧窮與災難。在此兩種迥然不同的制度與現實情況下，中共提出『統一』的建議，其真正目的乃在去除中華民國因一切比它優越而對它所構成的威脅。吾人認為，祇有在中國大陸徹底剷除共產奴役制度並且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是符合中國人願望的統一。」

在同一篇訪問文中，蔣經國說：「我們奮鬥的目標是要以三民主義的理想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繁榮的中國，這與極權、奴役、貧困的中共統治是絕不相容的。因此我們絕不會和

中共妥協進行談判。」

事實上，中共香港問題的圓滿初步解決，「一國兩制」統一運動的大肆推動，和對外開放政策的迅速推展，不只是沒有絲毫影響國共之爭中的意態結和蔣經國結的鬆解，相反地，它們好像使這兩個結結得更死、更牢。更遺憾的是，它們使國民黨在台灣統治越加壓制，越加暴虐，使台灣的政治氣氛充滿憂鬱和沮喪、不安和錯亂。「亞洲人」把它叫做「國民黨的憂鬱症」。

這個暴虐性的憂鬱症，從去年底的江南謀殺案到今年年初的十信弊案，從去年中旬俞國華的上台到今年中旬蔣彥士的下台，從去年六月間開始瘋狂查禁黨外雜誌到最近省議員被迫集體辭職、雷渝齊因「誹謗」關中被罰重款、判一年徒刑和褫奪公權二年、施性忠「貪污罪」確定判刑和二失新竹市長寶座和邱義仁、黃天福、石佳音等人因洩露「機密文件」(台灣警總的雜誌審查文件)被捉，處處顯示了這個國民黨憂鬱症的可怕強烈殺傷力。

還有，「民衆日報」因為刊登了一則趙紫陽談話的新聞和一則國民黨旅美將領希望廢除戒嚴法的談話，就被國民黨以「爲匪宣傳」之嫌被停刊七天，這是國府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停刊報紙，明確顯示台灣的言論、新聞自由在開倒車。今年五月間，香港的「百姓」雜誌的發行人陸鏗訪問胡耀邦，胡說中共暫時打不了台灣，但不能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以免讓在台灣的國民黨睡得太安穩。這話一講完，國府馬上緊張兮兮，又是軍事演習，又在台中、高雄、台北一連串地舉行臨時演習，真的就枕戈待旦起來了。這半年多來，台灣真的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都是中共和談統一攻勢惹的禍。總之，一切跡象顯示，蔣經國和國民黨政

權現在是愈老朽愈反共、愈保守、愈不可能接受中共的和談建議。蔣經國結是更解不開了。

不只是如此，更嚴重的是，惡性循環似地，蔣經國和國民黨目前在台灣的統治，愈來愈嚴厲、愈暴虐，他們就一定愈來愈失去台灣一千九百萬人民的民心，中共想經過國共兩黨的談判來達到統一中國的目的，就愈來愈不可能注意和照顧到台灣人民的意願，這樣的統一程序也就愈來愈失去台灣人民的民心，愈不會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台灣結也就會愈結愈緊、愈死。

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邵玉銘，最近在美國權威性的「外交」季刊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從台北看中華民國前途」的論文。文中，這位國民黨的「第三梯次」精英說：

「中華民國也不能與中共進行任何官方談判。台灣的內部政治是微妙且易起對立的，因此任何與中共談判以解決台灣前途的行動，將即遭致民衆反對。雖然台灣人民歡迎一個統一的中國，但這必須基於他們的條件而非中共所提出的條件。只要中共仍是共產國家，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共的任何談判都會是一種自我的毀滅。」

## 新機

今年一月，中國台聯的機關雜誌「台聲」發表了「一國兩制，台人治台」的論點，提到統一後應給台灣本省人民自治的機會。因為這個「台人治台」的主張不容於中共當局，這份刊物出版後隨即收回重印，把這篇提出「台人治台」的文章抽掉。

從中共的拒絕「台人治台」，到國民黨近日常強調的「台灣人民反對與中共談判」，台

灣人民的「民意牌」大概都只是國共政治鬥爭中可取可丟、可重視可忽視的籌碼。

不過，不管國共兩黨的決策者是多麼的馬基維利主義者，就像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態之爭，他們一定還先要回到「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主義的基點上的。

鄧小平說，中國在這個八十年代要做三件大事，一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是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三是加緊經濟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他總結地說：

「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自己經濟建設成就的大小。……：：：：台灣歸回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政治上和經濟制度上比台灣優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歸根到底，都要求我們的經濟建設搞好。」

鄧小平給這個現代化經濟發展訂下的日程表是：「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再發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爭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

這個發展計劃，是香港「一國兩制」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制度不變的理論基礎之一。香港「一國兩制」的政經模式，去年十二月簽署的只是「紙上談兵」的一張藍圖，一九九七年以後要實踐五十年，才能「實踐檢驗真理」地驗證它的可行性、正確性。

所以，鄧小平的八十年代祖國統一的大任務，明顯地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構想。實事求是

地來說，要在鄧小平和蔣經國有生之日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大概是沒有太大希望的。

在國共半個多世紀的不斷對立鬭爭的複雜歷史環境下，現在要達到中國統一的目標必須要做的事件實在太多了。這件龐大的歷史任務，即使是動用了中國、台灣和海外的所有中國人的腦力，以最大的集思廣益的智慧運作，來解決因結、尋找答案，恐怕也找不到一條海峽兩岸政黨、政府、人民都可以接受的大一統的統一模式。

八十年代後半期，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統一模式一定不會被蔣經國接受，也不可能被蔣經國死後的國民黨政權接受。不過，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從這個模式的基礎上開始，有心人也許還是可以集思廣益地思索、尋找、衍繹出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來。

要這樣做，維持並進一步加強增長由香港九七問題的初步解決而順勢造成的統一趨勢，中共是不能固守已見、堅守目前因結重重的「一國兩制」的和談建議的。中共更不應該因為一再碰壁、不見國民黨有任何動靜，就揚言「不放棄武力解放台灣的權利。」鄧小平應該再擺出大家作風，順勢修正現在行不通的統一模式，實事求是，一步一步實實在在地尋求突破。這樣才能「涓水成洪，水到渠成」，造成更大的民心向背、更大的統一潮流。

當然，要如何尋求突破、如何推動統一趨勢，問題是千頭萬緒，非常困難的。這需要動用所有中國人的大智大慧、群策群力的努力，才能做得到、做得成。

雖然對中國統一的問題，我已思考研究了二十年，但是我還是沒有想通、想到一條如何突破目前統一因結的可行途徑。這裏，我只想



蔣經國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鄧小平却說它「不現實」。

提出一點意念、一個片面的構想，供有心人參考揣摩。

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共產黨主張共產主義，國民黨當政的話（比如在台灣），應該大力推行三民主義的原理原則，共產黨當政的話（比如在中國大陸），應該嘗試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在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內，是一個正常的政黨政治運作程序，大家都應該可以接受的。

但是，蔣經國的政權是一個黨政不分的政權，國民黨就是政府、國民黨就是國家。鄧小平的中共政權也是一樣，國家憲法裏面就寫得清清楚楚，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黨就是國家，黨就是政府，黨政不分如同同一轍。所以，「三民主義，吾黨所宗」變成國府的國歌，他們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所以，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共產黨專政的「四個堅持」是

國家的憲政大法。

都是黨政不分，都是違背政治現代化、政治民主化最基本原理原則的專制政治制度。

所以，鄧小平提出的「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的兩黨平等談判以達到國共兩黨「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和談統一建議，根本是空中樓閣、不切實際、無法實現的政治諾言。蔣經國一定不能接受。

所以，蔣經國要求鄧小平放棄四大堅持，鄧小平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根本「不現實」。當然，兩位先生恐怕都不清楚廣大中國人民夾在這個意態死結裏面究竟要什麼。

要達到兩黨（其實應該包括其他民主政黨的多黨）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理想目標，最基本地，中共現在大肆推展的現代化運動中一定要加上一個政治現代化的課題，一定要根本地實行「黨政企」制度和功能都明確分離的政治制度。起點就是，「四大堅持」可以寫在中共憲法的目的章程裏面，但是一定不可以寫在中國國家憲法的基本大法裏面。進一步地，中國國家憲法裏面應該寫清楚，維持和保證多黨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權利，更重要的是要給與所有政黨合法取得政權的憲政權利。

在這個憲法下面，國民黨可以宣揚三民主義，共產黨可以宣揚馬列主義。政策得民心的話，國民黨可以繼續「統治」台灣，共產黨可以繼續統治中國。鄧小平說的對：

「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誰也變不了。因為這些政策見效、對頭，人民都擁護。既然是人民擁護，誰要變人民就會反對。」

只要政策見效、對頭，人民擁護，共產黨可以在中國當政一百年、一千年，可以推展它



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策一百年、一千年。在保證多黨持久合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輪替當政的憲法下，政策見效、對頭，人民擁護的日本自由民主黨已經安穩地執政三十年了。看樣子，它還可能繼續執政三十年。誰能說日本不民主？

## 結語

下一屆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應該行使主權在民的基本權力，把「四個堅持」從中國國家憲法裏面取消掉，寫下中國是一個真正民主憲政政治體系的國家，人民有權利信仰不同的政治意態、擁護不同的政黨，政黨一律平等，都有權利經過人民選舉的民主程序行使政權、治權，推展自己相信的政策。

這樣，鄧小平的兩黨平等談判、和平統一中國的建議，才能取信於人。

這樣，雖然恐怕還是不能導致蔣經國的接受鄧小平的和談建議，但是中國統一的大業可以突破性地進入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境界，可以獲得更廣大海內外中國人的支持和擁護。統一的前途才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在這麼一個大刀濶斧的幾個筆劃之間，中國統一事業中的困難重重、錯綜複雜的蔣經國（國民黨）結、台灣（人民）結、意態結和其他經濟、政治結，好像突然變得不再那麼死牢，不再那麼嚴重、難解。

一張寫在白紙上的憲法，可以有那麼大的「法力」，可以創作一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的機緣，不知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世界賢能能否同意？就此請教。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澳洲昆大

## 文藝園地

### 爲那些我永遠

### 愛着的人們

無聲集

艾菲

(四)

我的心兒在流血  
流，流，不停地流  
又有什麼能使它止住  
我要訴說這可怕的痛苦  
說，說，不停地說  
却沒有人能聽到我的傾訴  
我要狂飲這滿杯的美酒  
喝，喝，不停地喝  
用酒精來麻醉我的肺腑  
我要走到那遙遠的地方  
走，走，不停地走  
一直去到我的歸宿

(五)

我在這海邊的沙地上  
用手指寫下我深深的思念  
我面對這寧靜的大海  
把你輕輕呼喚  
你從海中慢慢升起  
帶起我光明的溫柔  
我也將用最美麗的詩章  
虔誠地獻到你的面前

(六)

我永恆的愛人  
你在那兒  
爲什麼你還不走  
在那神秘的天堂之門  
在那輝煌的白晝  
在那漫漫的長夜  
在那靜靜的黃昏  
我等待你的默許  
我祈禱你的來臨  
我渴望你的安慰  
我乞求你的吻親  
我愛你  
用着整個生命的狂熱  
用着人類靈魂的痴狂  
可你在那裏  
我永恆的愛人

(七)

朋友，快！  
快把我的斗篷拿來  
就是那件黑色的斗篷  
朋友，快  
快把我的馬兒牽來

(八)

就是那匹黑色的駿馬  
朋友，快  
快把我的長劍取來  
就是那柄黑色的長劍  
我要在這黑色的夜裏  
策馬穿過黑色的森林  
那兒有一所黑色的小屋  
住着我那黑眼睛的愛人  
只有在這黑夜的夜裏  
我才是一個自由的靈魂  
一到黎明時分  
我就變到醜陋和愚蠢  
我將被綁在魔法的椅子上  
不能離開堡壘的大門  
可我每天都在盼望  
那月亮升起時辰  
因爲只有在這美麗的時刻  
可以去看望我那黑色的戀人。

(未完待續)

# 爲國共和談問題致 蔣經國先生書

(中國大陸研究生·歐洲) 王 策

經國先生閣下：

余一介書生，負笈海外，本當埋頭求學，無驚他事。但國事多艱，有使人未能安心者在，故人微如余，亦不揣冒昧，爲先生試一陳之。竊念國共之關係問題，實爲我國當代政治上之一大癥結。自北京拋出和談之議，該問題更形急迫。如何策應，則關係黨國及我中華民族之前途，凡我炎黃子孫，可不深慮之乎？先生現在所持之「三不」政策，竊以爲非變通之計。當審時度勢，掌此時機，化被動爲主動，操和談以爲我用，方爲上策。

國民黨人堅持不與中共和談，實因鑒於前二次之國共合作，皆中了中共統戰之謀，爲其所利用而大受其害，遂對第三次之國共合作抱堅拒之心。愚以爲此種心態實由於未能審時度

勢而起。前二次之國共合作，皆被中共所利用是事實，而此次則當被國民黨所利用矣。

何以言之？大抵說來，作爲實力較弱之一方，能通過和談合作而得到無法通過軍事手段而獲取之好處者，即爲該舉之受益者。試觀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由中山先生一念之差而鑄成大錯。原因是中山先生在與軍閥之鬪爭中力不從心，以致病急亂投醫，希藉蘇俄共產國際之助，以削平軍閥。故起用鮑羅廷，實行國共合作。當時之國民黨，已是發動辛亥革命，推倒滿清王朝，擁有二十餘年光輝歷史之一大政黨。而中共則成立只有三年，人員不過數百，尙處於秘密階段，未成氣候，一旦與國民黨合作，得以附驥，聲勢大增，則儼然成一公開之政黨而迅速發展壯大矣。此乃國民黨第一次造成

共產黨之局面也。第二次國共合作則出於兵變，被迫接受。當時共產黨人經二萬五千里之轉移，到達陝北只剩數千疲殘之軍，以國民黨當時之兵力，不難圍而殲之。怎奈任用非人，使張學良變生肘腋。經西安事變，中共之地位再次轉爲合法，軍隊被編爲抗日部隊而得到給養。中共亦得以高喊抗戰口號，擴大地盤，坐收漁利，終養成其併吞大陸之勢。此前二次之國共合作，國民黨作爲強者反受弱者所利用，自爲失誤。而現在之勢，主客易位。國民黨自退據台灣彈丸之地，再經退出聯合國，國際之境日艱，內部更有台獨之憂，是以總體上共強國弱之勢已判，欲以軍事手段重返大陸，勢難能夠。而和談合作，恰恰爲國民黨提供了和平重返大陸之可能。故曰：使共黨爲我所用，此其時也。

雖然，弱者何以能用強，殊非常識所能理解，其理何在？則曰：共黨前二次之受益，雖出於偶然之變，而其中實含必然之勢。何者？以共黨之得民心也。得民心者，由弱轉強；失民心者，由強變弱，此乃必至之理也。當時正值國家多難，軍閥混戰，外族入侵之際，國民黨出師已老，且政事多誤，人民寄希望於新生力量，實盼中共能導中國於民主富強之域，而中共亦以此爲號召，使中共由弱而轉強，豈偶然哉？而今歷史却走向反面，共產黨人在大陸經三十多年亂哄哄之治，鬧得民窮財盡，而誅伐殺戮，有過於暴秦之季世，昔日之理想已成畫餅，中共自己亦驚呼「三信」危機，可謂民心失盡。相反，國民黨自退據台灣，改弦更張，勵精圖治，成績斐然，經濟上躋於亞洲五強之列，建設有方，竟使中共亦提出經濟學台灣之口號。由此觀之，民心在台而不在共也。當此之時，國民黨得民心之所向，操經濟之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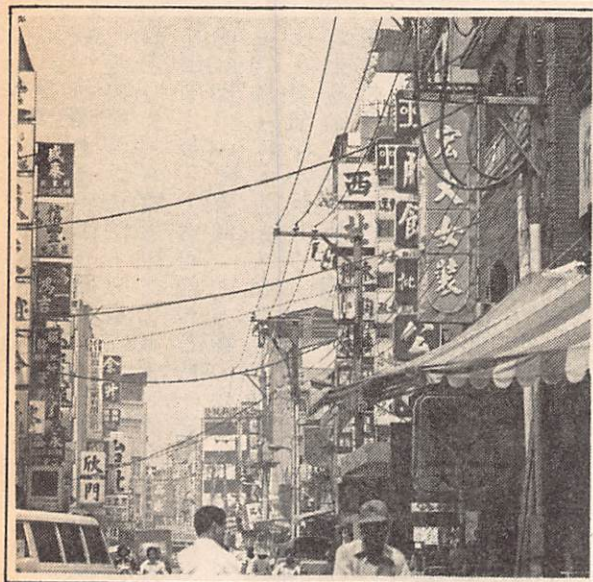
，以之與中共談判，又有何懼？共黨貌似強大而失民心；台灣雖小而能得民心。正是此一時，彼一時也。「過秦論」所謂「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中共想重施故伎，恐統戰者反爲人所統矣。苟能見微知機，深察盛衰消長之理，則此時不談，更待何時？

國民黨人尙有一說，謂漢賊不兩立，故不能與中共談判，此說亦甚無謂也。漢賊既不兩立，王業豈可偏安？本此一念，故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岐山六出，併日而食，以至星殞五丈原頭，雖死而猶雄。反觀黨國之軍，自退據台灣，三十多年何曾有討賊之舉？豈爲運移漢祚，夏小康失一舉中興之旅；天佑共運，國民黨無二次北伐之師？實乃缺激勵奮進，決一死戰之心耳。當中共三年困難，十年內亂之時，台灣擁百萬之雄兵，自可渡海一戰，舉弔民伐罪之旗，揮師北上，與中共決一雌雄，當此之時，則鹿死誰手，亦未可知。奈何逡巡不前，坐味先機，使大陸之民，陷於水火，三十多年被中共暴政餓死、殺死、磨死、鬪死者數以千萬計。是乃赤手空拳之民，猶思奮起和暴政一搏，而擁重兵，饒資財，號稱復興基地之台灣，竟不思援手一救。自此觀之，黨國之負國人多矣。自甘退縮於海隅，豈不念以諸葛之能，猶恐以一州之地，難以與賊持久。台灣自聯合國退出亦十多年矣，事至而今，談又不談，打又不打，堅持「三不」，在在被動退縮，懲羹吹葷，一致於斯，豈不令人嘆息無窮！

台灣今後政治之前途，若有所作爲，恐難再長此維持也。察其與中共之關係，近數年內，一則爲談，一則爲打，長此相持，未必能夠。中共既已提出八十年代爲解決台灣問題之界限，到時須得有所交代，不能不了了之。台灣堅持不予理睬，中共難以下台，未必不會先

採取一些如封鎖台灣海峽之類之軍事行動。到此地步，則台灣何以自處？是談是打，抑或是再忍，先生已有成竹在胸乎？如認爲中共必不會動武，則所恃何在？中共是不敢打乎，抑不忍打乎？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台灣有何後援？美國之第七艦隊已一去不返，而蘇俄更不可與之聯手。中山先生一生最大之錯誤在於聯俄，將蘇俄共產之禍水引進中國；而毛澤東一生最大之功績在於與蘇俄交惡，使中國危陷東歐之境，尙留一線生機，歷史之誤會往往如此。先生所持不苟且聯俄之策，深可敬佩。美蘇既不足恃，而台灣份子又蠢蠢欲動。台灣如走獨立之路，則台灣省者，台灣人之台灣也。加之中共亦不允許，勢將釀成混戰之局。國民黨在政治上可謂是腹背受敵，一旦有變，恐慈湖暫厝

國民黨可拿在台灣的經濟成就作為談判籌碼。  
圖為台北市的繁華街道。



之地，亦非復吾有矣！「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太史公謂之爲不通春秋之義。國民黨人處此危急存亡之秋，政治風雲，譁變無常，而猶抱一動不如一靜，以不變應萬變之信條，實爲危險。豈不聞樹欲靜而風不止，不變焉能應萬變？

爲今之計，亦只有接過和談之球，積極與之周旋，尙可因勢利導，出逆境而入於坦途。一則和談一開，中共即失去動武之口實。退一步說，即使中共和談是假，意在吞併，或繼之以動武，此時則其曲在彼矣。台灣之軍民必將更加同仇敵愾而與之一戰。第二，由於談判，國民黨政府在台之地位更爲穩固，偏安之局，結束有望，台灣終將與大陸聯成一體，對台灣運動無異是釜底抽薪。以堅強之大陸爲後盾，則台灣自消。第三，在國際上，相信亦可打開一些外交困境，既然台灣最終將成爲整個中國政府之一部份，與台灣加強一些關係，中共亦不便強加壓力。

此數者，尙是眼前之小利，更重要者則是國民黨以退爲進，通過和談合作而得以和平重返大陸，而謀開中國未來政治之新局，此乃百年之大計也。至於如何談法，如何返法，國共兩黨之合作對中國未來前途當起何種之影響作用，則爲今後之大政方針，關係中華民族子孫後世之福，容當再試一論之。

觀台灣今日輝煌之成就則爲經濟，俗謂揚長避短，既然軍事上或政治上一時難以重返大陸，何不提出在經濟上先返大陸爲口號更爲現實，且必將被中共及大陸人民所樂於接受。大陸上現在急於同台灣合作，除政治上欲實現統一之夢外，未始沒有利用台灣之資金及技術以促進大陸四個現代化建設之想。台灣之所長，正爲大陸之所短，可謂一拍即合，其受歡迎之

程度將有甚於風靡大陸之鄧麗君歌聲。台灣當局可先以通商及經濟、技術合作為談判之出發點，允許公私企業同大陸展開貿易、投資及提供技術協助。大陸現在之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為這種經濟活動提供了可能。台灣正可利用自己獨特之條件，進入正待開發的大陸市場，既可為台灣閑置之資金找到出路，亦可通過貿易刺激台灣自身之經濟發展。也許台灣某些人士會認為向大陸輸出資本及技術是「假寇兵、資盜糧」，持此種論者，其目光實為短淺。殊不知經濟上之交流合作，既可收大陸之民心，更可促進其政治上之變化。私營自由經濟之發展，必然引起政治結構之進一步改革。現實之益處，當比任何動聽之宣傳更具說服力。要中共改變其政治原則，自非一夜之間所能辦到，須得有一個對之施加影響之過程。途徑即在於通過經濟之自由化以導致政治之民主化，從而為國民黨在政治上重返大陸，實行國共兩黨之全面合作打下基礎。

台灣人士尚有一說，以為大陸比台灣落後，需待大陸之經濟建設達到台灣水平時，始可與之談判。殊不知到彼時台灣對大陸還有何價值？試問大陸上如經多年之改革建設之後，一切都很進步，還要請你國民黨來幹什麼？台灣之地位既無足輕重，連手中經濟實力之籌碼亦已失去，當此之時，則持何物以為談判？且台灣對大陸之落後，亦應負相當之責任，現在若能援助大陸建設，亦可稍贖前愆。大陸之人，亦中國之人也，豈可坐視不顧，自絕其恩義！何況經濟合作，亦非單方面受益，其理甚明。台灣當局捨大規模投資貿易之機會而不用，竟感興趣於節日期間，用汽球飄幾口袋所謂「救災物資」過去，如此兒戲之舉，焉能救大陸十億之民？與其坐待大陸之改變，不如積極促成

其改變也。

經濟上之合作先應積極展開，而政治上之統一則須暫緩一步。國民黨人自當拒絕接受標明四個堅持之憲法。只有待中共廢除此四個荒謬之堅持及有關思想文化專制之條文，實行民主改革之後，方有可能實行統一之治。中共目前所提「一國兩制」之方案，余名之為「瓜分式之統一」，看起來似乎是中共對國民黨之寬大，實質上不過是中共欲維持自己在大陸上之專制統治，不容他人插手耳。所以「一國兩制」雖掛起統一之招牌，其實仍為國共兩國瓜分國土，各自為政之假統一，非廣大人民所指望之真統一也。真統一者何？則曰：當效法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之聯邦代議制，實行兩黨或多黨之代議政治，和平共存，民主競選，此方為「合作式之真統一」。此統一者，民主之統一，而非專制之統一也。

嗟余小子，不惜喋喋不休，豈徒好逞口舌之辯哉？實對國共兩黨均抱有厚望也。念吾近百多年來之中華民族歷經禍亂，災難重重，走過許多彎路、錯路，而現在又面臨一個歷史轉折關頭，走向和平民主之治世，抑或再走向戰爭專制之亂世，與國共兩黨今後之動向息息相關，差之毫釐，失以千里，可不深察其變而導之乎？中國大陸經多年之動亂挫折，中共內部已出現一批較開明之改革派，正在嘗試探索一些新的方向，在經濟上已邁出一些可喜的步伐。與此同時，廣大人民亦已覺醒，群眾性之民主運動正方興未艾，此乃中國未來政治變化的個十分難得之轉機，支持並促使這一變革運動向深層發展，關係到中國今後之命運。對於國民黨人而言，既不能從根本上消滅中共，亦只能走將其改變之一途。欲其改變，須加影響；欲加影響，須與和談；和談之最佳門徑則為

經濟合作。以經濟促政治，以合作代對抗，化一元為多元，導極權為民主，使中共能從根本而改變之，成為現代化之民主政黨，則何必要消滅之？國民黨人正可操此時機，具大眼光、大魄力，以入地獄之精神而行此非常之事，毅然與中共展開談判。以國民黨目前之實力，能持此方針以進行之，對於大陸未來之政局，定可產生不可估量之影響。

中山先生曰：「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此潮流者，民主之潮也。國共兩黨均以中山先生民主革命之繼承人自居，自應以實現中山先生所指望基於直接民權之民主憲政而努力。國共兩黨與中國人民淵源甚深，而兩黨之爭，亦給人民帶來極大之痛苦。而今以後，若能順於潮流，應於民心，消釋前嫌，共商國是，隨着經濟合作之展開，敵意之消除，諒解之加深，政治教條之突破，及其他民主政治勢力折衝斡旋其間，遵循理性之指導，摒棄一黨專政，由權而返經，最終走上真正合作之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類似美國之民主、共和或英國之工黨、保守黨之兩黨作用，以奠定今後中國多黨民主政治之局，是為國共兩黨之榮，亦吾中華民族之幸也。

「深慮論」云：「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豈當局者迷而旁觀者清乎？國民黨人處當前之勢，何者為難，何者為易，亦不待余再多言也。嗚呼！難得者，機也；易逝者，時也。值此中華民族命運轉折之時機，先生其有意利用之，促成之，為黨國謀前途，而為萬世開太平乎？

臨書神往，無任惓惓，區區之意，伏惟垂察！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夏至）  
中國大陸研究生王 策謹上

# 檢驗新封建專制

## ——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大陸學者·美洲）秦修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六年前中共改革派用這個口號，擊敗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派，把毛澤東的第三個接班人拉下了馬。

專制的獨裁者，歷來都是難以爲繼的。毛澤東先後囑託過的兩個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都以「非正常性死亡」而未接成班。華國鋒在毛澤東臨終前，得過「你辦事，我放心」的遺囑，於是聲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無奈這「兩個凡是」既少教條墨水，又缺槍桿支持，因而華國鋒被迫啞口無言和乖乖地下馬，其下場自然勝於沉戟沙州。

但是，自中共改革派剛批倒「兩個凡是」論後，就立即提出「四項堅持」原則，而不再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而且，這「四項堅持」還迫不及待地寫進了一九八四年的新憲法。

憲法乃國家之基本大法。雖然任何憲法都不能像毛澤東的「指示」和「決策」那樣在中國雷厲風行地推行，但這部憲法中的「四項堅

持」基本原則，顯然要求人民「堅決擁護」和「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無異於將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改成了改革派的「四項凡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論是「兩個凡是」還是「四項凡是」，假如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就只能是一「半真理」、一「非真理」、或「假真理」。

### 中國傳統封建專制的高峯

任何形式的專制政權，爲了維持其統治，都要尋找合法統治的「依據」。

古代封建專制帝王，自詡「受命於天」，或「君權神授」。這自然是製造神話。改朝換代的君主，有的直言「乃夫馬上得天下」（劉邦），有的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幟。前者憑靠赤裸裸的武力，後者借助於夾有理想的口號。諸如「解民於倒懸」，「推倒三座大山」等等。現代的武裝政變或軍事獨裁，則往往藉口「國難當頭」，「掃除貪官污吏」，或「擒拿萬惡的四人幫」等等。

中共取得政權，自稱是依靠三大法寶，即「武裝鬥爭，黨的領導和統一戰線」。「武裝鬥爭」與「乃夫馬上得天下」，都是「槍桿子裏出政權」。中共的統治依據，當然不能說是「受命於天」，但中共却強調共產黨的領導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中共的宣傳當然也不會說它的統治是「替天行道」，但中共却矢志不渝地在「替馬列主義行道」。

這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據說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按照馬列主義的理論，人類社會的發展，最後必由無產階級，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產階級，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共產黨，作爲無產階級先鋒隊，而共產黨員，作爲「特殊材料製成的人」（斯大林語），就義不容辭地成爲社會發展的這個最後階段的統治者。

「受命於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替馬列主義行道」——這裏面，既有黑格爾「宇宙精神」化身的玄學色彩，又有馬列「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幻影。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彷彿在自己頭上佈着一道靈光，不但理直氣壯自命爲在中國替馬列主義行道，而且儼然以全



毛澤東利用一部分人民去專另一部分人民的政，這就是新封建專制統治者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

世界馬列主義的衛道者自居。

馬列主義在中國，已被譯成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所謂「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但是，這個「外為中用」的「中西合璧」，在許多方面，實際只是中國傳統封建官僚專制的延續。一百二十年前，洪秀全曾在西方基督教與中國封建專制實踐「相結合」之中，託言受命於「天父」「天兄」，自稱「天王」，建立太平天國。四十年前，毛澤東在《沁園春》中明志，浩嘆「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於是，立下豪言壯語：「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澤東的思想行為浸透着封建帝王的專制

心理。文化大革命以前，曾見他處心積慮地為秦始皇、曹操和武則天翻案。在廬山會議上，只見他手持《資治通鑑》，責人勿像燕太子一樣心懷鬼胎。文化大革命中，更見他一面利用江青作亂，一面低聲囑咐「呂后亂政」。

毛澤東貪圖帝王霸業，不能沒有文武百官的簇擁扶持，也不能沒有億萬百姓的高呼萬歲。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閉幕時，果然出現了瘋狂「效忠熱」：舉國忙祭「忠字門」，忙掛「忠字旗」，忙立「忠字牌」，忙跳「忠字舞」，家家戶戶「早請示，晚彙報」……

從歷史的縱的線條看，毛澤東的封建官僚專制，可說是超過不少中國的封建帝王。他的《沁園春》結句，似可改為：「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毛朝！」

### 世界集權專政的魁首

毛澤東的封建官僚專制，是新的封建官僚專制，也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定名，至今仍為中共所「堅持」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新的封建官僚專制，雖與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一脈相承，却集有二十世紀集權政體的許多共同特色，例如：

(一) 信奉一套被視為「永恆真理」或「最高理想」的教條，如像「國家至上」、「種族至上」或「共產主義」等等。所有不信奉這些思想意識教條，或持有略為不同的政見者，皆被視為異端邪說，屬於鎮壓之列。

(二) 匍匐拜倒在一個至高無上，近乎萬能的領袖腳下。領袖的稱號，可能是元首、導師、統帥、舵手……，多多少少，都像奧爾威爾《一九八四》筆下的「老大哥」。

(三) 一黨專政：這個黨具有鐵的紀律和軍事化的組織。黨員都是「階級先鋒」、「民族精英」和各式各樣的「社會先進」，但同時也都是「革命的螺絲釘」和「黨的馴服工具」。

(四) 專政範圍，無所不包。從生產到消費，各行各業，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活動，都在黨的監督、控制或領導之下。

(五) 專政的對象是每一個人。血緣、地緣的紐帶，如家人、朋友、同鄉、同業、同道的人際關係，如同學與同事，都在專政的監視之下。所有自發、自願的結合和組織，也都受到專政的管制。個人既被孤立、分離和限制成一個無力的原子，只好孤零零、赤裸裸地站立在領袖和黨的面前，說什麼：「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沒有黨，就沒有了一切」……

(六) 專政手段：隨着科技的日益發展，通過廣播、大喇叭、有線和無線電，通過各種交通工具和新聞、出版、電影、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加上公、檢、法和武裝部門的一切尖端器材技術，專政幾乎可以伸入和囊括全國的每一角落。

(七) 全民動員。人人必須參與政治，甚至全民皆兵。反對集權專政，當然絕不容許。但也不讓置身事外，或具有非政治傾向。學習和運動的目的，在於造成輿論一律，興趣相近，式樣相仿，意見統一，直到所有的人都改造成領袖所刻的模式。

(八) 專政的獨裁者，為了維持其統治，騙取人民的擁護，也會給予人民某些福利，提出某些振奮人心或轉移視線的目標和口號，但是集權專政的運作，既然全憑領袖隨心所欲，又依領袖獨斷專行，政策的擬定與執行就很難穩定。同時，由於集權專政的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勢必經常引起暴亂。

在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之前，共產主義的集權專政已有蘇聯的斯大林模式。非共產主義的集權專政，有過德國的希特勒模式。兩者的集權專政，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上述八項特色。從橫的方向比較，中國的經濟發展固然落後，毛澤東的新封建專制——人民民主專政——却是廿世紀世界專制中的魁首。在專政範圍之廣，程度之深，以及專政手段之現代化各點上，中國比之蘇聯的斯大林和德國的希特勒，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 新封建專制下的

### 「人民」與「反動派」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任何政權所不可缺少的兩個互相對立統一的組成部份。在歷史上任何朝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決定了政權的性質。毛澤東的新封建官僚專制的最根本特點，就是首先依據馬列主義，確定共產黨是理所當然、不容辯駁的統治者。然後，將被統治者一分為二，分為「人民」與「反動派」。接下去，又將統治手段一分為二，分為「民主」與「專政」。於是，按照毛澤東的定義：「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四八〇頁）。

在人民民主專政下被統治者既被分為「人民」和「反動派」，檢驗毛澤東的新封建官僚專制，就不能不看：（一）三十五年來，中共認為誰是「人民」，誰是「反動派」？兩者之間，是依據什麼標準區分的，實際上又是怎樣區分的？（二）三十五年來，「人民」在毛澤東的新封建官僚專制下，究竟得到什麼「民主」？專政範圍，是否僅限於所謂「反動派」？「人民

」與「反動派」實際上是否同屬專政對象？

誰是人民？依照毛澤東的說法，在不同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內容。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一九九〇年以後的中國，「在社會主義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和社會階層，都屬於人民的範圍。」（《辭海》一九七九年版，上卷，六九二頁）

「人民」，按說永遠都必須是人口的絕大多數。「人民」的對立面，「反動派」，按說永遠都只能限於人口的一小撮。否則，就無法實行多數對少數的專政。但是，在實踐上，「人民」的範圍擴大，就使「反動派」的範圍縮小。而「反動派」範圍擴大，就必然使「人民」範圍縮小。檢驗中共三十五年來統治，究竟是「人民」的範圍，還是「反動派」的範圍，在日益擴大呢？

先查一查「反動派」的花名冊。一九四九年以來，「反動派」先包括「地、富、反、壞、右」。接着，這個「黑五類」不夠收容日漸增多的「反動派」，於是擴充為「黑八類」——「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間，「反動派」的範圍又擴大，增加「臭老九」，以及一切屬於「橫掃」之列的「牛、鬼、蛇、神」。但是，「反動派」的人口激增，並非到此了結。隨着所謂「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階級鬥爭」日趨激烈，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之外，又添了「保皇派」、「裏通外國的蘇修派」等等名目。這樣，在「反動派」日益擴充下，「人

民」的範圍自然縮小。

劃階級、定成份，是中共新封建官僚專制的新的統治手段。從農村到城市，從生產隊、公社到工廠、礦山，從軍隊到機關，從人民團體到所有企業單位，從學校到科研、文化機構，從街道到居民委員會，……真可謂「天網恢恢，在劫難逃」。家庭出身與個人成份，是人民民主專政貼在每一個「人民」和「反動派」身上的永不褪色的標籤。這種標籤，加上與日俱增的個人檔案袋，在絕大程度上，決定每一個「人民」和「反動派」一生的命運。

在中國過去兩千年的封建專制下，除了依靠科舉功名或裙帶關係升官發財外，家庭出身主宰着一個人的貧、賤、富、貴——「世為工者恒為工，世為農者恒為農」。在過去三十五年的新封建官僚專制下，除了「入黨」或「攀親」，一個人在教育工作和生計上，也沒有多少動彈餘地。而且，血統和世襲論，比在古老的封建專制下更為盛行。因此，作為特權階層的統治者，竟敢說：「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

不過，劃階級，定成份雖然攸關着廣大「人民」和「反動派」的身家性命，新封建專制對統治集團內部却並非唯成份論者。中共的高層領導，就從不奢談自己的階級出身或個人成份。一九二〇年代，在莫斯科受共產國際栽培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與工農出身根本無關。毛澤東本人家庭成份，說成「富農」猶有些「欲抱琵琶半遮面」，實際至少是個米商兼小地主。至於劉少奇和鄧小平，只聽說家庭擁有大量土地，還不見有「產業工人」或「貧農出身」證明。

同時，當階級鬥爭或爭權奪利趨於激烈，

在中共高層統治集團的內部，「人民」與「反動派」之間的界限也十分模糊，大權在握，必自稱「人民」。爭權失敗，必被打成「反動派」。例如，貴為國家主席和黨的副主席的劉少奇，在文革中失權，一夜之間就淪為「叛徒、工賊內奸」，比一般「反動派」還要十惡不赦。今天握權的中共改革派的高層領導，幾乎沒有一個沒有上過「反動派」的花名冊。但是，階級鬥爭或權力爭奪勝負改變，所有的人盡都官復原職，且有升遷。

權易勢轉，由「反動派」榮歸「人民」的另一例子，是有國舅之稱的王光英。當劉少奇倒台時，王光英少不得屈居「牛、鬼、蛇、神」。一旦劉少奇恢復名譽，王光英立即被「人民」委以要職，榮任香港「光大」與「紫光」公司的經理。社會主義革命，據說已將生產資料收歸公有。王光英不費半文投資，却榮膺南方第一財主。



權易勢轉，王光英今日又成了南方第一財主。

權移勢轉，「人民」與「反動派」换位，也讓一些新封建專制統治集團之外的人叨光。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曾被咒為「美帝國主義」反動頭子，比任何「反動派」都要反動的尼克森，不出二十年，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

地被迎為舉國上賓。更為突出的是，曾被視為「美蔣反動派卵翼下的」台灣同胞，不出三十年，由於統戰需要，早已作為「人民」貴客，紛紛被請回國探親、觀光、通商、講學、著書、立說——凡事皆有優先，包管免費或減價招待。

嗟呼哉！在新封建專制下，依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人民民主專政下，「人民」與「反動派」相差幾許！

### 新封建專制下的「民主」

「人民」，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民主」的對象。「人民」，根據毛澤東的理論，在人民民主專政下，是「當家作主」的。

中共建國以來，共有四部憲法。從一九七五到一九八四年十年間，換過三部。光從這些憲法的字面上看，新封建專制下的中國已是一個民主國家。非但是民主，而且是優於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因為這些憲法並不會提供法律依據，去允許在全國大搞「鎮反」、「肅反」、「鳴放」、「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等一系列的運動，甚至發動文化大革命。憲法條文，沒有說可以實行「打、砸、搶」、「抄家」、「奪權」、「游鬥」、「坐直升飛機」、「設牛棚」、「用私刑」。在行政制度上，憲法並不會規定要用「批、鬥、改」的程序，去擬訂和推行政府的政策。在人事制度上，憲法更沒有容許「搞黑材料」整人，或設「專案小組」，「內調外查」，坑人一辈子的。

顯然，中共三十五年實踐所有的，憲法大都不提。而中共三十五年實踐所沒有的，憲法

却偏偏大談特談。換句話說，新封建專制行的是另一套，憲法講的是另一套。憲法上說，人民當家作主。實際上是共產黨當家，人民作不了主。

最奇怪的是，毛澤東在「大躍進」之後，曾自嘲「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在文革之中，又告訴斯諾，說自己是「和尚打破傘，無法無天！」這位新封建官僚專制的統治者，當然是無法無天。但是誰能相信，這個自稱「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竟是一九八四年中共新憲法所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

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的試金石之一。中共新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下面是中共改革派對這些自由的解釋：

黨與國家十分重視公民的這些自由，不僅在憲法中作了明確規定，而且還提供了物質保證。國家大力創辦了各種報刊雜誌：以保證人民行使這種自由。」（《憲法講話》王叔文等等，一九八四年版第一七一—一八頁）

真的毛澤東認為言論、出版等等自由極其重要嗎？請看看在毛澤東的專制統治下，有過多少文字獄？從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到一九五五年胡風入獄，到一九五七年的鳴放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千千萬萬文字獄，還不夠說明新封建專制的踐踏言論出版自由嗎？今天，魏京生、王希哲、劉青、徐文立等人正在蹲文查禁，表明中共改革派的憲法仍是一紙空文。

檢驗中共的言論出版自由，還得探討人民在新封建專制下有無「不發言」或「不表態」



的自由。三十五年來，中共在無休無止的「學習會」、「批判會」中要人發言，在運動中要人「交心」、「交代」。在「引蛇出洞」時要人鳴放。在「神仙會」上要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激烈鬥爭中，有人如果不願發言，則要被劃為「不開口的右派」或「至死頑抗的反黨份子」。爲了讓已經吓倒、噤若寒蟬的人開口，往往哄勸擔保：「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但宣佈「三不」後不久，開口的人「反了黨」，並繼續「抓辮子」，「打棍子」，「戴帽子」。而且往往無限上綱，「罪」加幾等，這大概正是毛澤東所理解、所提倡、所允許的言論出版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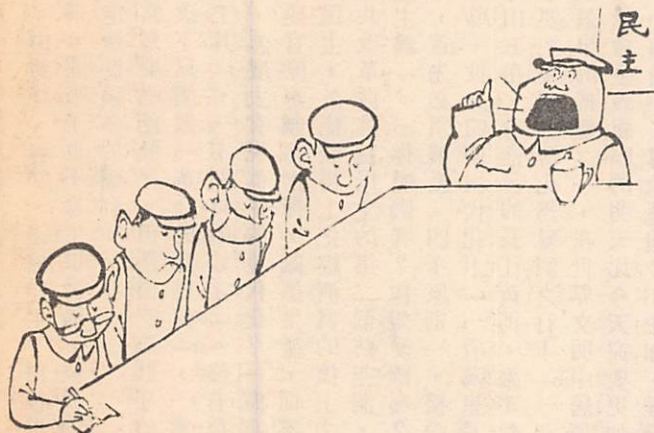
與言論出版自由相關的，還有學術自由。當年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後來自嘲自解：「錯批一人，增加三億」。古代封建專制，也不可能如此專橫愚昧。錯批不但踐踏學術自由，錯批的後果還導致了今天的人口政策。強制晚婚和節育。結果是，大量溺嬰，男女幼嬰佔總懷孕額的四分之一。至於當前中共改革派對學術自由的理解和政策，下面所引的一個口號似乎代表一般：「抵制和防止精神污染，保證學術民主」。（徐鴻武編《社會主義民主概論》，一九八四年版，第九十一—九三頁）

新封建專制所標榜的民主，是所謂社會主義民主，據說在許多方面都超過資本主義民主。比方說，資本主義民主有普選，有議會制，講究三權分立，中共一九八四新憲法也樣樣俱全，而且較之優越。甚至多黨制，中國也不缺。上文引列的《社會主義民主概論》有如下論述：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出于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堅決

地要求和相信無產階級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決地實行內部協商一致的原則。我們也有民主黨派，但他們的宗旨不是爭權奪利，而是代表一方面的愛國力量，發揮自己爲國爲民的一分作用。……我們這裏沒有黨派的爭吵，已用不着對人民搞五花八門的騙局……」（同上書，第七七頁）

新封建專制，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一直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經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以及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颶風，過去的民主黨派已經不多了。能夠倖存的民主人士，多已七老八十，既無嗓門「爭吵」，也玩不出什麼「五花八門」的騙局，最多只有舉手通過一切提案。



### 新封建專制的防空洞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公告世界：中國人民已經推倒三座大山，站起來了。中共所說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主義是指兩千年來中國的舊封建專制統治。三十五年來，中共的統治實踐表明：中共雖然推倒了舊的封建專制的大山，却搬來了另一座大山——新的封建官僚專制。這座新的封建官僚專制的大山——人民民主專政，照樣壓在中國人民頭上，而且壓得更深、更重、更廣。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是新封建官僚專制暴虐的頂峯，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在全國一片黑暗中，已故的中共元老、國家副主席董必武，曾慨然指出：「燈檯底下最黑！」（董楚青《憶我的爸爸董必武》一九八二年版）這個燈檯，就是毛澤東新封建專制的朝廷。

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浪頭上，曾誇言中國的進展「一天等於二十年」。但十年之後，劉少奇本人就喪身文革。而文革的災禍，在許多方面，又何止使中國倒退了一個、兩個、三個「二十年」？浩劫之餘，億萬待療，億毀待修，億廢待興。

中共改革派，從華國鋒轉手，接過來新封建專制的爛攤子。六年來，集中在救活經濟，換位接班，安排統治集團內部特權的繼承。爲了救活瀕於崩潰的經濟，暫時放鬆了三十五年來套在農民頭上的枷鎖。爲了引進外資技術，稍微開啓了閉關鎖國的門縫。

文革的禍根在於制度，在於封建官僚專制，在於一黨專政，在於獨夫暴斂，在於專政之下根本沒有民主——絕大多數老百姓明白。改革派自己受過罪，也心中有數。但由于保守派的

反對，軍方的夾持，加以本身多多少少與新封建專制會有瓜葛，所以改革派中氣也是不足。對於毛澤東的罪惡，不敢繩之以法，只好一面以「四人幫」為罪魁，一面像原始人類用「草繩打結」似地來「記事」一般，企圖對建國以來的歷史問題用黨的《決議》解決。

歷史事實和現實問題，居然要依黨來議決，這原是毛澤東慣用的新封建專制的伎倆。但是，年輕一代，在文革中受矇蔽、損害和航誤過的一代，不會再受迷信和教條的愚弄了。他們已經覺醒，氣勢雄渾地要求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

面對國內外正在蓬勃發展的要求民主的運動，中共改革派一面祭起「四項堅持」的舊旗，一面對民運千方百計地進行防堵、阻止和鎮壓。同時，也連夜動工，挖築了一系列的逃避民主的防空洞。

中共改革派逃避民主的第一號防空洞，標號是「一切爲了四個現代化」。魏京生以坐牢爲代價，曾經提出：「沒有政治民主的第五個現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四個現代化。」改革派逃避的解釋是：「吃不飽飯，談什麼民主？」「不把經濟搞上去，哪來民主？」還加上一句教條——「民主不過上層建築，經濟才是社會基礎！」鼓勵工、農、知識份子的口號是：「向前看！」「即使是『向錢看』或『向權看』，也比『爭取民主』好。」「讀一讀《第三次浪潮》」，「讀一讀《世界面臨挑戰》——中國也正面臨挑戰！」「要放眼世界，看先進國家的科技，但別看他們的民主！」……

對於中共改革派逃避民主的口實的回答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之所以一直不能現代化，在過去壞就壞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在今天，「馬列（毛澤東思想）爲體，西方

科技爲用」，等於要用封建、專制、迷信去發展科技。由封建、專制、迷信作主，科技根本很難進來，進來了也不易生根發展，發展的後果也必定是災禍多於福利。

人當然要吃飽肚子，但僅僅吃飽肚子的人，在專政下只能做「革命的螺絲釘」，「黨的馴服的工具」，「不開口的奴才」。沒有真正的民主，怎麼去實現真正的現代化？一黨專政，由封建官僚專制階級指揮，亂搞生產，而不實行政治民主，怎能談得上把經濟真的搞上去？

中共改革派逃避民主的第二個防空洞，是「愛國主義」。「你愛國嗎？你想愛國嗎？你要愛國，首先必須擁護『四項原則』，接受共產黨領導，投身四個現代化！」「看萬里長城，看三山五岳，看浩蕩的長江黃河。誰不熱愛祖國！要把愛國之情化爲愛國之行！」「祖國是人類最早的搖籃之一，在世界文明中居領先地位，社會主義祖國的明天比今天還要更加可愛。」「你受不了專政壓迫？不怨你，誰沒有挨過整？列寧說過，『國家是階級壓迫工具』，得忍着點。」「文化大革命？那是黨的一時失誤，砸了一些不該砸的東西，有一些冤、假、錯案，都是四人幫的罪過。江青之壞，是無法形容的。受過公審，已經在坐班房。」「歷史是一條長河，要往前看！」「熱愛祖國，振興中華……」

「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愛國得愛什麼「階級壓迫的工具」？愛祖國大好河山，五千年光輝的文化，勤奮的中華民族，必須擁護「四項原則」？振興中華，爲的是振興封建專制？！

恰恰相反，把祖國作爲階級壓迫工具，把大好河山和勤奮的中華民族置於新封建官僚專制之下，把五千年光輝的祖國文化投入文化大

革命的烈火的人，才是最不愛國的人！

在白樺的《苦戀》中，凌晨光的女兒哀痛地問父親：「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其實，凌晨光愛的是真祖國。祖國何嘗不愛凌晨光？不愛凌晨光，折磨凌晨光，要把凌晨光置於死地的，不過是封建官僚專制——人民民主專政！

張諄在《巴黎的狂想》中，沉痛地呼喊：「打倒愛國主義！」張諄所要打倒的，看來也不過是「把國家作爲階級壓迫工具」的「愛國主義」。新封建專制，不把人當成人，逼走愛國的中華兒女，有什麼資格談「愛國主義」？！

### 簡短結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三十五年來，毛澤東的教條，像緊箍咒一樣，套着中國人民的思想，箍着中共自己的頭腦。中共改革派雖然一時提過上述口號，至今仍然不敢真正用實踐去全面檢驗毛澤東所建立的新封建官僚專制——人民民主專政。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是別去砸教條符咒，別讓整個新封建專制的軀殼散架。

前文提過的有國舅之稱的王光美，去香港替中共開展對外貿易，據說曾經慨嘆中國經濟機構和運作程序有如一筐螃蟹：「你鉗住我的手，我夾住你的腳，誰都動彈不得！」看螃蟹，不看籬筐。談螃蟹的你爭我奪，互相殘殺，不談籬筐框住所有螃蟹，螃蟹早晚只有被人烹煮。提倡「鬆綁」，不討論破除籬筐——正是中共改革派的實踐。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解除符咒，不破除籬筐，能用什麼實踐去檢驗什麼真理？！

左

右

辨

(華裔工程師·美國) 憶凡

## 左右對抗，民族分裂

自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後，中華民族即陷於綿延不斷的左右紛爭中。國共合作北伐未竟，蔣介石開始清黨，接之而來的「剿匪」、全面內戰、以至中共政權的建立、以政權政權的認同來劃分左右人士，已成爲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既成事實和脈絡分明的邏輯概念。

中共建國之後，經歷數次大的政治運動，左右的一再劃分，至文革而達到了頂點。四人幫倒台之後，黨內外、海內外人士痛定思痛，將歷次大運動大浩劫，均歸諸過度左傾，泛稱之爲「左災」。

左右紛爭不但在中國土地上延續至今，即使到了自由民主的美國，這種因政黨政權對抗的左右之爭，也還繼續存在。海外知識份子并未因受到自由民主的洗禮而減低了左右對抗的情緒。筆者無意在此將海外華人政治分裂簡單化而歸諸政權分裂。但不可否認，左右勢力的對抗，的確抵消不少海外華人可團結的力量。

本文主旨不在化解左右勢力的對抗(事實上這種現況不可能以幾篇文章來改變)，而是在探究左右劃分的沿革、現實意義及其存在價值。

## 左右沿革的歷史情況 及目前中國之現況

衆所週知，左右劃分源自法國大革命之後，開始於民主憲政議會政治初期。每當開會議事，在思想政策上屬前進激烈的議員列席左邊，保守因循的則列席右邊。從此，在政治上，左右派變成前進和保守觀念人士的代名詞。

在今日西方民主社會中，政治勢力劃分仍是以古典的左右原意爲依歸。祇不過在一個有民主傳統素養的社會中，這種左右之爭乃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思想觀念之爭(思想言論不至列入罪行)，不會上綱上綫乃至飛帽舞棍。可是左右觀念思想之爭一到了中國人的社會中，就不得了，不僅上綱上綫，甚至變成正義與邪惡之爭。不是嗎？台灣的老百姓一旦被國

民黨列入左派或左傾人士，就算是「爲匪張目」，不但個人鋸鐮入獄，甚至連累親友。大陸情況亦然，右派帽子爲禍尤烈。

左右思想分歧演變到中國的國共黨爭，已不再是進步、保守觀念之爭，而是一場「以我劃綫」「逆我者亡」的生死存亡鬥爭。這場鬥爭到今天，比起十年前雖有緩和之勢，可是敵我矛盾的對抗，甚至戰爭狀態亦并未完全消除。

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是大多數炎黃子孫(包括海外華人)的一致願望和理想。可是左右派的對抗和國共的敵我對峙，是邁向理想、面向現實的最大障礙。除了國共兩黨本身的局限性、保守性和反動性外，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海外的高級知識份子，困於左右思想混亂，也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爲澄清觀念，探究原始的左右思想差異，結合目前中國知識份子政治認同派別上的情緒，并研究左右二分法的必要性，確有現實的必要。

## 多向軸參考座標

左傾思想源於激進的政治意識，與之相關的有思想開放前進和較高的理性成份；右傾思想源於保守的政治意識，與之相關的有思想封閉守舊和較多的感性情緒。這是左右二分法在政治思潮上的古典沿革。時至今日，政治意識上的二分法，能否用來概述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實有重新斟酌的必要。

在今天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物質精神文明同時突飛猛進，個人的思維範疇，也必與之相應而增進擴張。這有如平面幾何由一向二向空間推展至立體幾何的三向空間；又有如初等代數與分析的正負實數推展至高等代數與

分析的向量以至張量。一項實數，除了零之外，非正即負。一項向量呢？其正負值端視其（參考）座標軸上的（投影）分量而定。在一個多維（向）空間（MULTIDIMENSIONAL EUCLIDEAN SPACE）系統內，對一個物理量的描述是不可能用簡單的正負值來表示。在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有機體中，發展的穩定性，也不能完全依賴政府（行政當局）政策。

現代的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不過是這個有機體上層建築中的一項主要因素。同樣地在馬克思假想的烏托邦中，一個完全解放的「人」，其思想意識也不可能由簡單的二分法來界定。

做為一個現代人，尤其是現代知識份子，其思想範疇是多方面的：社會、歷史、經濟、文學、藝術、宗教甚至人生觀等等，政治意識不過是多向參考座標系統中的一個座標軸而已。如果我們用古典的左右原義來區分前進和保守的話，則一個人在某個思想領域內是左的，在另一個思想範圍則可能是右的。此中個例不勝枚舉。一個人的文學作風非常保守，非之乎也者不為文，但政治意識可能很前進。一個人在男女兩性觀念上非常開放，從事男女社會平等的工作亦不遺餘力，可是在政治態度上可能却很保守。簡言之，要全面衡量一個人的意識形態是難以用左右來劃分的。前進乎？保守乎？必須在具體領域作具體分析。

我有一位年紀較長的朋友，彼夫婦是美國人。照常理，這樣一對中美通婚的夫妻是非常有助於中西文化的融合，就某些層面來說，也的確如此。但這位大姐思想作風保守，其夫則開放前進，政治上亦然。她雖嫁夫隸屬民主黨，可是她本人向來不傾向民主黨，甚至在政策綱領上尤其反對。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更是

常做「里通外黨」的「叛徒」（跨黨投票在美國是合法而且合理的）。可是一九八〇年的大選（卡特與雷根競選），當許多民主黨中的自由派（包括她丈夫）做倒戈將軍之際，這位大姐却是濁水清蓮忠貞不二，在她丈夫投給雷根選票之後，她自己開車去投給卡特神聖的一票。她這種力挽狂瀾的表現，原因很多（其中沒有一項是忠黨的），她認為：卡特是好人，祇不過時運不濟，倒霉而已。所以，好人應該再給他一個機會。另外，卡特政見當然也比較符合她個人看法等等。但有一項她個人最「合人」——MATEE 的理由，是在一個偶然機會和她閒聊時透露出來的：「雷根何人，彼一「戲子」出身，焉可擔國君之重任耶！」嗚呼！浩瀚如海之中華文化及偉大封建傳統思想可見。她這一類反對雷根當總統的理由，真不知算是左的，還是右的。無獨有偶，這種利用雷根過去職業出身來反對他當選的藉口，當年海外左傾人士也運用過。其實藉口歸藉口，左派真正動機是反對雷根親台灣政府的外交立場。

看來現代西方政治的左右分類法，一旦納入博大精深悠久的傳統文化中，還真難以運用得上。即使將左右單向數綫推展至三向空間，用來參考近代中國政治上的權力鬥爭，恐怕也難以定點分析。此因無他，蓋座標原點都可能隨時移動轉動的話，隨着最高當局的指示而「活學活用」，在這樣的系統下，還有啥參考座標可言？！左右分類還有啥意義呢？！

### 形左實右，左右同源

四人幫倒台之初，中共官方給他們戴上的「帽子」是「形左實右」。在中共傳統的字典內，左（非「左」，無引號）代表好的，正確

的，革命的，甚至是正義的；右則代表壞的、錯誤的、反動的，甚至是邪惡的。把林、四集團打成「形左實右」，就是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幹盡」。林彪有一段時間被說成「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背後下毒手」。事實上是如此簡單嗎？稍會獨立思考的人，今天恐怕都不會相信這些官樣文章。

做為一個獨立獨行、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起碼應做到言行一致，在公在私言行都該有個標準。這個「標準」，在大原則上應是人人共同遵行的。如：國家法律、民族風俗，及社會公德等等；在小節上則因時因地，尤其是因人的個性習慣而異。不論如何，個人習性必須有一致性，公私言行應有其吻合之處，絕不該有，也不能有兩重性、雙重標準和兩面派行為。

準乎此，在海外支持中共政權的人士，照理說思想比較開明前進（相對於右派來說），公私行為也該較符合現代化的理念。也許「大家」認為上述標準過高，不切實際。因為今天認同中共政權的海外華人，不一定認同社會主義，甚至根本不瞭解馬、列為何物。不錯，自從中國核彈試爆、衛星上天之後，海外廣大僑胞的自卑感稍加彌補；等到七十年代中國進入聯合國，保衛釣魚台（簡稱「保釣」）的學生運動，更將「認同」和「回歸」帶入高潮。這些認同，包括釣運所帶動的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原動力主要還是民族感情。中國人盼望祖國強大，如大旱之望雲霓，這些都是人之常情。可是到今天，許多華僑還是停留在原始的感情認同上，不願進一步提昇到理性探討的層面上。尤有甚者，還有些「棍」型人物，以安定團結為理由，見不得一點與中共官方意見相左的言論，將一切與中共持不同政見者皆斥為異端

和大道不道。

就以「中國之春」來說吧，筆者所能接觸的華人中，不乏支持中國民聯立場與大方向的，但更多的人是在觀望、猜忌，甚至詆毀。對新生事物觀望乃人性之常，而猜忌、詆毀，恐怕是中國民族的特性了。對中國民聯持否定立場，除了個人特殊背景、利益與觀點外，仍不外來自左右兩方的官定立場。

傾向國民黨的右派，除了少數思想開明人士外，囿於本身立場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對中國民聯公開肯定的。國府官方已公開表態不能接受「中春」在台灣的註冊登記。國府能容忍島內黨外雜誌數說蔣家內史外傳，却不能讓「中春」進口。此無他，蓋中國民聯要求開放人民參政管道的原則，勢必瓦解國民黨賴以生存維繫的「法統」「政統」。國府對當今黨外，已窮於應付，豈可讓外在因素，再來推波助瀾，火上加油？

至於傾中共的左派，對「中春」的排斥則不言而喻。這些海外左派的經濟利益和中共當權派的政治特權是唇齒相依互為利用的。基於個人利益的出發點，這些海外左派維護祖國在朝的當權者本無可厚非，但進一步對所有不見容於當道的人與物都視為異端，甚至口誅筆伐，則未免有失士人風格。這也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排他作風之一。微妙的是：左傾人士對「中國之春」的攻擊，從不坦誠訴諸個人利益觀點。相反的，他們總是砲製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上惡毒言詞行「人身攻擊」。

青年民主派先鋒鬥士王希哲曾經指出：大凡（近代）政治上的野心家苟欲騙取民心，一定將自己的私心隱藏起來，說出來的都是富有欺騙性的革命辭藻，把自己裝扮成天縱英明的「民族救星」，或一貫正確，一句頂一萬句的

「偉大領袖」。同時使得別人相信他的心願意志與廣大人民的利益一致，他的立場是站在勞動人民一邊的。而實際上這些野心政客真是如他們裝扮的那樣開明前進、先公後私、一心一意在為國為民盡心盡力嗎？中國近代史上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統治者為騙取民心，一定會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崇高、思想前進、大公無私的革命者。「一朝權到手，便把令來行」。統治者一旦得到權勢，則濫用權力，好話說盡，壞事幹盡。尤其在言論上，政治野心家總是以左的、革命的、前進的面目示眾，至於他思想行為是否符合自己所說的則是另一回事。實際上，「形左實右」不是四人幫的專利，早在北伐前的蔣介石及中共建國後的毛澤東，對照他們自己的所言所行，不都是「形左實右」嗎？至於今天在海外的左派，高舉民族立場、愛國主義的大纛，揮舞大棍、黨同伐異，是否也在炒歷史的冷飯，犯形左實右的雙重政治標準？對這些帶着左視眼的朋友，筆者有幾句逆耳忠言：在維護自身和（中共）當權派的既得利益立場上，任何人（包括左王、左山頭、一切左、右傾人士）大可表達自己觀點，但切忌揮棍、戴帽、造謠、詆毀，進行人格污蔑。這種低三下四的虛偽行為是在為虎作倀，和國民黨黨棍有何兩樣？豈非左右同源？

## 結語

在中國專制政體沒有突破，民族意識危機未獲解放前，意識形態上劃分左右是沒有意義的，政治立場上投奔左右政權更於事無補。人的思維領域是多樣化的。簡單的二分法，就像

小孩在看（中國）電影先分清好人壞人、正反面人物，將劇情中人物都先定性之後，再行劇情欣賞一樣，是幼稚膚淺而又可笑的。

中國政治歷史的悲劇在於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形成一股制衡力量來監督在朝的當政者。因為，中國知識份子從來不曾有過這種普遍的政思想意識的覺醒，歷史上不乏董振筆的直筆和魏徵之類的諫臣，但這都是極個別、零星、突出的鮮例。兩千年的政治演變與思想緊密的掛在一起，成一超穩定系統：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識，祇是政治勢力的陪襯。是小媳婦，永遠不能卓然自立，超然獨立。唯一的出路就是屈從於現實勢力，等待「媳婦熬成婆」，等統治者的招安封賜、拜相入將。這種超穩定系統的模式，可用解析幾何中的圓或橢圓來表示：在一大一統的形勢下，系統呈圓形狀態，以在朝天子或最高當局為圓心；在分裂割據的形勢下，系統呈橢圓狀態，以分裂政權為左右焦點。中國民族的意識形態就在這種超穩定系統的模式下，轉來轉去，脫不了圓和橢圓的樣式（PARABOL）。當西方思想科技已發展到非歐幾何體系，超越了函數曲綫和抽象代數的階段了，以中華文化為首的東方文明，却連個起碼類似歐幾里得幾何體系尚未建立，祇是在圓形堆，同心圓中打轉。身為海外華人，在捍衛少數民族自尊，維護炎黃子孫利益之外，到底有什麼好自豪自傲的？！

左右勢力紛爭的日子應該一去不復返了！左右思想劃分的時代，也該進入歷史的陳列館了。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是開創理性意識，發展人文主義的歷史重任。不要把傳統的包袱加諸我們後代，讓我們用開放的心靈意識，去迎接現代化的挑戰吧！

# 老處女

(中國大陸作家·美國)

雷雨電



昨夜那場豪雨，洗去了酷暑時節令人不堪忍受的灼熱。清晨，微風送爽，朝露除塵，姍姍露面的太陽光照麗柔和，整個世界都顯得明澈而清新……。

今天是星期日。

陳玲探身窗外四下張望，心裏却頗為惆悵。兩扇明淨的玻璃窗，映出這位外科醫生的身影：她一點也不漂亮，盆臉、對眼、兩腮鼓鼓的——至多算是中流偏下。雖然剪着齊耳的短髮，衣着也還保持着學生般的簡樸，但是她那動作那神態都顯示出，她已臨近中年了……。她是一位老處女。

幾個小娃娃排隊從窗下走過。他們拍着腳丫，兩手空抓，招呼陳玲「阿姨」；可是發音不準確，「哇哇呀呀」地亂叫着……。

陳玲黯然地微笑着。小時候，她多麼快樂！尤其喜歡星期日，板着指頭數來算去。她生於高幹家庭，生活潤綽。每逢星期日，父親都帶她出入一些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是禁地的所在。所到之處，人人都點頭哈腰，阿諛她是美麗無雙的小公主……。

但是近年來，陳玲却害怕星期日，害怕那整整一天的寂寞、無聊和空虛。爲了排遣孤寂之感，她把這一天當成了星期日，潛心於「實用外科學」一類的醫學典籍之中，流連浸沉在福爾馬林溶液的各種標本之間；但是，對於一個三十歲的姑娘來說，這遠非是生活的全部……。

有一次，她想去報社登個徵婚啓事。父親聞訊後爲之勃然：「市長的女兒登報招婿？成何體統？！哼，三教九流都會找上門來，妳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政治面目？說不定還混進幾個美帝、蘇修、台灣特務咧！……。」

陳玲惶惑了。想想自由擇偶竟然可能帶來如此嚴重的政治後果，那麼也就只好儘早裹足……。

父親替她劃出一個選婿的範圍：數十家稱得起門當戶對的黨政軍的高級幹部。然而那批公子哥兒一個個直奔電影戲劇界的大美人兒而去，沒有誰願意多看陳玲一眼……。

爲了父親的體面和榮譽，陳玲默默忍受着這種被人冷落的狀況。她生活富足，樣樣不缺，唯獨被剝奪了對於一個女子來說最寶貴的——愛與被愛——權利。日久天長，她變得很孤癖，身體上這裏那裏也常常覺得不舒服。她是醫生，懂得這些毛病是大自然對於高齡未婚女子的

懲罰，因而愈益苦悶。每逢看到世上和和美美的夫妻或是在書中讀到有關男歡女愛的章節，她就像被寒霜打過的秋葉那樣垂頭喪氣。有時，她獨自坐家中，一個人久久地發呆，不吃也不喝。這情景若是被父親看到，少不得又要嘮叨幾句「妳就不能抓緊時間學學人民日報社論？」或者「資本主義思想真是害死人。」……這些官話在市委常務會議、市委擴大會議上必能贏得滿堂采聲，然而對一個正在懷春的老處女却無裨益。

她的心，渴盼着愛情的滋潤。

一個月前，她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封怪信：寫信人是個在千里之外荒山溝裏插隊的老知識青年。他以直率得近乎粗魯的詞句要求見面，還附上一張照片——人長得真帥！她立時便動了念頭……

一見面，陳玲的心更是搖擺無法自持——約會定在動物園門口。當時，毛毛細雨下個不停，她提前十分鐘到達，對方已在那裏等候。這是個身材修長的三十五歲左右的男子，濃眉深目顯現出堂堂正正的魄力和胆氣。

「我沒有想到妳真的能來！」這個自我介紹名叫汪波的男子笑着說。

陳玲也是一見如故：「你的信寫得那麼緊急，我怎能不來？……」

汪波收住笑容，躊躇着說：「是這樣……我特意來向你道歉的……那封信不是我寫的……」

陳玲有些驚異了：「嗯？這照片，不是你嗎？」

汪波告訴她，信是他同村一個插隊知識青年寫的，這個狹促鬼長年務農，尋不出返城的辦法，聽說陳市長的女兒沒有對象，就以汪波的名義搞了這麼一齣惡作劇……

陳玲不以爲忤，反而咯咯地笑起來：「管它呢，我們不是認識了嘛。」她把手裏的尼龍傘舉高了一些，大大方方地將他罩進了蕭瑟似的傘裏。青春不再，她對內心中意的男子特別主動。

「你還在農村插隊？」陳玲沒話找話說。「十幾年了。」汪波淡然地，「也許要插一輩子呢。」

陳玲打了一個寒噤。「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些苦命的、被時代風暴吹送到窮鄉僻壤的人們！社會毀了他們，他們也就乾脆自暴自棄，淪爲強盜、小偷、公娼、少年漂泊者、拉皮條者、「土八路」、酒鬼、打群架的能手、吹牛大王……總之是社會上的公害，被視爲不必出生的多餘的人。然而眼前這一位，却頗具學者風範。」

「其實，我可以幫你回來……」話已出口，陳玲便失悔自己的冒失，看看汪波沒有反應，才又說下去：「這並不難，連爸爸的司機還辦了好幾個呢。」

「對於妳，當然不難。市長的女兒嘛……」汪波深思着，「不過，你能把我們這個窮山溝裏所有城市知識青年——一共五百七十七個，全辦回來嗎？……」

陳玲語塞了。

「我不是歷史學家，」汪波的眼神炯炯有神，放出那種能夠洞穿歷史迷霧的光來，「但是我敢肯定，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悲劇！如果把所有黑幕都揭開，絲毫也不亞於販賣黑奴的罪惡……」

陳玲雖然久居深閨，却也知道那駭人聽聞的內幕：她有個小學時候的女同學，家庭沒有政治背景又想返城，只得忍辱同那些從小隊長到縣知青辦主任的大官小官們睡覺，戶口卡、

糧油關係、人事檔案、組織鑒定……一道道難關、一尊尊惡煞，她都得強顏歡笑地去應酬，都得賠上女人那再可憐不過的本錢。

陳玲嘆息道：「內幕當然是很黑暗的。可誰又敢說什麼呢？！」

「總得有人出來說話，否則，中國還有什麼指望？」汪波意味深長地說，「你聽，你聽……」

隱約地，傳來幾聲虎嘯……

以後他們常常來往。一來二去，陳玲覺得自己離不開他了。她的歡樂、安慰和精神寄托，全都繫於汪波一身。

她去過汪波的家。只有兩間火柴盒一般的木板房，人口却不少：汪波及其父母、上高中的弟弟、寡姐以及一個八歲的外甥女。室內湫隘不堪。每天夜裏，全家人只能依代數學上同類項合併的原則就寢：婦女們不計輩份地擠在裏屋那張大床上，男人們則睡在外屋。爲充分利用空間，還得將汪波父親的自行車用粗鐵鏈子吊在房樑上。這法子自然不夠安全。

陳玲的光臨，使得汪家老少都很高興。汪母邁開三寸金蓮腳把貴客讓進裏屋：「快進家來喝水！我家小，轉不開身兒……」

汪波弟弟一撇嘴：「邪門兒！有在非洲造坦贊鐵路的錢，就不能給老百姓蓋幾間房子？！」

陳玲笑嘻嘻地朝他點點頭。單憑這牢騷話，就足以見得他們沒把自己當成外人。

然而，當汪波隨便便地道出：「她叫陳玲，是市長的女兒……」之後，家裏的氣氛驟然一變，二老臉上真誠的笑容凝住了，變成了無生氣的乾笑……而當陳玲把手伸向那位姐姐時，她窘得不行，囁嚅着：「俺是清潔工，見天價擺弄掃帚，手髒……」她在衣襟上使勁

兒擦手，却鼓不起伸出來的勇氣。汪波弟弟悄悄地吐了一下舌頭，像打量一頭怪獸似地緊盯着陳玲，直到童言無忌的小外甥女衝口說出：「我大舅說過，陳市長是個死官僚……」時，他搶過去捂住了孩子的嘴……

凡此種種，似乎都在汪波的意料之中；他笑笑對陳玲說：「看，貴客駕到，把主人們攪得闔家不安！咱們出去走走……」

陳玲當然贊成。儘管市長的女兒和一個老知識青年壓馬路，彷彿有點那個，但她也顧不得了。她愛上汪波了，並且產生了一種委身於他、爲他生兒育女的強烈慾望——這一慾念固然使她羞赧難當，却又實實在在地印證了她作爲女性的存在，因而樂不可言。

「爸爸，」當天晚上，陳玲在飯桌上問道，「聽說有五百多名老知青返城？」

父親似聽非聽：「嗯？」今天有一道他喜愛的好菜——「霸王別姬」（鮑魚燒雞），他有滋有味地吞咽着，並不時將茅台酒瓶直接套在嘴，抽吸一口……後來，竟暫停進餐，閒適地哼起「霸王別姬」的唱腔來，還拈起湯匙在紅木桌上敲擊鼓點助興——是霸王上場之前的「急風」……

「爸爸，」陳玲小聲懇求着，「你就大筆一揮，讓他們回來吧……他們怪可憐的。」

父親響亮地打個酒嗝：「呃——上邊沒有文件說他們能返城……」

「可也沒有文件說他們一定不能返城，你……」

「問題就在這裏。對於這種介乎兩者之間的政策邊緣問題，我只能維持現狀。你也知道，中央的政策多變，將來怪罪下來，誰負責？」他暢暢地伸了個懶腰，打算稍息之後，將剩餘的「霸王別姬」悉數全殲。

「他們缺吃少穿，苦得很……十幾年了。像大多數女人一樣，她多的是感情，少的是邏輯。這幾句話使她的眼圈紅了。」

「那誰？」父親的聲音很輕，也很冷酷。「這都是社會問題，不能感情用事。依我看，這些老知青就像拿破侖部隊裏復員下來的老兵，早早晚晚都是禍害。玲玲，你何必操這個心？想想吧，好事情都讓你佔全了——參軍、提幹、上學……」

陳玲放下了象牙筷子，不敢吱聲了。然而她的胃口也倒了，面對珍饈美味，却再也咽不下一口。

……  
今天又是星期日。陳玲暗自盤算：上午還是留在家裏用功，下午則去找汪波。今天一定要結束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單刀直入地問他：你愛我嗎？……

陳玲嘲笑自己：妳呀，三十歲的人了，額上有了兩道抬頭紋，鬢角時不時出現一根刺眼



的白髮，却還像十七歲的小姑娘，想入非非……

「陳玲！你的電話！」父親神色緊張地喊道，如臨大敵「一個男的！叫汪波，他是什麼人，在哪兒工作？……」

陳玲容光煥發了「汪波？我的朋友……他是老知識青年。」她拿起了電話聽筒，而面貌失色的父親則守在一旁，捏着兩把手汗……

「陳玲嗎？妳好……我是在市政府廣場借打電話……」汪波的聲音沉穩而有力，「我們在廣場上舉行靜坐示威，我們一共有五百七十七個人，妳能來嗎？妳是第五百七十八個……歡迎妳！」

她無言以答。當着虎視眈眈地盯着自己的父親，她能說什麼呢？只得可憐兮兮地支吾着：「嗯……」

「你來還是不來？」汪波有些詫異。

父親粗魯地伸手按斷了電話……「妳幹的好事情！妳把流氓引進家裏了！」他咬牙切齒地道，臉色鐵青。

陳玲還想分辯，但當她看到騎兵出身的父親的那兩條羅圈腿，由於震怒而瑟瑟發抖時，她吓白了臉——

父親一字一字地命令道：「從今天起，除了醫院，妳要敢去旁的地方……」他獠笑了一聲，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間。

一霎時，陳玲甚至衝動地想去摸高壓電門，一脚跨進那個永恆的世界。在醫院裏，同學們常常彼此戲稱爲「死神的助手」；這會兒，她真盼望死神登門，幫助她逃出眼前的痛苦……

這樣胡思亂想了許久，理智才又重新佔得了上風。陳玲暗忖：一個外科醫生，必須遇事冷靜。因爲妳每日每時都要面對人類的傷痛。



這一回，妳是面對自己心靈的創傷呵……爲了減緩內心的苦痛，把這些煩心的事情暫且放一放，陳玲決定去醫院走一遭，病房裏有幾位患者讓她放心不下……

通常，醫院逢到節假日總是比較冷清，連那四處彌漫的藥味兒彷彿也輕淡了許多。可是今天的情形有些不對頭，陳玲才進大門，就看見大廳裏烏壓壓、鬧哄哄地聚着許多人，還立着兩名荷槍實彈的警察……

陳玲拉住勤雜工老郝，問：「郝師傅，出了什麼事？」

老郝一個勁兒地噴着唾沫星子：「喲，陳大夫大禮拜天的也來啦……車禍。聽說是個楞頭青，騎車騎到汽車轆轤底下……哼，八成也是官家子弟吧，是個什麼處長送來的呢。」

陳玲趕緊奔向急診室。今天值班的那位小張大夫，赤腳醫生出身，沒有多少臨床經驗，獨立處理這種緊急情況怕有困難……

急診室外面，坐着一個狗熊一樣的粗野漢子，陳玲認得他是市政府的保衛處長。

「小玲子，今天是妳值班？」保衛處長親熱地打招呼。

陳玲原想敷衍幾句就走開，不料處長後面這些話如同磁鐵一樣將她牢牢吸住：「……這小子帶了好幾百人去市政府搞什麼靜坐示威，引得人山人海圍着看，還有外國記者拍照，影響惡劣……小玲子，還是妳爸爸老練，他說要接見帶頭鬧事的人，那傻小子一進市府，嘿……」他脫下鞋子，右手五指在腳趾間穿來穿去地搔癢，令人睹之欲嘔。

「後來怎麼樣……」陳玲的心裏充滿了不祥之感，她急急地追問。

處長將搔落的皮屑擧至鼻前嗅嗅，眉飛色舞地道：「也怪幾位保護幹部手重了一些……

腦震蕩。小玲子，你是自己人，這事兒對外說是車禍……

陳玲一個急轉身，逕直奔入裏屋……果然！角落裏那張病床上，業已失去知覺的汪波仰面躺着，滿臉都是髒垢和血污……

陳玲心疼欲碎，定神地凝望着不幸罹難的汪波——心上的人兒。她夢中也想着和他一起渡過星期天，不意竟在急診室裏如願以償。愛憐和痛惜的情愫湧上她的心頭，但又倏而化作醫生救死扶傷的天職……

「注射甘露醇！」陳玲輕輕地、威嚴地發布第一道命令。

近旁一個護士立即照辦。那位半瓶子醋的小張大夫賣弄地說：「我剛才囑咐打了葡萄糖靜脈針。」

「不夠！爲了救……他！還要注射山梨醇，這當然是顱內血腫。」

小張信服地連連點頭，自願退到一旁。陳玲身後發出一聲悲號：「天哪！我弟弟要是落下殘疾，誰養活他呀……」

陳玲沒有回頭，但她用斬釘截鐵的聲音告訴這位不幸的寡婦：「姐姐，妳放心，有我呢。」翻開汪波的眼皮，手指呵，微微打顫……診治親人，自古便是醫家的大忌。

但見汪波眼神散亂，眼臉却未見血斑，陳玲又稍稍鬆了口氣，她用攝子夾塊酒精棉，一下一下揩拭着汪波臉上的血污，然後掰開他那蓄有短鬚的嘴唇，投進一粒「安定片」……同時緊張地思量着：「看起來顱內壓雖然升高，對腦實質的壓迫卻並不嚴重，開顱取血的可能性不妨排除……」

陷入昏迷狀態的汪波，已不像方才那樣毫無知覺了。他那修長的身軀，像是畏懼風寒似地輕輕搖動，間或還發出呻吟一般的鼻息……

「輸血！」陳玲嘶聲道。倚門旁觀的小張問汪波姐姐：「他是什麼血型？」

「B型」。

那個護士馬上去血庫取血。片刻之後，慌張張地跑回來：「B型血沒有了！」

汪波姐姐捋起袖子：「我是B型血……」陳玲輕嘆一聲：「唉——我也是B型血，來吧！」

汪波姐姐本想勸阻，但她看到陳玲眼裏流露出不可動搖的決心，便斂口了……

小護士動手在陳玲耳垂上採血，然後注入汪波的靜脈……

就這樣，星期天的下午和傍晚，在搶救中匆匆過去了。汪波雖然尚未甦醒，却已沒有什麼危險了。陳玲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臉色顯得疲倦而蒼白。她對小張吩咐了例行的注意事項，然後說：「等他醒過來馬上告訴我。」

陳玲把自己反鎖在醫生值班室裏。她從抽斗深處取出母親的遺物——一方繡着鴛鴦戲水圖案的真絲手帕，凝神端詳，簌簌地流下眼淚……待汪波清醒過來，她將對他說：「我愛你，更需要你的愛……沒有城市戶口？怕什麼，我願隨你走遍海角天涯。一貧如洗？沒關係，我懂得在富貴中拘鉗遠遠不及在貧寒中自由。我要和你在一起——只要能保持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只要愛情之樹常綠……哦，父親騙了你，我來補償：我要把善良的心和清清白白的女兒身，獻給你……」

由於怕驚動旁人，陳玲不敢哭得太響……她用手帕堵住自己的嘴抽咽着……

呵，這如泣如訴的嗚咽聲是那樣淒慘，宛如永恆的春風吹過那被殘暴雷公亟傷的處女林……

☞ 迎接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召開 ☞

# 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

「民主的目標誰不嚮往？可是，怎樣才能成功呢？」我們總是聽到這樣的問題。

「怎樣成功？」我們的體會是：大家團結起來、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形成力量，就能成功。您加入民運的行列，民運成功的希望就大了一分。

孤獨時，常有無力感、無助感、無望感。加入民運行列，做一兩件對祖國前途有益的事，和我們共同奮鬥，會使您的這種感覺一掃而空。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訂 費 (每年)
地址：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_____	機 關：60 美元 200 港元
_____	普通訂戶：24 美元 72 港元
	學生訂戶：18 美元 60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
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Spring	贊助 200 美元或港澳地區 500 港元以上
北美地區： P. O. Box 243.	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New York, N. Y. 10185	.....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
272 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航空：10 美元 · 平郵：5 美元
Tel: 3-667665	

## 中國民聯世界二大籌備處

# 感謝各界捐款資助二大召開

中國民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籌備處三個月前就曾為二大的召開展開了募捐活動。承蒙各界慷慨解囊，民聯二大才得以召開。現將一部份捐款者的芳名公佈如下：

吳定明	東南亞華僑	捐	4,000美元
王承	美國華僑	捐	2,500美元
劉國安	美國華僑	捐	2,000美元
陳久之	加拿大華僑	捐	2,000美元
J.F. STEPHENS	美國商業人士	捐	1,500美元

另有不記名捐款共34筆，計2,226.62美元及荷盾300盾，共計14,226.62美元及300荷盾。

大會籌備處僅向各位捐助人致以誠摯的謝意，歷史將記錄下他們對中國民主的貢獻。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二次  
世界代表大會籌備處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請您提供其它學校的幾位大陸留學生名單

中國之春刊登廣告、徵求大陸留學生通訊錄以來，我們收到大批名單。有時，同一個學校的通訊錄，我們可以收到數份。這充分說明，廣大留學生是支持我們的。

儘管同一個學校的名單可以收到數份，但仍有一些空白學校。我們請您協助填補這些空白，方法是：向我們提供您所知道的其它學校的中國大陸留學生通訊處（只要有姓名、系、學校即可），提供一、兩位，也是有助益的。這樣的交叉提供信息，終將遍及各校。對於提供者，我們有如下獎助：

提供外校中國大陸留學生二名以上者，贈閱雜誌半年；五名以上者，贈閱一年；十名以上者，贈閱二年。僅提供一名者，則寄贈中國之春賀年卡一張。

您協助我們一分，中國之春的影響就擴大一分。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 勝利的曙光在前頭

—獻給中國民聯世界二大

中國民聯北京詞曲  
第九聯絡站

1=G 2/4

朋友 讓我們 大家 手挽著 手  
看 東 方 已 破曉 勝利的  
曙光就在 前 頭 啊 同  
志 啊 朋友 讓 我 們 大 家 手 挽 著  
手 為 中 華 民 族 錦 繡 前  
程 我 們 奮 勇 戰 鬥 一 切 莫 遲 疑  
碾 爛 那 精 神 枷 鎖 衝 破 那 思 想 禁 錮 莫 遲 疑  
維 護 那 人 的 尊 嚴 掃 除 那 封 建 污 垢 莫 遲 疑  
莫 擔 憂 迎 風 雨 向 前 走 讓 民 主 自 由 鮮 艷 的  
莫 擔 憂 迎 風 雨 向 前 走 把 人 權 法 治 神 聖 的  
花 旗 朵 幟 開 遍 神 州

啊 插 遍 神 州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272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507-6442 (香港) 3-667665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6.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ENDING ≡  
≡ FLUSHING N. Y. ≡  
≡ ISSN 0735-8237 ≡